

房山城的“林家铺子” ——五十年前的房山店铺

王凤梧

这几年，我写了几篇反映房山新面貌的文章。因为创作不是照相，难免有深浅浓淡之宜。文明人说我“歌功颂德”，不太文明的说我拍马屁……我想闻过则喜，但总有点委屈。人家说，房山人不开眼，我不完全反对，如果能象电视，把五十年前的房山实况再现，和今天的实况相比，就算你不“歌功颂德”，不“拍马屁”，也得心平气和地承认：到底变化了，还挺大呢！

房山城 大猪圈

原房山县城，周长四华里，面积一平方里。四门一关，真比大户人家的“猪圈”大不了很多。可是城里也有三教九流、士农工商。除去西街的县衙门，西北角的城隍庙，东南角的药王庙、臭水坑，东北角的大粪场——市井，住宅还有多大面积？十字街即“大角儿”，东西、南北四条街一交叉，成了“十”字，于是出现了四个“角儿”。其实“角儿”不算大。或是因为比较“繁华”，才又冠之以“大”。其实有个人叉开四肢一躺，便能阻塞四街交通，可是“老房山”今天话当年，仍叫它大角儿。

五十年代说“人多是好事”，今天的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今日房山城整日里车水马龙，行人如蚁，确实令人肉麻。五十年前。十字街北有个叫“骚鞑子”的裁缝，在西北角儿一跳老高又笑又叫：“我媳妇骑老草驴来喽”，一眼看出半里地。他是城北人。半里之内没有视线阻碍物！比起今天不知清静了多少倍，可是，算不算市井萧条？

誉满房山的商品

1. 水果、玩具摊的“瞎李”。

今天六十岁的老房山，全知道“瞎李”。我未详其名字。那时他约五十多岁，并不全瞎，眼小似有毛病。他是房山城独此一家的卖鲜果子和玩具的。一个木板支起的摊床。低处是洋糖(一个铜板给两块象蚕蛹样的糖)，毛毬、猴儿攀杠子，玻璃球、瓜籽、花生米、唾沫人儿(胶彩印的图片，用唾沫沾湿反贴于白纸上，摩压揭下，原图便粘压白纸上)，摔炮子……居高临下是只剥了皮的柳条编篓——象字纸篓大小，上面摆只桔子作招牌，里面便是全部苹果、鸭梨等等鲜货了。

殷实家的孩子偶从娘身上磨出个铜板，买两块“洋糖”，穷人谈何容易！

瞎李小小的摊床往东北角一摆，就相当于房山城的“干鲜果品”公司和“儿童玩具”商店！

2. 布店——大昌德、春茂永。

大昌德和春茂永是房山城里的布店，都在南街路西(房山人民商场处)。那时的较大商店都是平房，房前一步宽的“雨廊”，可以遮雨，却阻碍了阳光，所以屋里都暗。

大昌德是邢四爷、薛三爷联办的，两人都是“掌柜的”。店员叫“福寿”，兼做饭、打杂。我父亲和邢、薛是朋友，常领我去大昌德。几匹布摆在高处，暗淡得象两位掌柜的面色。薛掌柜给我们五个孩子买了一个柿子。邢掌柜说他小气又买了一个，我们不懂“融四岁，能让梨”，分不均，打架，难为了福寿……

春茂永和大昌德的布都是土机织的粗布，白市布、青市布、阴丹士林就算是高档洋货了。

3. 药铺——北永合祥。

大生堂、裕升泰和北永合祥是房山城内有名的药店，后者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每家有位“主方”先生，他处了方，就在他店里抓药，真是财不外流！那时，抓药的人少。人们有病多吃“偏方”，或扎针。能到药铺抓药的或是富户，或是病人危在旦夕……上岁数的人常常怀古：那时的“先生”医术高明药也顶用……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老房山人人都知道：县城东北角城外，蒿草丛生处，总有席头子卷着的死孩子——便宜了那些饿狗……谁统计过人口死亡率呢！

4. 广泰公杂货铺

据谈广泰公是南方人的“东家”，资本雄厚……卖副食，也卖瓷器“碟碗”，卖石油、洋蜡……也卖点心、砂糖……高处纸匣上贴着“海参”、“鱼翅”的红纸字条，可我从没见过有谁买过。那时，城关附近的孩子去过广泰公的，常常向同伴儿显弄：“我到过广泰公……”比今天到过王府井百货大楼的还要骄傲……

我每阅读茅盾先生的《林家铺子》，便想起了房山县城当年的商店铺户……尽管他们“唯利是图”，但毕竟为房山提供了商品交流；更可怜的是，本来微薄的资本，还要受到中间人盘剥，承受官僚和官僚资本家的压榨，军阀间的香香臭臭，打打停停，实则是对民族工商业的掠夺，最后由日本军国主义给了这濒临倒闭的商户一脚，终于倒闭、破产……

1948年底，房山人民获得解放。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房山的工商业也获新生……我们的大大小小的失误，也给工商业带来了坎坷和曲折，但虽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毕竟走过了一个个新的里程啊！

多年的极左，使我极端厌恶“忆苦思甜”，但我绝不抱缺守残；房山的历史写下了房山工商业的真实发展。也给我留下了五十多年来的或鲜丽或暗淡的印象……我仅仅是对真实生活的记录，好心的朋友却说我“粉饰”现实，给过去抹黑，这公平么？！我呼吁：老房山人，趁有生之年多叙述叙述旧的房山，像“老犹栽竹与人看”一样，再为子孙留点儿历史资料！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作者系原区文联主席

房山煤业发展历史概况

张东升

说明：本篇所引资料，主要来自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版《房山县志》。其中所引地名，有不少与现

在名称不一致,为保留历史原貌,除个别明显错讹处外,不作更动,所引一些计量单位及数据,亦依原文。

房山山川交错,动、植、矿物之盛甲京西。《县志》载:“吾县矿业以十数,而以煤为大宗。”可见,煤业的兴衰,对房山经济影响极大。

房山煤炭资源分布,主要在两个地区:一是百花山向斜南翼,东起史家营、青土涧,经霞云岭乡四马台,西至蒲洼芦子水村;一是猫耳山北岭向斜南翼,自长沟峪向西南经周口店到龙宝峪村。历史上的开采,主要集中在大房山南北麓。南麓矿区有七:长沟峪;西庄—车厂;葫芦棚—下寺;长流水—黄院;周口店;羊耳峪。北山矿区有:南北窖;三安子;英水沟;杏园;南车营与万佛堂;煤岭;大安山。另外,山后有塘上、豹子水、芦子水。

房山煤的开采历史悠久,“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榷税于前清中叶”。据前人考证,木岩寺碑记创自天监二年,重新修葺在天庆(辽天祚帝年号)元年(公元1111年),碑上有“取煤于穴”的记载。可见,在辽之前,房山就有煤矿出现,开在埋藏较浅处掘穴取煤。然而,这只是开端。到元明以后,仍是小规模开采。到前清中叶,房山煤业才逐渐兴旺,而且由官方专司征税。《畿辅通志》“榷税”篇中记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宛平有煤窑一座,房山有煤窑九座,可见房山之煤业在当时较宛平繁盛,并且开始实行纳税。当时的开采主要集中在长沟峪一带。后来,有个窑商常某,知道长沟峪一带山峦的地质情况,见其岩石都是斜层,西高东低,窑内积水必自西向东泄。于是,常某察山势,辨地形,借地利之便,选择车厂西南山,凿山为穴,来泄长沟峪一带煤窑的水(其地俗名叫“嘴巴子”),窑业由此兴盛起来。一晃百余年过去,煤窑越挖越深,渐渐钻到“嘴巴子”水平线以下,靠嘴巴子泄水已不可能。现在这一泄水口有壅滞之虞,又有名叫李琴舫的人,购买机器抽水,于是煤业又进一步。

从辽金之前发现煤矿并开始挖掘,到清朝中叶以至末叶,前后几百年,采煤方法十分幼稚,而且颇不经济。矿区过小是个原因,且槽道倾斜不齐,宽者数十丈,窄的数尺乃至数寸,甚至夹有无煤的断层,俗称“夹子”。再者,囿于习惯不思改良,所以,始终用土法采煤。当时,窑业已有明确的分工。用人有界里界外之分:界外有掌房,有掌作,掌房专管银钱,掌作专管庶务,即在煤场管售煤等事务;界里有大伙计,管矿洞里的事,相当于领班。有斧子手,专管窑内棚子支架。有拉头,用荆筐拉煤。有水工,专管用柳斗掏窑里的水泄于最低的邻窑,层层递泄,象长沟峪的几座煤窑,有水就都从嘴巴子泄出。

煤业的发展,给煤区数十里左右的人们带来了实际利益。同时,围绕着采煤业,一些相关的行业也发展起来。采煤,就要开凿岩石,啃啮矿层,而这需要坚利的铁器,于是,铁匠这一行就日益兴隆起来。从窑里往外运煤,需要用专门窑筐,这样就出现以荆编为职业的编匠。挖出的煤要运出山,还要运到京津等地,这样,便出现了以运输为营生的养牲畜户,而这又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相比之下,有煤窑的地方,如大房山南北麓,比没煤窑的地方要繁富得多。渐渐地,不但本县的一些破产农民,就是异地他乡的一些农民,也被吸引到这里来,使这里人口激增,渐渐形成一个较大村落。大房山南北麓一些村庄的形成,是与煤的兴盛分不开的。

二

从清朝中叶开始,房山的煤业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交通运输的限制,无论采掘还是运销,都

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交通不便，使山乡长久闭塞，和外界很少往来，采掘始终是原始的方法，显现出文化上的落后和愚钝。崎岖的山路，运输极其艰难，直接影响到煤炭生产。

当时所产的煤，粗分可分为硬煤、软煤。硬煤即现在常见的煤；软煤即青煤，呈青灰色。又有一种是红煤，火力极大，凡熔铁者都用它，产地是大安山，因道路未修，驮运极不便。房山所产硬煤，上者销于京津，次者供烧灰、附近村庄使用。然无论销到哪里，都要靠牲畜驮运出山，所役牲畜一是毛驴，二是骆驼，骡马是少数。

当时，围绕大房山梁，南、北、东三面沟港都有驮运山璐。另外，大安山阳坡及河套沟也有驮运路。毛驴适宜走山路，无论多险陡坎坷，都能驮驮翻山梁而过。骆驼则不行，宜走平坦些的河滩路。当时一条主要驮运路，是坨里往里一直通大安山的一条路，从口头、漫水河入山，经磁家务、干河（秋后有桥）、东庄子、滑石片、泥洼、李各庄、河北、陈家台、班各庄、黑龙关、佛子庄、红煤厂，一直到大安山。进山出山一趟往返一二百里。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国人认识不到交通的重要性。直到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之后，始知交通关系到一国之盛衰，于是筑路之风兴起。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盛宣怀充任督办。二十三年，与比公司商议借英金四百五十万磅，勘明路线，分段并举，修筑芦保铁路，光绪二十四年路成。为解决铺路石料，光绪二十二年起，修周口店至琉璃河一段长约三十二里的铁路。先设站于韩继，续修至周口店至琉璃河。光绪二十九年，坨里至良乡二十四里铁路筑成。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房山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口店位于长沟峪及柴厂等地运煤出山的必经山口。未修铁路前，这里不过只是些小本经营。铁路修通后，这一地区很快发展起来，车站两侧商业林立。从前，运销外埠的一些货物，都要运到琉璃河码头，由码头装船，迤迤经水路向南到白洋淀一带，再向东可一直到天津。铁路修成后，便都由铁路运输，经周口店车站转运到外地。坨里原本无什商业，铁路修成后，商业点也纷纷涌立，和周口店情况一样，很快发展起来。

三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中国社会也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了。这一时期的特点：一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合法化，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房山煤业的步步走向兴盛，是和这一大的背景紧密相联的。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于是，一些有识之士也学着在中国兴办工业，修筑铁路和兴办矿山。另外是商业竞争激烈，也迫使一些资本家转到兴办实业上来。北平西部山区的煤矿，是华北有名的矿区之一，自然格外受人青睐。

光绪三十二年（又一说是三十一年），即1906年，天津商人王贤宾等人依靠德国人，拟修筑坨里至青港高线路。勘路之初，附近各村百姓以为于己不利，纷纷起来阻拦，并有北窖村张云甫等带头，联合各村士绅及以驮运为生的一些养牲畜户，群起闹扰。公司不得已而派人协商，且通过官方，运动经年，风波才渐平息。光绪三十三年开工，三年后路成，由坨里至青港七十四里。老百姓口头常说的“车轱辘朝上的车”，即指高线罐斗。空中一根钢缆，从这山头到那山头，三安子、南北窖的煤，便通过罐斗源源不断运出山，比牲口驮运效率不知高出多少倍。因这条线路要经过河套沟二十七村，经协商，公司与地方订立合同，自运煤之日起，每年津贴四千元作为二十七村贫民生计及国民学校东庄子高小校常年的款。

当王贤宾等合股修“坨青”高线路，北区（大房山北麓）绅商恐不敌，计合全县来抗拒时，王贤宾神疲意沮，不得不与北区绅商议和。南区绅商见此情景，怨恨王贤宾等人不与自己同谋，面官诉讼。王贤宾等

又用圆滑手段回头和南区接洽,以讨南区绅商喜欢。结果,南区乡绅不但不再争,并且将周长(周口店至长沟峪)路权也许给了人家。双方在官厅立案,“由是路权全归外人矣”。

这时,周口店到车厂的轻便路已在修筑。此路也是由私人组合,路资分摊。修筑这条轻便路,目的在于越过东岭(即猫耳山一线主山梁)来收三安子的煤。公司并在车厂穿井,名曰“大丰”矿,声言自采自运,不妨碍周长高线路权。高线方面明知有妨碍,但知道对方有要人作后盾,心下畏惧,也无可奈何。所以,津商虽占有路权,并不想真正修筑,只是见周车路动工,不得已而修,故工料全不如坨里至青港高线路。

这样,短短几年间,在房山出现了三条运煤线路:两条高线路,即坨里至青港七十四里高线路和周口店至横门的十四五里长的高线路;一条轻便铁路,即周口店到车厂的周车轻便路。房山所产煤炭,除少量仍由牲口驮运外,大部靠这三条线路运输,特别是坨青高线路。运输线路的畅达,促进了煤炭的开采,从而使房山煤业渐渐步入一个鼎盛时期。

四

房山窑业的第一个兴盛期,始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民主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在经济上,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后不久即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各地纷纷掀起了办实业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外地资本家风尘千里前来投资,在房山办起了一个个较大的煤矿。

外地资本家前来办矿,自然和当地封建势力会发生尖锐的利害冲突,但民族工业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为开发矿山,兴利除弊,政府颁布了“矿业条例”。条例中明确提出了“矿业权”问题。按当时当地习惯称呼:一曰“山主”,即原有地主,不在矿业上投资,仅有收租的权利;二曰“工本”,即由山主允许,可以在矿山投资与雇用劳力而取得采矿权,任其开采或转移他人的人;三曰“私查”,即由工本许可而进行开采的人,但定有年限。自矿业条例颁布后,大些的矿全要依照矿业条例呈请开采,小矿依照暂行条例,以取得矿权。

当时,在大房山南北麓办矿的,本地人虽居多数,但多是经营小煤矿。经营大矿,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实业家,有不少矿区面积在千亩以上。当时,登记在册的较大的煤矿就有三四十个。

比较有名的煤矿有:

北窖窑业公司,矿区五百三十六亩,民国二年开办,承办人为山西太谷人吴叔明;

长沟峪会兴矿,矿区面积三百三十七亩四十八方丈零六方尺,民国二年建,承办人为房山人常振兴;

车厂(属宛平)、长沟峪(属房山)大丰矿,占地三千五百四十一亩,民国四年建,承办人为江苏无锡人姚真。

另有几个占地千亩以上的矿:

李各庄至前山的伟业矿,占地一千七百三十九亩,民国七年建,承办人是四川华阳人孔庆睿;

三安子的三安矿,占地三千五百四十四亩,民国八年建,承办人为房山余杰臣;

安子的车大矿,矿区面积三千四百九十二亩九分一方丈七十五方尺,民国十一年建,承办人为家居北京的任济安……

除了一些较大的煤矿以外,房山小煤窑鳞次栉比,大多分布在西北矿区,而且大小不一,窑名亦不乏稀奇古怪者。其中长沟峪一带有大桶窑、下河沟、炕洞、南坡窑等四十七座;葫芦棚、下寺一带有康家沟、王作、猪窝窑等十八座;羊耳峪一带有大兴窑、奉先煤矿等十五座;三安子到前后山一带有义顺、得禄、

小泉等二十四座；周口店一带有六座……大安山、堂上、豹子水、芦子水一带小窑未统计在内，便有小煤窑一百一二十座。

随着采掘的逐渐加深，人们对大房山两麓矿层的认识也逐渐加深，不但对煤质能辨析，而且一一分出槽口。按当时习惯提法，房山煤藏共计十三槽（指硬煤），长沟峪一带仅七槽：一麻叶（或称蚂蚁）槽；二为三合槽；三黑煤大槽；四腰石大槽；五爆煤大槽；六红煤槽；七封口槽。

山北安子至车营（南北车营）一带有十三槽：一三合槽；二子儿槽；三黑煤大槽；四黑煤小槽；五腰石大槽；六腰石小槽；七犁儿光；八爆煤大槽；九臭煤槽；十红煤槽；十一封口大槽；十二封口小槽；十三二铤槽。

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在煤矿干活？又有多少人是本地人，多少人是外地来的？因没这方面的资料，无从谈起。但是，从房山煤炭的产额上，可以想象出煤业兴旺的程度。虽然所提供的数字只是粗略的统计，无确实调查，仍可以看出个大概。

据民国九年（1920年）统计，长沟峪一带煤矿冬日最多每日约出八百吨，平均年产十二万吨上下。每吨煤售价一元五角，块煤每吨三元，合计得利三十万元上下。周口店、葫芦棚、下寺、黄院、西庄到羊耳峪一带，年产不下十二万吨。南北窖、三安子、杏园、南北车营一带，有煤窑八十余座，其中三安子附近产煤由高线枝头福字号运至坨里，约计五万吨，其余煤靠驮运，不下八万吨，每吨一元二角。总计起来，长沟峪十二万吨不计在内，尚不下五十七万吨。由此推算：房山年产煤约七十万吨左右，每年获利当在五六十万元上下，得利不为不厚。

五

房山煤业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后十年左右的昌兴之后，又渐呈萎缩状态。这主要是受时局的影响，兵匪为患，官绅压榨，流弊丛生，使一些煤矿难以维持。另外，还有经营者间的矛盾和经营不善等一些问题，都直接影响到煤业的发展。

仅以运输线路为例：三条线路的修筑，从一开始修筑，就有不少波折在其中，几经周旋，及至路成之后，仍有不少坎坷。坨里至青港高线路，修成后没几年，风波又起。初承办人王贤宾获利甚薄。自孙鸿钧承办后，方获利甚厚。王贤宾见路有起色，想重新恢复。加上孙鸿钧获利后不履行旧约，引起当地百姓的怨恨。于是地方人众与王氏联合，遂起风波。事平后，地方上稍得利。后来战争迭起，高线的利益全归了军饷。

周长高线路，民国八年（1919年）修筑，自周口店至横门计十四五里，为坨里高线公司筑。当初路权本非该公司所有，是北线阻路风波掀起时，南线煤商不知保护路权，反与北线内讧，使路权落入津商手中。后人为此屡争，终不能得。周长路虽修通，一时工料皆劣，另外聘用日本之修造工程师，修造不甚得法，成后屡经损坏。况且运路太近，运费不多，所以未能获利。周车轻便铁路，由周口店修至车厂，原为转运大丰矿的煤。后因开采不盛，兼因时局有关，于是无形中停止下来。后来，又增添资本家合股，打算开山凿洞，外运三安子的煤，因时局有变，不久又停止下来。后来，坨青高线路又遭到严重的破坏，使山里的煤外运受阻，直接影响了煤的开采。一些煤矿，在这复杂的局面中难以维持，出现了倒闭的现象。另有些煤矿，虽未关闭，也是时开时停。房山煤业，从而出现了衰落景象，但仍具有一定的规模，较之灰、石板等业，煤业仍是房山的大宗。

六

马克思曾经指出：“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房山煤业的兴发，不知倾注了多少煤窑工人的血汗！

窑工的境遇是十分悲惨的。他们地位低下，被人称作“窑黑子”。当时分拉门子和背门子。拉门子干活，是用一根带子拽住窑筐，把煤从巷里拉出。有些小窑钻得很深，不能拉，只能背。窑工要背一二百斤的背篓，从“梯子”上一磴磴向上抓，有的窑最多下有十几个梯子。有的窑内闷热，在掌头上做活的要赤身裸体。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来年五月初一是开窑时间。窑工下窑，等于把自身卖给了窑主，无论挖煤、背煤或拉煤，都有定额，由工头监督，完不成要遭毒打，受惩罚。“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下窑的人，一天要干十三四个小时的活。到算帐时，还要扣去锅火费、筐费、电石费、打人费等。最酷毒的要数“关门屋子”（或叫“倒关门子”），工人被招来后，一进去先被剥光衣服，关进几间小黑屋子，做活在窑里，吃住都在黑屋子里，合同期满才被放出。设备简陋，采掘方式落后，使窑里事故频出。冒顶，崩水，毒气……很多人死后，被窑主偷偷抛到荒沟，任狼撕狗扯，家属连尸骨都找不到。1937年夏，长沟峪兴宝矿崩水，为抢救深层泵，一次夺去十九名窑工的生命。直到解放后，事搁十几年，尸骨才被挖出来。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少窑工被迫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有的在窑洞里集体罢工，有的想方设法对压迫工人的工头和窑主进行报复。据现在调查到的情况，房山长沟峪和前山等地煤矿，抗战前曾有个别从宛平过来的共产党员，在秘密地深入工人中，有组织地领导工人进行斗争。

七

房山煤业的发展，客观上促成了房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半解体，破坏了几千年封建经济的根基。由于煤业、灰业以及其它矿业的兴办和随之前起的商业的繁盛，使房出步入了一个崭新的经济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应是房山经济由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渡的时期。但是，同全国一样，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势力的强大，房山的经济不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而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939年春，日寇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这次行动之后，日军退到南窖，并在南窖构筑据点，做长期踞盘的打算。从此，房山大房山南北麓的煤炭资源，成了敌寇疯狂掠夺的目标。日军在南窖建了据点后，接着在坨里至青港高线路沿线各村建了据点，安子、北窖、河南、磁家务、坨里，据点林立。另外，日军在大房山南麓的房山、周口店、孤山口、长沟峪等地都建了据点。日军修复高线路，疯狂掠夺房山的煤炭资源，使房山煤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矿床遭到严重破坏，工人命运更加悲惨，困苦不堪。日本投降后，不到一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又控制了这一地区。直到1948年底，房良全境解放，矿区才又回到人民手中。

解放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房山的煤炭事业才真正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在家做了主人，旧社会的“窑黑子”成了自家的工人阶级。本文因着重反映房山煤业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故不再细写解放后房山煤业展现的这新的辉煌篇章，以后有机会，定将补上这一页的，因为，这才是房山煤业光灿的一页。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北方的石都——房山

邵文古

如今在北京房山城西南云居寺内保存着一部世界闻名的文化珍品“石头书”(叫做石经),这部书的重量约有 1000 多吨,共有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石板。先刻的是单面,后刻的是双面,它是北齐(公元 560 年)佛教徒静琬大师怕这本佛经失传,立志倡导刻石头书以便流传千古,于是选中风景幽美的特产精美石料的房山白岱山发奋刻经,那时也算做是空前绝后的伟大创举,当今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从隋开始到明初完成。经历了(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一千多年的时间,佛教弟子们接连续刻,最后大功告成。“石经山”由此而得名。这就是房山利用石料最早的记载。房山境内琉璃河地区董家林村又发现了西周的古城遗址,由此证明三千多年前这里已有相当发达的建筑材料的开采和制造业。

公元十一世纪的北京是燕国的都城,以后的元、明、清也都建都于北京,先后共有三十三个皇帝盘居在这里,在紫禁城内享受着他们心目中的至高无尚的荣华富贵。因此,紫禁城自然的形成了反应帝王生活的象征,这座宫廷建筑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物的代表。整个故宫(紫禁城)占地面积七十二万平方米,有房屋九千九百多间,再加上北京城的各大王府以及宫宦贵族的四合院,历代的皇家花园,皇陵古墓,这些优境动人,虚幻迷离之地……处处都有精美的石料在建筑上的应用,构成了现在的古建筑群之美。在当初工业交通不发达的年代里,运输大块的石料这是多么艰巨的工作。

《元史》有专门记载,元大都设有采石局,专门负责从各地采集最名贵的石料,其中汉白玉的来源都是房山所产。重达二十来吨的石料车拉不动,必须在冬天取水泼冰拉蛙船来运送,大块荒料运到北京(70 公里的路程)起码要二、三个月的时间,当地面上不能结冰时,就用四轮马车运送,需要好几辆连结在一起,十几匹到几十匹马和骡子同时拉车,这叫做走连车。一部大型连车要有几十人到上百人来开路护送,当初的道路非常难行,从房山的石窝村到北京全是土路,而且道路坎坷崎岖不平。有皇差任务必须要昼夜运输,快则也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北京。当我们看到首都北京的古建筑时,情不自禁的对我们的祖先表示亲佩和敬仰,这些古建筑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明清时代故宫的石材使用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宫殿的基座多用大理石或汉白玉建造,石栏杆和石踏跺都经过精工细琢,大量的石制小品,如华表、石狮、日晷、嘉量、石螭首及石椅、石凳等都是构思精巧,独具匠心。它是我国建筑学和建筑材料科学的伟大成就,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成为辉耀千古的建筑杰作。北宋崇宁二年(公元 1103 年)主管工程的李诚奉敕编修的《营造法式》一书,是我国古代一部最完善的建筑古籍。当中,第三卷石作制度、第二十六卷石作料例,第二十九卷石作制度图样,是历史上第一次对石材的构件名称、制度、做法、用料定额、质量标准以及对物件雕琢、修饰的部位和手法都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显示了我国石材业在技术和艺术上已达到了娴熟的程度。

从地理环境和岩石形成特点来看,房山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从石料对历史的贡献也有很多文献可查。营造故宫和修筑明陵,清陵等主要石料都是取自房山,尤其是石窝村的汶白玉。最近笔者来到石窝村参观,一进村到处可见汉白玉的碎块和一处处露天开采的石窝,方数十丈有余,自上而下进深取石,自然形成了一座座巨大的汉白玉的石窟,有的就是当年修造故宫时留下的遗迹。由于年深日久,有的石窟已变为碧水清波的水潭,当地的百姓把它叫做白玉塘,再陪衬着清幽状观的山村景色,犹如神话般的色彩和美妙动人的画面。目前,故宫的最大石雕在宝合殿的后面,原是明代石雕,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年)凿

去旧石的花纹重新雕刻,这块佳作石长16.75米,宽3.07米,厚1.7米,重200多吨,石料采自房山石窝。石刻四周有缠枝花纹,下部为海水江天,中间雕着流云衬托着九条蟠龙上下飞舞,升龙、云龙,形象生动,雕刻精细,一丝不苟,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石窝村开采汉白玉从历史上就是只能出荒料,不能细加工,开采技术原始,光靠人力和手工劳动。现在石匠们还是用铁锤撬棍加楔等手段择易而采,择优而采,采浅不采深等,不能合理的利用矿源,造成很大浪费。离石窝村不远就是高庄,这个村可以说是个雕刻之乡,个个都是能工巧匠。有的全家都从事采石雕刻的职业,形成传统的技术和独特的手艺。高庄和石窝的艺人在历史上也有过突出的贡献。老人们回忆说:“当年修故宫、建皇陵、刻石碑、走连车,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可想而知当时的繁华景象。一代一代的相传,至今高庄还有一批雕刻能力很强的队伍,目前他们还做些石狮子墩和仿古的雕刻等以及旅游产品,象观音菩萨、盆景盆、水仙盆,有的上面刻着天女散花和二龙戏珠等。雕刻得活龙活现,栩栩如生。

房山的汉白玉的储量丰富,质量好,在石窝、高庄一带从东北到西南分布范围很广,矿藏稳定,质地良好。汉白玉顾名思义,它白如雪,坚如玉;表面如霜。就象无釉陶瓷,石料的通体遍布着银星小点,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是大自然的伟大杰作,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不但要珍惜这种天然的好资源,而且要合理的开发和用以造福于后人。

房山的大理石汉白玉资源情况据有关的探明的资料,其重要产地在南尚乐乡塔照村至长沟六甲房一带约12公里的范围内,总厚度约在10米左右,仅高庄石窝两处现已探明储量380万米,远景储量相当可观,各类石料总和可能达到1000万立方米以上,品种包括汉白玉、芝麻花、芝麻白、螺丝转、青白、艾叶青和麻子石等,用这些很形象的富有诗意的名称来代表大理石的规格,这也是劳动者的创造。由于储量多范围广,现在已有采场十余处,并附有加工场,大都以板材和荒料为主,销售国内外。

最近,在坨里地区又开发新的大理石资源,叫做彩色大理石。颜色和花纹都很好看,奇形怪状的图案可以直接使用或拼接的方法做成大理石风景壁画,效果逼真。这种材料不但是建筑材料,而且还是一种艺术品,深受用户的好评。今后展望:

1. 开采方面因为还是传统的办法,技术落后,效率低。另外目前还使用炸药的方法爆破,使整体的理石遭到震裂,出大块率很低。据开采部门现场估计大于1立方米的石料只占10—20%,而小于1立方米约占70—80%,造成严重浪费。区新技术开发中心研究利用无声裂石剂的方法进行破石技术,这样不但大块率高而且减少了浪费,并且从矿石的纹理结构上研究开采方法。

2. 加工技术落后,切割技术和打磨技术不够先进。只能切割2公分的厚度而国外能切0.7~0.8公分的片材,理石的表面亮度比国外差距也很大,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

3. 销售环节:用石料的厂家和出口公司直接向理石产地订货,这些用户掌握石料资源以后,有的经过加工,身价大增,有的转手高价出口,吃亏的就是产地。造成工贸之间产销价格矛盾加大,影响产地的发展。

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的理石和汉白玉占世界总出口量的第三位,仅次于意大利和法国,尤其是这个北方的石都——房山,有着天然的石料优势。随着城市建筑事业的发展,今后国内外对大理石、汉白玉、花岗岩和花岗石等需求量将会越来越大。房山的石料虽然历史悠久,储藏量大,质量好,但还不能大规模地有计划地科学开采,因此,需要引进先进的设备,来加速我国古老的加工技术的改革。当今改革的春风,吹遍了这座山城,他们决心要把石头资源变成巨大财富,区计划成立大理石的开发研究机构,从矿源的开发,片材的加工,汉白玉的雕塑以及园林用石,生产一整套全系列的各种石头产品供应国内外建筑领域,以高质量高标准的崭新面貌打入世界市场。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作者系原区科委干部

良乡风土辑略(一)

吴祥祉

一个地区的风土民情，分散地看，往往是孤立的、各别的现象，它包括的面广，琐琐碎碎，人们习以为常。但是合起来看，就表现出一个民族和国家特有的整体风尚，它来源于生产生活，又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它随着社会的前进和时代的推移，缓慢地形成和变化。因此它是一个运动着的庞大的多层次的系统整体。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大变革当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流传的世俗民情，就会在一个较短的时期中，来一个较大的变化。特别是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创建了全新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而且用科学的唯物的世界观，推动了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从而在建国后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在我国的传统的风土民情的基础上，掌握了其产生的渊源和其发展规律。因势利导，去粗取精，取得了除旧布新，大改旧观的效果。

本文就是在良乡地区这个小范围内，收集解放前当地风土民情的遗存，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轨迹。所谓“辑略”，就是略去当前仍在健康发展的民俗民情，重点追述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的部分，拿来和现在的风俗习惯对比，用以说明政治经济的变革对风俗习惯的影响和我党在移风易俗、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

几处建筑遗址

解放前，良乡县城墙周长四公里，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每个城门上各有城楼一座。城门外有半圆形瓮城，在瓮城的斜侧，开一个与城门同样大小的侧门，既便于防水，也便于御敌。城墙用特别的大型城砖砌成，内夯以灰浆黄土。1958年后全部拆除。

旧良乡县公署(即良乡县政府)，位于城内西城根(详见《良乡县志》)。1939年洪水冲破西城墙而入，半个城区，顿成泽国。居民房屋倒塌无数，整个县公署全被冲毁，只得迁往东街，借驻富户吴凤鑫的宅第办公。

旧良乡县城内，庙宇林立。计有城隍庙、关帝庙、孔庙、天王寺、文昌祠、节孝祠、五道庙、六道庙等。南街路西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基督教堂，西街有一个天主教堂。以上各寺庙在1948年解放前基本完好，无大损坏。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的鬼神崇拜和宗教信仰。现在都已拆毁，改建了民房、工厂和学校，就连昔日的遗址，也难辨认了。唯有孔庙的大成殿仍存，现在是良乡中学的图书馆。在旧县公署的东侧，有一个广场，据说名叫“马号”，是古时帝王从北京发出的诏旨谕令，由差官快马传递的驿站。良乡距北京七十里，正好是第一站，换马不换人，继续南下。但早已无迹可考，只留下一个“马号”的传说。

其它名胜和古建筑，见于《良乡县志》的，这里就不重述。

工商市容和商会

良乡地处北京的南大门，清朝末年又修建了平汉铁路，确是南北交通要冲。但多年来地瘠民贫，物产不丰，经济不振，加之贪官污吏，中饱私囊，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军阀混战，兵连祸接，良乡首当其冲，几无宁日。工商业务，风雨飘摇，只是一般维持而已。当时根本没有工业，更谈不到现代工业。仅有前店

后厂、进行简单加工的小作坊和小手工业，实际是工商合一的性质。

现在把解放前的工商各业总的情况，列表于下：

行业分类	数目	行业分类	数目
烧锅(白酒厂)	2	茶叶店	1
中药店	5	当铺	1
杂货铺	5	首饰楼	1
粮店	3	黄酒馆	1
布店	3	饭馆	2
盐店(专卖)	1	澡堂	1
醋酱房	2	小旅店	3
棚铺	2	裱糊匠	2
棺材铺	1	绒线铺	2
嫁妆铺	1	编席	1
铁匠炉	2	麻绳铺	1
兽医	2	理发	2
石板公司	1	合计	48

共计有 25 个行业计 48 家工商业。不难看出，由于解放前后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变化，工商行业变化也是很大的。首先看一下解放后消失的行业，其中有盐店、售棚铺、棺材铺、嫁妆铺、石板公司、当铺、首饰楼、黄酒馆、裱糊匠、绒线铺、醋酱房、铁匠炉等 13 个行业。其中有的是因为解放后体制改革，或者行业改组而变化的，而不少的行业由于风俗习惯的变革而消失的。如棚铺原来是承揽红白喜事、高搭席棚、出租仪仗执事、“棺罩”、“花轿”，承包“吹鼓手”等业务的行业，解放后自然不能存在。又如石板公司是本地区略有工业生产性质的行业，它主要生产小学生用的石板石笔和砚台。这些个行业，也由于已被铅笔和练习本所取代了。

由此可见，一个地区的工商业务，往往反映了当地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它既是当地风俗习惯的组成部分，也受风俗习惯的影响而变化。

其次谈谈商会。商会是由行会发展组合而来的，主要是代表地方的工商业务的利益。商会会长是由当地殷实的工商业经理担任，周旋折衷于地方官府，因而也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他有维护资本家利益维护官府统治的一面，也有兴办一些地方福利事业救济事业的一面。在抗日战争年代，良乡商会扮演了不少投敌资敌的角色。如协助敌人稳定市场，推行地方摊派，压榨百姓，并发行过小额钞票，缓解当时敌人经济拮据、流通不畅的局面。当然也出面搞过民间节日文娱活动，如组织庙会花会灯会等事项。

在集市贸易中，有经纪人的行业。也叫“牙”行。他们专管在粮食、牲畜的买方与卖方之间，议定价

格，并以公证人的身份，量斗过称。在粮行叫“斗子”，在大牲畜买卖之间叫“大牙行”，在卖鸡行业叫“小牙行”。这些经纪人，都有固定的人数，并经官府认可，因此他们也形成一种带有垄断专利性的行业。他们从成交的价款中，按固定比例收取“佣金”即手续费。因为他们的收入比较固定而且优于一般劳动人民，“旱涝保收”，所以形成一种家财产业。此行别人不得染指，父死子继，世代传承。

在本地区的粮店和殷实的烧锅等行业中，平时除经营门市售货外，还多兼营倒买倒卖粮食的业务，习以为常，形同合法，官府也不加干预。从而又形成一个装运的行业，本地叫“扛生”，意即“脚行”。他们也有自己的组织，固定的人员和名额。

在本地的工商大户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多由外省市的人出资经营，当时的资本家叫“东家”，多是山西、山东、天津人。经理叫“掌柜的”，也不少是外地人。这可能是本地经济不发达的表现，或者本地人商业意识不浓厚的表现。

庙会与集市

解放前，良乡每年有两次庙会。一次在旧历三月，叫三月庙，一次在九月，叫九月庙，会期4—8天。地点在城隍庙，这就是“庙会”一词的由来。庙内庙外，商贾云集，竞相叫卖。庙东的广场，划片分区，形成临时市场，俗名“后海”。城隍庙座北向南，买卖交易与烧香还愿同时进行。正南方有砖木结构的旧式戏楼一座，每届庙会，都请来戏班助兴，增添了气氛和声色。每天演出早、午、晚三场，剧种有河北梆子飞崩崩戏(即后来的评剧)和京剧。平时没有剧院的乡镇，庙会满足了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因此兴趣甚浓。庙会摊贩种类甚多，以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为主，兼有饮食小吃和说唱杂耍等民间技艺等。在生活用品方面以卖估衣的、卖布的、卖木梳筒子的、卖腿带子袜子的最多。在生产资料方面，有卖扫帚的、卖木铎木杈子的、卖缸的、卖杨木竿子的等。另外有一份挨一份的卖大柿子的、炒栗子花生的，差不多形成了十条街。

这样，庙会就解决了群众物资交易与群众文娱生活的两大任务。集市是由古代“以物易物”、“日中而市”发展而来。旧良乡城呈正四边形，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插在城的城的正中。俗名“大角”。这是中国中小城市建设的典型。庙会是较广泛的、大型的物资交流形式。而集市是平时定期的、小型的交流形式。但庙会不做粮食交易，集市则开辟粮食市场。农民赶集，往往是先出售粮食的钱买回生活用品。良乡的集市每十天四个集，名曰“一西、六东、三南八北。”这指的是摊贩的集中地点，初一在西街，初六在东街，初三在南街，初八在北街。进入年终腊月，交易量大增，包括各种年货的摊贩，也随之猛增，这是因为农民平时辛苦劳动一年，省吃俭用，一到过年，都要力求丰盛一些。所以这时的四条大街，都摆满了摊贩，就不分东西南北街了，名为“滥市”。最后一天，阴历三十，俗称“穷汉子集”，是说有钱的早已把年货备齐，只有“穷汉子”才挨到最后一天采买。在各种年货中，以年画、窗花、鞭炮、香腊纸码、神像、春联等最为畅销。一般工商各业以及集市春节休息五天，正月初六开市。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良乡风土辑略(二)

吴祥祉

男婚女嫁

长时期以来,我国阶级社会的婚姻关系基本上是经

济关系的体现,即所谓“门当户对”,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宰,不但没有婚姻自由,而且婚娶仪式又有多种规约和礼法,形成一套不成文的习俗制度。摘要叙述于下:

换庚帖:多由“大媒”(即媒人或媒婆)中间撮合,按男女双方的年龄、属相、生辰八字,往来于双方家长之间,提出建立婚姻关系的设想。

放定:经过双方同意,互相交换定礼,如手饰、戒指等物,初步建立了婚姻关系。

过礼:男方以鸡、鸭、整猪、整羊送往女方(北京城内则强调整鹅),算做正式聘礼。女方接受后,完成了“订婚”仪式。

择日子迎娶:经过双方酝酿,由男方提出迎娶的日子,一般提两个日子,请女方考虑、确认。

过嫁妆:在迎娶之前,女方以新房摆设及衣箱、被褥、衣物等礼物送往男方,叫“过嫁妆”。

迎娶的一般仪式:男方准备花轿两项,一红一绿(民国后改用汽车),吹鼓手(即民间乐队,包括八面大鼓),全副执事(包括旗、罗、扇和金瓜钺斧朝天蹬等),鼓乐喧天到女家并由男方近亲陪同迎娶,回来新郎乘绿轿,新娘乘红轿,由女方的近亲等人陪同返回。

拜天地:这是一项重要的仪式。解放前家家都在院内供有“天地爷”,天地爷是一家中至高无上的神,主宰一切,所以新婚夫妇要首先对它行跪拜礼,一是求得它的认可,批准婚姻有效,二是求得它的赐福。

戏剧舞台上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相拜,搀入洞房”,未免简单了些。实际上,本地的风俗,新婚夫妇拜完天地之后,还要对参加婚礼的所有亲族长辈逐个地进行跪拜礼,俗称“双礼”。

亲友入席:就是就餐。旧社会都是官客(男)、堂客(女)分席。席间要有新郎官敬酒。至于筵席丰盛与否,要看本家财力如何。从质量上看,有燕翅席、鸡鸭席、鱼肉席等,从数量上看,有“八八”、“十二八”、“四四”等,“八八”是八个盘八个碗,“十二八”是“八八”之外再加四个小碗,“四四”是较高级别的筵席,在“十二八”之外,另加四道干果,四道鲜果,饭菜质量等级也就相应提高。

接回门:婚后三天,女方到男方接走新郎新娘,回娘家款宴一天。

接回九:婚后九天,再接新郎、新娘回女方款宴。

拜新年:结婚后第一个新年(旧历),新郎新娘要带着礼物到岳父家拜年。

总之,其它礼仪规章还很多,必须谨遵勿违。特别是在农村,不能少有疏漏,否则轻者“挑礼”,重者兴师问罪。婚前婚后合计,远近亲友,送往迎来,烟酒糖茶,佳肴盛宴,蒲包果匣(即现在的糕点匣子),衣物钱财馈赠无穷,各有名称。小康之家,负债累累,糜费之风,至今未息。

丧葬殡仪

旧社会丧葬之事，深受两种思想影响，一是儒家的过于拔高的孝亲思想，认为“天地君亲师”，是无尚崇高的主宰。把父母之丧，看做是家庭中的头等大事，所以在灵堂的正上方，要悬“当大事”的白纸匾额。二是受佛教的迷信思想影响，以为人死后，魂归西天，但仍要过现世人的生活。所以要有丰富的殉葬品以及金银财物衣饰，甚至房屋等生活日用品（皇帝则保留殉人的制度）。还要有虔诚的超度，才能轮回转世。所以丧事中充满封建迷信思想和色彩，繁文缛节，名目繁多，世代相传，有增无已。不然，就为不孝，形成习俗。加之地主资本家为了显示豪富，极尽挥霍浪费之能事。累得亲友邻里，都要置备礼品相送，不堪负担之苦。有的丧主经济上本无力大操大办，但由于顶不住舆论压力，宁可典房卖地，倾家荡产，也要勉力筹办，生怕落个不孝之子的骂名。当然也有的儿女，父母生前，不肯孝敬抚养，死后却要大办丧事。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关于丧葬的规仪和程序，非常繁琐，实难尽述。现仅简要记叙如下：

入殓：死者“咽气”之前，要穿好“寿衣”，据说这样才能真正穿走。由长子“抱头”，近亲人等共同抬入棺木。随着死者入殓的殉葬品，少不了要尽可能多地放入金银翠玉等物品，棺木则选用榆木、桑木、杨柳木、松柏木以至杉木十三圆、金丝楠木等，真是精益求精，这就要看丧主的财力了。贫苦人家也有死后靠亲友领着孝子（死者的儿子）到各家磕头，敛来捐助，买口薄材草草掩埋而已。一切所谓丧葬礼仪，都是中上人家的事情，与贫苦人无缘的。这就是阶级社会的所谓“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吧！

报庙：人死之后，全家人第一件事，就是要到附近的五道庙或六道庙（相当于阎王爷的派出所的小型庙宇）替死者报到，而且每日三次，一直到抬埋。

挂孝与报丧：要尽可能快地全家人等穿上白布孝服，要请邻居帮助，连夜赶制。男的要穿孝袍、扎孝带、戴孝帽；女的要穿孝袍、扎孝带、戴孝箍。男女都要把青布鞋外缝上一层白布叫“白鞋”。为了区别亲疏远近，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叫“五服”。现在都成历史的陈迹了。

同样紧急的是尽快到至亲家“报丧”，要由死者的儿孙亲去报告死亡经过。否则亲友有权提出意见。

封门、出殃榜、发讣告：死者家门要用白纸封贴，再把死者姓名、死亡的时间公布在大门外。讲究的要糊一个纸楼，叫“殃榜楼”，通知亲友。中上人家则要印发“讣告”，也叫“讣闻”。“讣告”有一定的格式和套词。其词曰“不孝男××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妣）××于年月日时寿终正（内）寝……”。旧社会父死曰“考”，母死曰“妣”。男死称“正寝”、女死称“内寝”。“讣告”的内容还要把殡葬的仪式活动与日程通知亲友。“讣告”的名称，现在也还沿用，不过形式与内容，都已改变。旧社会“讣告”由丧主自己印发，全家具名，现在改由治丧委员会出名印发了。

设灵堂：要在正房设置灵堂，死者灵柩安放正中。灵堂布置肃穆，以白色彩活鲜花装饰。灵前设置月台，灵堂正中上方书写“当大事”白纸匾额，左右书写“寝苫”“枕块”两方小匾。死者子女儿孙分男女跪灵柩两旁守灵，也叫“陪灵”，意思是不能安睡床褥，要铺草席、枕木块以表孝心。同时要在庭院高搭起竹大棚，四周悬挂祭幛挽联，墙下放置纸活花圈，大门外有的还要搭过街大棚。

送三：据说这是死者灵魂在第三天下午，要到阴间报到，子女要糊一驴车相送，死者为女的，还要糊一头纸牛，叫“送三”（因为“出殡”才是死者魂归西天、身入乐土的最后离别）。丧家也要请僧、道超度，鼓乐送行，亲友邻里都要携带金箔祭礼做第一次吊唁。傍晚，连同驴车纸牛，送至“五道庙”或大路口，用火焚化而告终。

出殡：这是丧礼中最主要的仪式和活动。第一天叫“开吊”，意思是活动日程开始，正式接受亲友吊唁。从开吊到发引（即入葬），一般人家，有办两天的，有办三天的。大门前设乐队（俗名吹鼓手），有人来吊，

即奏乐以示迎接，同时通知院内家人。前院设有专人进行来客登记，接受礼金礼品，举凡祭、幛挽联、花圈、果供金箔、官吊大纸都必须一一登记入库，吊者办完手续，即直奔灵堂，习俗是先哭后“祭”（“祭”，就是在死者灵前进香，行跪拜礼，年岁大的吊者，行三鞠躬礼）。祭时灵前另有一组雅乐伴奏，倒也显示出我国“礼义之邦”的风度。祭完即有“知客”（专门招待客人的人）。引到别处休息，或慰问丧主，等待开席（开席，即就餐）。

在这两三天的时间里，满院摆满纸活，包括纸糊的童男童女、金山银山、一楼二库。旧社会专有这一门手艺人叫“裱糊匠”，家庭手工作坊形式，承办裱糊活业务。

所请僧道鼓乐诵经，超度亡魂，反复巡回参灵进香，远近亲友，人来人往。此外，还有几项重点活动：（一）点主。人死后要设立木质灵牌叫“神主匣”。史载：文王死，武王载木主以伐纣，即指此。恭楷墨书死者姓名生辰及死亡年月日时，以备长久供奉。在大殓之日，要请有名望的官宦，特别是有功名的人，如进士、举人等做为“点主官”，要鼓乐大轿迎送，由“点主官”用朱笔点神主。然后丧主三叩头致谢。有四名襟绅先生作“礼宾”赞礼，自然也是鼓乐伴奏，气氛肃穆。（二）夜晚僧道设坛诵经，俗称“上座”。超度亡魂，早升仙界，有所谓“传灯”、“放焰口”等活动。鼓乐诵经，直到深夜“下座”；（三）“堂祭”。这是在出殓前夕，死者全家祭别的仪式，也很隆重。先由死者晚辈在哀乐声中，逐个向死者灵前致祭告别，再由一人跪读“祭文”。“祭文”的形式与作用大抵象现在的“悼词”，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古人祭文有名的有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读完在灵前焚化，然后“举哀”，就是以全家放声恸哭而告终；（四）装罐。这也是出殓前夕的一项活动。人们认为：人死后仍要吃人间菜饭，所以用一个一尺来高的小口瓷罐，在鼓乐声中把灵前供桌上的菜饭供品装进瓷罐，但限于瓷罐容量有限，只能把供桌上每一项供菜和果品，米饭馒头，各夹一块，装入罐内，装满为止，再大的罐，也不够长期食用，自然是象征性的。最后用红绸丝线封口。这个罐在送殓行列中，固定地由大媳抱着送葬，别人似乎没有“抱罐”的资格（此罐一直随葬入墓）。

最后一天，在所有人等酒饭之后，时快中午，就要起灵发引了。这里简要的说说送葬的规模和队伍：送葬队伍最前边是“纸活”和“执事”，包括开路魁、打路鬼、松狮、松人，纸糊的童男、童女、男女佣人，金山银山，一楼二库等。“执事”也就是仪仗队，包括旗、罗、伞、扇、回避牌、肃静牌等，每件都需雇用一人，手打着分两行有秩序地前进。后面跟着的是“影亭”和“铭旌亭”，“影亭”是死者的画像或放大的照片，端放在一顶由白布扎彩的亭内。“铭旌亭”是另一个很高的亭子，也是用白布扎彩。中间悬挂着宽二尺、长两丈的大幅红绸，叫做“铭旌”，上面用金粉书写死者的家世、官爵、封赠等称号，用以表明死者的身份。下葬后，复盖在死者棺木之上（关于“铭旌”，可参看《红楼梦》第十三回和十四回）。

在这后面，就是乐队，僧在前，道在后（北京城内还有尼姑、喇嘛，民国以后还有现代鼓号乐队），地方吹鼓手殿后。真是鼓乐齐鸣，声闻远近。

再后面是男亲友，戴白花，系孝带，步行送葬。再后是死者子孙晚辈按五服制分亲疏排列成队，大儿子打幡，二儿子抱灵牌，这也是固定的规制。

紧跟着孝子行列的就是死者的灵柩，放在一个锦绣鲜艳、光彩夺目的巨型“棺罩”里。由九十四名身穿罩衣、头戴翎毛小帽的人抬着，缓缓前进（根据丧主的财力，也有用三十二人、十六人不等，贫苦人也有用八人“小请”的）。在灵柩之后，是妇女送葬的轿车行列。第一辆坐的是死者的大儿媳妇边哭边行进。乘坐的顺序，也是按五服制分亲疏排列，远支妇女，则乘坐最后几辆。这样浩荡的送葬队伍，要摆一二里地。如此穷奢极侈的送葬，在旧社会也只是少数剥削阶级才能做到，穷苦人家自然简单得多了。

到了墓地，还要在鼓乐声中缓缓下葬，事前要打好坑（即墓穴）。少不了还要请阴阳先生，手持罗盘，看风水，定方向才能下葬。然后将殉葬之物，安放在墓穴之中，将所有的纸活、挽联等付之一炬。殓葬到

此结束。然而殡葬后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安排。首先要把送葬时的“影亭”抬回丧者家中，叫“回影”。同样要有“执事仪仗”和乐队，一路吹打回家，神主、画像一并供奉在长子房中。第三天，死者子女要到墓地填土，叫“圆坟”。“五七”（死后35天），要给死者糊一纸伞、焚化。六十天，要给死者糊一只大船，焚化。一百天，周年，都要举行追悼纪念活动，至近亲友，也要参加。三年之内，死者子女都要穿青布素服和白鞋，以表哀思。三年之丧，至此结束。

以上习俗，有些源于《周礼》，世代相传，有增无减，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莫不极力提倡，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形成几千年不可改变的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观念。劳民伤财，莫此为甚。影响了生产，影响了生活，同时禁锢与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用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人民，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大力提倡婚丧简办，人死实行火化，彻底摧毁了腐朽的旧制度、旧礼教，一切为劳动人民着想，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百姓称快，功莫大焉。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良乡风土辑略(三)

吴祥祉

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四个方面，首先要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还要受周围环境和邻近地区生活习惯的影响。互相交流，彼此融合，因而不同地区还有不同的习俗特点。

良乡位处大(兴)、宛(平)、涿(州)、房(山)的中心，是古都北京的南大门，风土人情自然和北京以及其周围邻县有很多相同和相似之处。

解放前，劳动人民大多是短裤短袄，自然是便于劳动。知识分子、公务员以及中上阶层，就要穿长衫。这在鲁迅笔下关于咸亨酒店的描绘，是再生动不过了。节日盛典，中上阶层还要外罩马褂。衣料主要是棉纺布料，劳动人民以粗布为主。知识阶层则以洋布为主。只有中上阶层，才能有皮、棉、夹、单、四季服装之分。绫罗绸缎更是极少数人才能够享用的。寒冬腊月，破衣烂衫，衣不遮体，瑟缩街头者，比比皆是。民国以后，小职员和知识界，有的脱掉长衫，开始穿布料中山装，偶尔有人穿上一双从外地买来的球鞋或皮鞋多则被认为是非常值得羡慕的。

人们一般穿的是家做布鞋，是值得一提的。它非常经济实惠，称得上是废物利用。细心的主妇，平时把裁衣时的边角废料碎布片积累起来，把不能穿的破旧衣服拆成布条、布块，俗称“铺陈”或“铺扯”（原北京西珠市口有铺陈市胡同）用稀浆糊打成“裕(gē)褙”，或叫“褙子”，积累数层，做成“鞋底儿”。再用麻绳密密麻麻地纳牢，叫做“纳底子”。然后仍用裕褙做成“鞋帮儿”，外面包上青布，做为“鞋面儿”。讲究的用呢绒做鞋面儿，妇女、儿童要在鞋面上绣花，争奇斗艳，美在其中。最后把“鞋底儿”、“鞋帮儿”用麻绳连结，叫做“纳鞋”。这样，一双新布鞋就制做完成了，穿起来非常舒服耐用。城乡妇女，人人会做。

解放前，良乡没有卖鞋的商店(只有一家“底局子”，专做鞋底，供应北京的鞋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岁月里，农村家家做军鞋，成了妇女的光荣支前任务，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但是，不管布鞋是如何经济耐用，随着时代的推移，特别是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今天，即使是农村，也没人再做布鞋了。

食的方面。人们一日三餐吃的是本地生产的五谷杂粮。解放前，由于地方水利不发达，千百年来不生产稻米，所以根本吃不到大米。虽然一部分好地能种小麦，但产量不多，就是中小地主，也不敢天天吃大米、白面。劳动人民的主要粮食就是小米和玉米面了。搭配着吃些豆类、倭瓜、白薯等。鱼肉更是不敢问津。一般人家在房前屋后种点蔬菜，不敢整亩整片种菜。所以人们常说“窝头、小米饭”是“本命食”。其实，也还有很多“糠菜半年粮”的和“揭不开锅盖”的人家。现在本地区城乡一般人家都已解决了温饱问题，用大米白面代替了玉米和小米。

劳动人民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只有在过节过年的时候，才能适当地改善一下生活。当然，这里还有一定的人家，是宥于习俗的关系，勉为其难地支撑，不这样，怕人家笑话的。其它如端午节包粽子，八月节吃月饼，春节吃饺子，腊八喝腊八粥，廿三吃糖瓜，灯节吃元宵等，都是一般人家传统的不可更改的习俗，很多延袭到如今。

常言说：“穿衣吃饭亮家当”，在没有摆脱贫困的条件下，人们首先考虑的自然是填饱肚皮。解放前全良乡县城只有一家常年菜摊，本地几斗“菜床子”，蔬菜品种很少，代卖水果，价极昂贵，实际上只是供应极少数中上阶级享用的。要和现在农贸市场上蔬菜水果，堆积如山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所幸在良乡县西面与房山县为邻，房山西部多邱陵山地，盛产水果，特别是大柿子最多，肩挑驴驮，到良乡售卖的不少。人们议论最多的还有“良乡栗子”，远销南方。实际上，良乡并不产栗子，所谓“良乡栗子”，想是房山栗子到良乡上火车，作为货运，在货运“飞子”(即每件货运的纸牌)上，注明起运站是良乡火车站，因而得名。在良乡地区，每逢九月庙会，才有卖栗子的，即所谓“赶庙”一般都是自带大锅，现炒现卖。庙会一过，市上糖炒栗子就绝迹了。

至于饮料行业，解放前，现代的啤酒、汽水、冰激凌，人们好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酒类只有本地生产的白酒。全是论斤散卖，根本没有瓶装。良乡城内由两个私人资本家开的两家酒厂经营酒业，前店后厂，当时叫“南北烧锅”(烧锅就是制酒厂)形同垄断专卖。是良乡市面上资金雄厚的厂家。

再谈谈良乡的风味小吃。风味小吃有一定的北京风味，但也不尽相同。比如良乡的炸豆腐，炸的老，而且是用花椒大料长时间炖熟的，比北京的更显香味浓厚。良乡的“灌肠”和北京的就大不一样了。北京的是油煎的团粉条块，良乡的“灌肠”则是先用碗蒸荞麦面团，晾凉后，切成长条，用麻酱醋蒜凉拌。良乡的“艾窝”，原料与做法和北京厂甸的基本相同，但北京的形状是圆团，外面看不见馅儿，形同元宵。良乡的做法是在糯米饼上，放上豆沙馅，不封口，卖时撒些白糖。其它如良乡得胜公的“小菜”(即八宝菜)，褚饭铺的椒盐小烧饼，魁元馆的小豆包，从房山排运来的油酥烧饼等，都是各具特色，别有风味的。可惜现在市上都很少见到了。

住的方面。解放前，自然都是平房，有条件的都要建成三合院、四合院。有钱人家，住的是砖瓦房，还要建围墙和门楼，对面还有“照壁”。贫困人家，住的是土坯房，围篱笆墙和“梢门”(就是栅栏门)。旧社会还有很多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流浪户。情况好一点的租房住，情况最差的只有住破庙或找废弃的破屋栖身。我们不难想像，数九寒天，风雪交加的日子，他们是怎样难熬的。解放后，不少人住上新楼，很多人盖了新房，有的电灯暖气，有的沙发软床，几乎所有的人早已无冻饿之忧了。

在房内设置方面，最深刻的变化，就是逐渐拆除了房内的“土炕”。多少年来，世代相传的土炕，发挥过它应起的作用，有一定的优越性和科学性，是我国北方劳动人民的智慧表现。下面重点介绍一下“土炕”，因为现在十几岁以下的青年就有很多人没有睡过或不了解它的结构。

原来“土炕”和“地炉”是一个联合结构。“土炕”有土坯垒的，也有用方砖垒的。是为了可以在上面睡觉。而作饭和取暖还要有炉子，所以在建炕的时候，在砖或土坯之间，留有孔道，遍布全炕，孔道又与墙内烟囱相连，（一般在建墙时都留有烟囱）可以直通室外。把炉子建在炕的前面地下，所以叫“地炉”使地炉与炕道相通，既可以把煤烟和煤气顺炕道排出室外减少煤毒，又可以温暖土炕。真是“一举两得”。

在炕与地炉相连接处，放一块长砖，当做阀门，俗名“抽屉砖儿”，可开可闭，白天要做饭，用火多，就把“抽屉砖儿”推上，夜间睡觉，需要暖炕，就把“抽屉砖儿”拉开，就能烧炕，而且把煤气抽出室外，避免煤毒，这是第二个“一举两得”。在地炉近旁，埋上一个瓷罐，里面放进清水，上面盖上盖儿，俗称“温缸”。利用炉火辐射热力，一昼夜水温可达50℃左右，可以用于洗漱、做饭、刷洗碗筷等，这是第三个“一举两得。”

为了保持室内清洁，减少煤灰飞扬，在炉前挖一炉坑，上面盖以木制炉坑架，与地面相平，可以把飞扬的炉灰限制在炉坑内。农户为节约用煤，在炕下的一边，另垒一个做饭的锅台，下面可以烧柴草，也和炕内火道相连，把烟送出屋外。人们注意到：汉字中的“炕”字，本身就是从火，与火相连啊！

关于“行”的方面。良乡有京汉铁路，贯穿本县南北，直通武汉。解放后，又直通广州，成为京广铁路。在旧良乡县境内有岗洼、良乡、窦店、琉璃河四个车站。另有通坨里和周口店的两条支线，这是良乡地区交通方便的优势。解放前，竟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所谓的京石公路，也不过是一条土路，旱季颠簸不平，雨季泥泞不堪。解放前除京石公路，上偶尔有一两辆载货卡车和抗日时期的日本军车外，良乡境内看不见一辆民用汽车。日本投降后，仅有国民党县政府一辆福特小汽车，是县长专用车。

在水路方面，清末民初时，琉璃河水量丰沛，有木船可以直达天津，良乡的洋广杂货，大都赖以运入。以后河道逐渐淤废。至于良乡和附近的短途交通，主要靠轿车和以后的洋车（人力两轮车）代步，两者现在都已淘汰。廿岁以下的青年都没有坐过，只能从电影、电视剧看到其形状，既慢且贵。自行车多为进口车，被视为贵重物品，很少人家买得起。经济困难的或者步行，或者骑驴，由于经济不景气，赶脚行业也没有多少。这时，骑马坐轿的，早已多年不见。虽有火车，很多人也坐不起，行路难也是老死不相往来，乡镇闭塞的原因之一。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漫谈庙会·集市·花会

戴家斌

在一些介绍地方历史的文章中，曾多次出现庙会、集市、花会等名词，而对这些名词的含义往往混淆不清，因而有的把庙会当成集市，有的将花会说成庙会。更有些文章将世界性的佛教盛典说成房山特有或房山某寺庙所开创。有鉴于此，特将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作一简单介绍。

庙会，顾名思义，与寺庙有关。《辞海》中解释庙会说：“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集市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寺庙附近，故称‘庙会’。”可见庙会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寺庙内或其附近举行，二是在寺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它不是一般意义的集市活动。

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很好理解。寺庙节日有哪些，又依据什么来规定举行庙会日期呢？按佛教教义，寺

庙的节日较多,其中最大的节日有两个。一个是农历四月初八,为佛诞日;一个是农历七月十五日,为自恣日^①。在佛诞日要举行“浴佛法会”,就是在大殿里用一水盆供奉太子像(即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像)。此像为数寸高的童子形立像,右手指天,左手指地。这是因为佛教传说:“太子初生时,右手指天,左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因释迦牟尼是当时印度某国的太子,而印度是崇尚右的,所以右手指天,中国的习惯是崇尚左,所以汉民族的许多太子像为左手指天,这是不符合佛教教义的)。全寺僧众和佛教信徒要用香汤沐浴太子像,作为佛陀诞生的纪念。在七月十五自恣日这一天,要举行“盂兰盆会”,进行超度历代祖先的佛事活动。盂兰是梵语,倒悬的意思;盆是汉语,指盛供品的器皿。佛教传说此盆可以解脱祖先倒悬之苦。佛经中说,目连是佛陀释迦牟尼的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在诸弟子中神通第一。目连的母亲死后生为饿鬼,目连使尽了一切神通也救不了自己的母亲。于是,佛告诉他,在每年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时,以百味饮食供奉十方自恣僧。有此功德,七世父母及现生父母只要有危难者,都可以得到解脱。中国最早举行盂兰盆会的是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他在同泰寺设盂兰盆斋。在这以后,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就盛行起来。宋代以后,又逐渐将以盆供僧变为以盆施鬼,从而使先祖们得以超度。与此同时,施主们也在这一天给寺庙募捐钱、粮,以追荐祖先的亡灵。民间习俗在这一天还要放河灯、焚烧法船(一种用纸糊成的小船,上面写上鬼卒的名字)^②。我国及日本、东南亚一带国家都盛行这种习俗。

据佛经讲,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出家、成道、涅槃,同是四月初八日这一天。而汉民族地区则习惯以四月初八为佛诞生日,二月初八为佛出家日,腊月初八为佛成道日,二月十五为佛涅槃日。在这些日子里,寺庙都要举行法会,缅怀这位佛学先祖。尤其是腊月八日,寺庙要煮腊八粥,供养四方僧众。逐渐地,煮腊八粥也成为民间普遍的习俗了。

此外,各地寺庙还有不见经传的诸佛、菩萨誕生日。如正月初一为弥勒佛誕生日,二月十九为观音菩萨誕生日,二月二十一为普贤菩萨誕生日,三月十六为准提菩萨誕生日,四月初四是文殊菩萨誕生日,七月三十是地藏菩萨誕生日,九月三十是药师佛誕生日,十一月七日为阿弥陀佛誕生日等等。在这些节日里,寺庙都要有纪念仪式或法事活动。

综上所述,佛教经典中有很多节日,但不可能在每个节日都举行庙会。一般地只在大的佛法庆典活动时,四方游僧或佛教信徒较、较为热闹时,商贩自动聚集在寺庙周围摆摊设点,于是在该寺庙附近自然形成一个集市,称之为某寺庙庙会;随着佛事庆典结束,僧众四散,所谓庙会也就散了。据《房山县志》记载:“房山如娘娘、药王、城隍、东岳等庙会,商贾云集,男女混杂。会期一到,趋赴若狂,士女往来,拥挤不堪”。“四月八日,县境各寺院如永寿、西域等寺每于是日作浴佛会。西域大盛,远方来者甚多”。“七月十五日,士民具酒肴,祀先莹,建醮,放河灯,佛教办盂兰会。是日城隍出巡”。可见,房山的庙会,均依佛教经典在寺庙节日期间举行,而且庙会期间热闹非凡。

寺庙愈大,庙会时间愈长,赶庙会的人也愈多。庙会给寺庙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与“知名度”。有的寺庙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佛教节日以外的其它时间举办庙会。如春节、正月十五、八月中秋、元旦等喜庆节日,这期间佛教信徒前往寺庙进香、随喜,商贩们也在这期间争相摆摊设点,搭棚支锅,经营各种小吃或日用百货等等。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商品经济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庙会”也同为进行商品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而且举办庙会也越来越不受寺庙节日的局限。如北京的地坛庙会、房山的云居寺庙会、以至白云观(道教)庙会等等。

集市,为定期或临时的贸易市场。它是我国旧时农村的主要贸易场所。各个集市的规模、经营范围、时间长短都因所在地区。人口多少、生活习惯、生活水平等因素而各不相同。《房山县志》记载:“县城每旬四集:初二日北街,初四日西街,初七日东街,初九日南街。附近数十村咸赴焉。”《良乡县志》介绍:良乡城内逢月之一、六、三、八日为集期,窦店镇逢月之五日、十日为集期,琉璃河镇逢月之二、七、四、

九日为集期，而交道集则是逢月之一、四、六、九日。这样，良乡地区的居民每天都有地方可以赶集。除了这些固定的集期以外，农村中还常随季节变化而形成临时性的集市，如夏、秋季的瓜果市，收获季节时的粮食市等。集市一般固定在某一地区，而且每一经营品种都有较为固定的地区，这便于群众购买。现在，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往往将农村中的集市集中、固定在一个地方，这既便于管理，又方便了群众。于是形成了众多的农贸市场。

由此可见，集市完全不同于庙会，它与寺庙没有任何关系，集市的日期也与寺庙的节日无关。即使某一集市正好在某寺庙，如药王庙、城隍庙附近，它也只能是集市而不可称之为庙会的。

花会，在《辞海》中解释为“成都、广州等地每年春季百花盛开时节举行的兼有交流物资性质的集会”。显然，这不是北京地区所指的文化娱乐性质的花会。在我国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流传一种民间歌舞，叫做花灯，又叫耍灯或灯戏。一般地是歌舞者一手提灯，一手执扇，载歌载舞地进行表演。北京地区的所谓花会，大概是由花灯演化而来的，但它包括音乐、杂耍、歌舞等多种文化活动。北京地区称花会又叫走会或过会^③。各地区因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素养不同而流行不同的花会品种。房山历史悠久，民俗质朴，花会等民间文化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房山县志》记载：“元宵节，驰夜禁，街市张灯，士民观灯，食元宵，放花炮。铺户熄灯，演唱为乐。”《良乡县志》记载：“立春前一日，结彩演剧，与民同乐。十五日元宵张灯，游文庙，走泮桥，食瓜种。元宵放花炮，驰夜禁”。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流行于房山(包括良乡)的花会就有50多档，近20个品种。人们较为熟悉的有高跷会、小车会、太平鼓、走旱船、龙灯会、秧歌会、耍狮子、跑驴、腰鼓、少林会、叉会、坛子会、大鼓会、铜锣会、音乐会等等。而且，这些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小调现在也堂而皇之地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或作为大型团体操的一部分进行表演。文化艺术来源于生活，来自于民间，由此可见一斑。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庙会、集市、花会，这三者各有不同的含义，不能混淆，不能互相替代。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寺庙在举行庙会时，为了扩大影响，增加收入，往往约请几档花会在庙会期间同时进行表演，也有的因庙会时间较为固定而形成这一地区的集市，或是因举办花会表演时，商贩们争向前往摆摊设点、搭棚支锅进行贸易，于是，往往形成同一地区庙会、集市、花会同时举行的情形。尽管如此，它总是以一种形式为主，或称庙会(如云居寺庙会)，或称集市(如窦店集)，或称花会(如房山春节花会)，但不能相互替代。

注：

①自恣：梵文，随意的意思。音译为“钵刺婆刺拿”。一种佛教仪式。佛教徒在每年安居期满之日举行忏悔集会，请别人尽情揭发自己的过失，自己进行忏悔；同时也随别人的意愿，尽情地检举其过。此日称为“僧自恣日”，也称“僧受岁日”或“佛双喜日”。《南海寄归内法传》卷：“梵云钵刺婆刺拿，意为随意，亦是饱足义，亦是随他人意举其所犯”。

②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记中元节(七月十五日)说：“中元祭扫，尤胜清明。……庵观寺院，设盂兰会，传为目连僧救母日也。街巷搭苦高台，鬼王棚座，看演经文，施放解口，以济孤魂。锦纸纸糊法船，长至七八十尺者，临池焚化。点燃河灯，谓以慈航普渡。”

③清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中“过会”一则中说：“过会，乃京师游手，扮作开路、中幡、扛箱、官儿、五虎棍、跨鼓、花钹、高跷、秧歌、什不闲、耍坛子、耍狮子之类，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庙会等，随地演唱，观者如堵。”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作者系原区档案局副局长

饶乐府的“九月庙”

王凤梧

庙，不能以“月份”命名。大概因为那年月没有“展销会”、“物资交流会”，乡亲们感到生活太单调和需要更“广泛”的交流，于是以某一“座”庙为中心，定于×月×日——×日为×月庙。房山县城内东南角的药王庙自四月初一至初五为四月庙，县城西北角(现在的公安局所占一带)的城隍庙自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五为五月庙；三月庙就在顾册的“大庙”(俗称)了。

饶乐府的“九月庙”实际是以“碧霞元君祠”为中心，自九月一日至五日的“庙会”(庙会之称流行于解放后)。

三月庙乍暖还寒，逛庙的人不太多，只有农家的当家人多为了春耕、麦收，才冒着风沙到“庙”上买几把杈子、扫帚、木铎，铁铧……匆匆而至，匆匆而返。

四月庙虽已春寒退尽，酷暑未来，但是不太大的东南角，还有“房山城内完全小学校”居中而坐，所剩面积就没多大了。尽管有“文庙”、“魁星楼”等文物、名胜，但对贫困又讲实惠的农民，终究吸引力还太微薄；只有为父母(也许是妻子、丈夫)之病百治无效或根本没钱买药的善男信女，才不远几里几十里来到“药王爷”面前拈香上供、磕头，祷告——使四月庙多了几分热闹，几分虔诚……

……

我不避“自吹自擂”之嫌，我总以为我的故乡饶乐府的九月庙占天时占地利占人和，是县城附近最好的庙。

饶乐府村南二百余步是从县城去北京的一条大道(所谓大道，两马车相遇也要小心、相让)。紧邻道南就是“东岳庙”(碧霞元君祠的别称)的后墙了。九月庙就是以东岳庙为中心的庙(会)。

天时：

九月庙的五天庙，是自九月初一至九月初五。富裕人家正是：“九月新衣已剪裁”；穷些的人家虽是“场了地衣裳破”，但稍加浆洗。缝补也聊以整旧如新。那年头没有“开放搞活”。终年除买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之外，再也见不着一个铜子儿的姑娘、媳妇，在九月庙之前，也有机会“就地取财”，为九月庙上的花销弄点儿“私房”钱……

饶乐府的富户(那时还没划分地主、富农……)差不多都是土里求财，土地最多的也超不过一顷(百亩)。这些人家都是地多人少，就显得富足。但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农忙之际，一人终不能当“十”，就显得“客气”、“亲切”、见人三分笑……九月花生八月谷。新谷堆在场里，要把谷穗和谷秸分开，这就要请人“掐”谷：“二姑娘，把针线搁两天，帮我掐掐谷……俩大子儿十个(捆)！”所谓“掐”就是把一片襟儿的刀片套在中指、无名指上，把谷穗从“脖”上“掐”断，使谷秸保持完全，备铡了喂牲口。如果因为时间紧迫，也允许用“杀谷刀”。一刀下去，谷穗与谷叶齐飞，谷草就要损失一部分——因此，劳动报酬(单价)就要相对减少了。

谷声才了，花生相继上“场”。那年头雨水多，常常秋雨连绵，花生秧一着雨马上霉褐，本来上好的饲料眼看成了粪土；花生果实着了雨便满身绿毛，那年头“货卖一张皮”，虽然果仁鲜脆，收买花生的贩子也要煞下一两成价。紧弄的庄稼，磨蹭的买卖——才请过谷的人又去请人：“他嫂子、姑姑，打夜做做花鞋，

白天帮我去摘花生吧，”湿花生给钱少，干点儿的就多给点儿。一天下来，手快的也能拿它七八十个铜子儿；两天的收入能买一件青市布衣料……逛庙的有多半数是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或根本没工夫出门的姑娘、媳妇，有了掐谷、摘棉、摘花生的收入，到了庙上也不至只“一饱眼福”了。农事既了，农民落得一身轻松；再加上秋高气爽，于是商贾云集，游人如蚁就势所必然了。

地利：

饶乐府位于房山县城东二里。有大路直通北京、房——京之间又经过良乡、长辛店……坨里、琉璃河、周口店、羊耳峪、长沟峪……或盛产灰、煤，或有高线、火车经过。这些镇站人口流动性大，“活钱”也多。因离饶乐府远者不过三十里，于是不少人也成了上庙人……

人和：

饶乐府离县城近，饭食衣着有“县城人”习俗。但有百十户人家多为农民，更不失庄稼人的厚道。就像丰台、海淀人，对外可自称“老北京”，对刁滑的“京油子”又可以“庄稼人”自豪。饶乐府乡亲的土而不蛮，尊而不傲，就成了“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基本条件。

这小村科举时代出过举人、秀才，民国初年又有师范、中学毕业生。邱雪樵执教“长育学校”（今洪寺小学前身）。其人诗文放逸，语言尖刻；对学生经常严紧，对官员更多轻蔑——实为房山一“怪”，亦房山一名流。

马诚之弃官（原为区董）执教，甘为桑梓呕心沥血……虽被称为“瘦马”，然其铮铮骨气，落落寡合，却被遐迩仰慕……

邱道甫所率一班（十一二人）保卫团，其粮饷固然来自乡里鱼肉，然而表面上仍以“官军”自立，屑小不良之辈也不得不畏而远之……

以上种种自然使“东道主”多了不少“凝聚力”，给了“客人”不少“安全感”……

东岳庙位于村南大道边，占地为七亩。庙分前、中、后三院。殿为两座：前殿黄飞虎（？）金面黄袍，左右各二男侍，庄严而不狰狞……进香者如今日要拜谒“首长”，必先拜望“传达”，先为黄大帝（？）上供拈香，而后匆匆去后殿……后殿为碧霞元君。元君为女像，当地称“娘娘”。娘娘座前排列着百十磁娃娃……进香者多为“信女”，貌似虔诚于元君，实为“求子”而拜……乘道士不备（实际是睁一眼合一眼），“偷”一娃娃匿袖而出——称为“拴”娃娃。回家生子之后，又必须“还”娃娃——如此相衍，神前香烟不断，娃娃“后继有人”；那些并未去净“俗根”的“道士”除代“元君”享受供品的“实惠”之外，还“秀色可餐”——那就如今天的“回扣”、“提成”了……

这座庙的地势和建筑很别致。村南本系一带平川，而前殿高于前院几近一丈，后院地面只低前殿殿顶三四尺；东跨院（厨房、仓房、下人住房）却稍高于前殿基。其房顶只平于后院地面——称得上“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了——是天然，是封建意识的人工？我没打听过，至今也不清楚。

庙门前二石狮分左右而坐，高可及丈。门悬蓝匾金字：碧霞元君祠。山门左右各一无框无楣的便门。进门后，东西各有单间土房五六间，抗日战争前曾被国民党军（一个连）驻防，其余似乎专为赶庙的商家所设……

进香人为黄大帝进香后，下殿往东数步，有角门向南。进门边转边升。前殿后墙狭可擦身处，偏有一小龛凹于墙内，一“韦驮”披金甲，举铜、怒目、抬左脚……使人毛骨悚然，有当头一棒即落于头顶之感……

升转设七人，已至后院。东西各一柏树，粗可及围，浓浓绿翎筛落斑驳阳光，如碎金银且有香味。东西各有配房三间。西房专供村公所（如今日之村委会）秘议村政（？）。东房则为看庙道士所居。正殿三间，元君居正而坐，左右各二玉女侍立。东北角落阴暗处停一黄绫小轿为娘娘“出巡”用……

殿两侧各有耳房一间，从不住人，也从未见开门……

这座庙的门前百步处有一戏台相对。所谓戏台，只是石头砌成，四角和顶周用花岗岩条石一是最简易的“台”了。

这座庙平时，只有一个班的保卫团和一位道士出入。戏台南边是一带树行。可谓“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九月初一之前，村里已去人到北京“写”戏，也有人叫“请”戏。叫它“写”，大概也有签合同的形式？！且当时村里没汽车。戏“写”好了，用一二辆马车去接。孩子们只见村南大道上，一只大红“戏箱”自东摇摇而至，车把式和村公所的人把它卸下，却不见“戏子”（演员）一个人——如果也是坐马车，一百里路真够他们受的了。不过，名角儿（其实就是主要演员）绝不是坐马车来的。没汽车，大概是坐人力车。初一已是庙（会）的第一天，其实没一个逛庙的。村里人忙着请“棚匠”搭戏棚——棚全用新蔗为顶为围，骨架用杉杆。棚为三部：戏棚，如剧场舞台、前台、后台；大看棚，长宽各十丈左右，无围，四通八达，系普通“老爷们儿”专享。大看棚的北面，有小看棚，看者居高临下，又有隔断之蔗，颇似戏院的“厢”，那就是县太爷、商会会长、绅士们的席位了。

戏台下的东面，用高粱秸、玉米秸夹成一非方非圆的篱笆围，由姑娘、媳妇、老太太们独享——不叫看棚（没棚），叫“娘儿们群儿”！即使是为“女公民”的安全，也实在是等级分明的三等舱了。

临近初一这两天，村公所忙搭戏棚，已经组织好不叫“筹委会”的“筹委会”，组成人员是村正、村副，地方（地保）保卫团长、有名望的乡绅，至于县里的商会会长、巡警局局长等高层人物就是不必躬亲而可生享名利的“后盾”了。富裕和不太富裕乃至平日为衣食奔波的人家，都派“专员”不远十里二三十里去“知乎”自己的至亲至友；家里人则连夜推碾推磨，即使没有白米、白面，荞麦、豆子、高粱、糜子也碾磨得精细；即使无力购买鱼肉，几十天积攒下来的“鸡子儿”（鸡蛋），刚刚晒干的花生，自己采摘的木耳、蘑菇……在东道主妇高度运筹、努力调配下，在其强作微笑又不免近桌情更怯地，把清淡而却调和了酸甜苦辣咸的菜肴放在桌上后多主人让：“吃，吃，”客人点头：“好，好！”不懂事的孩子只顾狼吞虎咽，哪能理会双方大人的心神正在作着“艰苦”的交流，辛酸的感知。

小买卖人中，最先到的是炸麻花（带烧饼）的，糖炒栗子的和饭铺……他们需要盘炉灶，这就比别人麻烦，就要先行一步。小买卖人本小利微，占地不大，可以自由选择用地，叫“占地方儿”。那些较大的买卖、老字号不用过早占地方儿——多少年来已形成被公认的地盘了。并不见村公所的人指手划脚，买卖人占地自觉，自然地形成行业排列；因占地吵架的也有，但只是脸红脖子粗地边吵边干，一会儿就互通有失了……九月初二已是“正庙（会）。”

这一天，大小商家“开市大吉”，掌柜的、站柜的、学徒的早已洗去几日的疲倦之色，满面笑容等待“财神爷”。村里的各户早已吃完小米饭、豆面汤，欢迎亲友的那份真诚，恭敬简直“如见大宾”。男主人挑水、扫院子，放了“庙假”的孩子（多为男孩）腮帮上粘着米粒菜叶，早跑到庙上成了不买任何东西的“顾客”。一过那条大道往南，沿东岳庙东墙，已摆满、挂好大青柿子和山里红。大柿子就地摆得如“金字塔”，山里红用“麻经儿”串成五十颗，一百颗的串儿，或挑挂起来，被旭日霞辉映出点点金星，不但眩人眼目，更逗得孩子们咕咕咕咽唾沫。“去去去，要钱去，别把‘哈拉子’流在山里红上！”你不能不承认这些小买卖人的激将法中包含着多少朴素的心理学！

被嘲弄的孩子脸一红：“晌午才给钱哩！”几个铜子儿早给早花，花了还“磨”大人——但毕竟不失“老爷们儿”的风度，咬牙切齿，“给了钱就保险买你的山里红”。

保卫团已接受了“弹压”任务。东岳庙东便门设了岗。另有几位弟兄背上“老套皮”、“汉阳造”溜溜逛逛，免不了拿点儿、尝点儿，成了不交钱的优先、优惠顾客……

较大的商家和“热闹儿”都集中于东岳庙内和庙前、庙左右。

有一家卖木梳、篦子、香荷包的棚铺、吆唱、叫卖最吸引人尤其是“堂客”：年年来、庙庙到，张玉山

的老字号：买一包送一包，祛邪避灾香荷包……这家店铺每年的九月庙都结棚于东岳庙前左角——就象北京的六必居、王麻子刀剪店，透着老店的质朴、热情、诚挚，绝不哗众取宠，更不妄自尊大……

成“丁”字的一竖自北而南的一条街，两侧皆为商棚；棚多为白布、蓝布撑成，小者一柱如伞，大者则具栏柜、帐房……房山城内的“春茂永”布店则毗邻采自“国外”的几家皮货庄（说是皮货、只卖皮袄的“桶子”）。看似无章，实际是多年来已形成因行业结成群落，绝少混杂……

最无“规矩”的是卖甘蔗的。这些人全系饶乐府的近乡人。不知从哪儿（本地不产）趸来的甘蔗，其状为青绿的秫秸（北方产物），汁不太多而甚甜。他们把一抱甘蔗只在中上部分系一道“约（yào）子”，挪窝时扛起来不散，放下（卖）时把下部一劈（Pī）数“足”戳立，稳如生根。这东西物美价廉（每根一两个铜子儿），除了没牙的老人，没人不“嚼”，小孩子打架可拿它做武器，真是一举两得……三天（工庙）过去，蔗渣厚得来及踝，勤俭的乡亲收集回家，可沤肥，可烧炕……

戏还没打“三通”，拉大片（也叫洋片）的一人多能的中年公民，一手打鼓擦钹，一手执杆早已在招徕观众了：栗子香，甘蔗甜，香甜当不了看洋片；左一片（Piān），右一片，一片一片往下看；洋鬼子，要赚钱，跑到中国卖大烟（鸦片）林（则徐）老爷一看大事坏，举火烧了火轮船……洋楼高，马（公）路宽，小汽车一过一溜烟，俩铜子儿看完上海大世界，不动不摇活神仙……

坐在这巴掌宽的板凳上，眼觑放大镜意犹未尽，拉大片的已下逐客令：“俩铜子儿开了眼，后面还有好洋片，抬屁股起坐快走人，再看洋片再交钱！”

有时候布幔高围，那就是“内部片”了——只有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才有此眼福、艳福……

“热闹儿”中最惊心动魄的要数“跑马戏的”，今天所谓马戏团。一个大圈儿是马的跑道。中心一高杆，高可数丈，是演员空中表演用的。因场子太大不好设“防”，观众自然围观，自觉交钱。驯马有术，骑马技艺高超，马背倒立、镫里藏身，八步赶骡（Chēn）……令人咋舌。女演员的空中十八滚，仙人脱衣……不但惊险，也确实危险——没一点儿安全设备，失落下来就没命……

他们集武术、气功于一身，实际是今天的杂技团。

他们虽不看钟表（那时很少有人有表），似是计时收费。收费时有的溜之乎也，那位叫“张傻子”的马戏丑角（可能是团长）用讽刺相送：“你妈只给你仨大子儿，买串糖葫芦，买一大子儿的臭卤虾酱，蹲在戏台后头慢慢解馋去罢！”

马戏团的组成似乎是“家族团”。庙上没了人，他们收了摊。买点“拿货手”，一吃就算晚饭了。饭后练功时，男女老少全参加。就连穿开裆裤的三四岁蹒跚学步的娃娃也不例外。自大而小成纵队，依次作前滚翻，娃娃屁股蛋儿朝天翻不正翻不过去，“张傻子”大手一提双脚，“啪”地一声把他（她）扔出老远——也就“过”去了……

东岳庙西的一带旷野白沙地，是今天所谓“日杂”、“土产”的商摊：蝎子药（止蝎蛰疼痛）、耗子药、镐、锨、铧、犁、棉花、麻绳……最大的商摊是县城南关的“义和升”。这家商号以经营陶瓷，铸铁物品为主。成套（自大而小）的缸和锅罗列有序，占地颇大。最大的缸扣在地上，然后依次套上（摞上）去，是真正的“金字塔”。有顾客来买：“我要大白口（缸）！”看似单薄的学买卖的（学徒）马上一口（只）一口自上而下掀掉……最大的头号缸最轻也够二百斤！可是年轻人掏缸显得轻而易举。为了证明缸的完整无缺，把缸翻过来掉过去，以“底”为轴，缸在沙地上，滴滴溜转……成交后，还要帮人家装车（本很少见）。或装驮或装背架，直送离庙（在今天可当选特级劳模）。

自“张玉山”的老字号对面往南的数十步长街，是卖糖炒栗子和儿童玩具的商摊。

说是“糖”炒栗子，其实从没见过他往炒锅里放糖。见到的是把半口袋绿豆大小的颗粒，和生栗子一起放进锅，用小锨翻动搅和——边炒边调控灶塘中的火头的大小。看他偏坐在灶台边炒边聊天，再偶尔尝颗

栗子，也足够光看不买的小顾客嫉羡的了。大人说，那里颗粒原是沙粒，因为粘了糖又多次被“炒”就成黑色了。它所含的糖又沾染了栗子，炒熟的栗子就显得油亮，而且散发着甜香——今天小城街上卖的“糖炒栗子”实际是“煮”后再晾干，叫它“糖炒”其实是“偷工减料”，冒名顶替。

那时的“玩具”不叫“玩具”，叫“玩艺(意)儿”。就地摆摊：麻杆做的“牛虎斗”，杨柳木做的刀、枪、剑、戟、虎头钩……涂上些颜料、漆料，看起来，色彩缤纷，熠熠闪光，遮掩了不少生活的单调和艰辛。用杆又缠上花条布的大刀、长枪，一抖，颤颤巍巍，那要两三毛钱(相当百十铜子儿)就算奢侈品了……

初二虽是正庙，但是日近中天唱戏的才打头“通”。打三通后才真正“唱”起来。唱的全是小戏(帽儿戏)，《小放牛》、《错中错》、《马寡妇开店》……就是这些戏，也足使半壮子、小伙子直眉瞪眼、争先恐后地要挤塌戏台了。这时台上的“看台的”手拿白蜡杆，东杵西杵，左右横扫(虚张声势)，那些人才稍稍退让……

“娘们儿群儿”划地为牢，女观众身居樊篱，再加上女性固有的束身自好，虽然都蹬着板凳(为了好看台上)，很少有互相争吵……怨女旷夫虽然也断不了借看戏而隔篱相望，很少有“越轨”行为。偶然有“老爷们儿”从篱笆缝伸过手，想“探囊取物”，一被发现，马上就被揪出示众，甚至真正地受看台的当头一棒……

初三，居五天之“中”，是庙(会)高潮。县长、会长、局长、士绅们就位“特殊”看棚来看戏了。戏班的领班儿，手捧戏单子打躬作揖，请老爷们“点”戏(如拿菜谱点菜)。依次点戏名，又各有“赏”钱。领班儿把赏钱依官位和数目排列，高声喊给台上和后台：“×县太爷赏钱五块大洋——×会长赏钱三块大洋……”

钱并不白赏。据说，不少女主角儿不住饶乐府(次要演员尤其男角似乎都就近下榻)，都住县城。又多被老爷们认为干闺女……陪老爷吸大烟(鸦片)甚至陪……那时候的“伶”——“妓”难分，固然有社会制度的主要因素。然而“她”们自己有没有“舍身取利”之嫌呢！

那时候男女虽不平等，但在逛庙上两性人数并不悬殊，女客似乎还稍多于男客。这是因为进香还愿、拴娃娃，她们义不容辞，再加上全家人棉衣正待剪裁，买布、买棉……她们自然是选购权威了。最初的庙(会)的设计者，也算因势利导，女人、女红用的许多物品就陈列在东岳庙前院的东西两廊的单间里。有市布、花布、绸缎，有木底(缠足鞋底)、花样子(纸剪)鞋面儿，洋瓠子(瓶装润肤剂)、雪花膏、脂粉、镯子、戒指、簪子……这些东西都称为“洋广货”——大概因为是“洋人研制”、自广东广西输入。

进香者多为中青年已婚妇女(极少的姑娘为父母突病求神免灾者亦有之)。她们入庙目不旁视。有的从家里携“香”而来，有的到庙里观买。有急事求神者多用整“股”(捆)，不是有求，意在“随喜”者只进“散香”三炷。两殿各有一位衣帽整齐的道士，执槌立于神案前。神案一端座一磬。道士除帮香客燃香、摆列供品之外，在进香者打揖、跪拜、默祷过程中，道士边悠然打磬——当——，边悠然提醒香客：“烧香撂香钱”——礼成之后，女人撩襟深探，仔细摸出三个铜子儿，当啷掷于柳条筐箩里……然后非笑非嗔、掩饰不住喜悦地野步下殿……来到布店，认真选货，认真还价……成交后，布店掌柜请顾客看准尺寸后，又慷慨地长出一拃：“再‘让’您半尺”！咬起牙用力“嚓”地一声撕下、包好，双手奉送……这一“拃”，这一笑常常成为他们几年、几十年的交往纽带……

初二、初三、初四算“正庙”。这三天商贾毕集，游客如云。初三则是“正”中之“正”，即今日所谓高峰高潮。这三天除白天的戏之外，晚上加演夜戏。太阳未落，游人才散，戏台已挂上两盏汽灯。台柱一侧已挂上戏报子：全天夜戏，名角×××上演《拾玉镯》，名角×××上演《草船借箭》……

汽灯尚来点燃，点点灯火已从四外飘然而来，越来越火光越大……那是精力过剩的小伙子、白日兴犹未尽的戏迷以及白日腾不出身的主家人、长短工……那些轻移莲步、有人扛板凳相随的，则是平日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和少妇了。他们提着“手提灯”、“保险灯”(其实就是玻璃罩的，燃煤油或蜡烛的

防火灯)……没有灯可提的则举着火把照路……

演出之前，“娘们儿群儿”已为男观众所瞩目。那些“堂客”虽无戏可看，但早已凳上板凳引颈左右而望，以理直气壮的“一枝红杏出墙来”——用“一显芳姿”作为对平日“慈母严父”的报复。至于台上“拾玉镯”，台下“丢戒指”，自是不可避免的佳话了。

台上轰轰烈烈，观众借戏遐想。汽灯渐渐暗淡引起观众一点不安，看台的引颈高呼：“义和升学买卖的，给汽灯打气来——”不久便有一年轻男子跃上戏台，把灯落下鼓捣一阵，灯复明，再用细绳把灯倒上去——动作很像降旗、升旗……

这几天，村公会(公所)的人颇累，解决纠纷，接待长官，收“地盘儿”钱……

收地盘儿钱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收多收少依所占面积大小和地势显僻而定。收钱的由二人组成。前边那位必须是有些“头面”，后边的一般是“地方”(地保)。前边的一锤定音收多少，后边的打开口袋把钱(铜子儿)装进去。遇到真正本小利微的小买卖人，经过苦诉之后，头面人物一挥手：“饶乐府大仁大义，免了!”就“下一个”了。

这些钱在过庙之后，出一《告白》，上至“写戏”大洋几百几十，下至洋火煤油，几角几十铜子儿、不分巨细完全公诸于众。那时无人反铺张浪费，更无“控办”，所以连大酒大肉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也不隐瞒“变相”。

保卫团弟兄虽然“弹压”、站岗“常备不懈”，但脸上都泛起淡淡红光，那是因为村公所予以“加饷银”之外，自然还加了油水。

庙上还有一特殊行业，叫“xiáo lì”广(它的汉字书写似曾见报刊，今已忘记，希识者补正)，就是今之所称“扒手”。这些人成帮结伙，有头目。由头目公开向村公会挂号后，即可行窃。但被窃者有职有权，自不必着急，立即向村公会声明，马上即可把失物找回。失者为无权势和村里“要人”亦无关系，那就只好认败兴了。上述者叫“官 xiáo lì”。还有不向村公会挂号单独行窃者，所得固可独享，但一旦被获，可以“打死勿论”……

初五称“末庙”。实际上初四下午一些较大商家已束装就道，奔向又一个庙了。

戏虽还演，只是一些配角，演些小闹戏，所谓的“名角”或酣息牙床，或已返回北京了。

初五后晌，热闹了几天的东岳庙，又只剩了保卫团如散兵游勇。那位打磬的道士，正忙于数钱收钱，屈指计算下年九月庙的到来……

勤快的庄稼人挑来柳编大筐，用钯子搂集甘蔗渣回家沤粪。有时从剩渣中见几个铜子儿，那就算意外收获了。

华北沦陷中的一年的九月庙上从后台推到前台一位“女工作”。未见她从容就义，见她确实“目中无人”，自矜不屈。据说捕自酸枣庵——不知此“女八路”抑生抑死，已否入房山区志？

解放战争期间，伪房山县保安队的团长张德祥，为防止八路暗逼城池，下令拆除东、西两关民房。饶乐府的九月盛会自然更不允许了。解放后，村办火药厂火药爆炸，黄飞虎大章所居大殿被毁，又加上“有庙即迷信”的影响，碧霞元君祠先是名存实亡，然后是连“名”也不为人知了。

我不研究民风、民俗、庙会文化，只是凭回忆，记叙那一时期的、具体的、片断的历史而已……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长沟峪庙会与天开庙会

赵润东

北京的“庙会”由来已久，它深深地为广大群众所喜爱。而北京郊区农村的庙会，作为古老的传统节日更为人们所重视。各种庙会繁荣活跃，不仅反映出人们对丰富多彩富有情趣的文化娱乐生活的渴望，而且更主要的表现了人们对商贸市场的需求。因而庙会与商贸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所以每隔几日甚至十几日，十里八村便有一处、庙会会出现。据调查，房山区域西南各地庙会时间的情况大致为：三月初八为五侯庙；三月十五为无极屯庙（该庙位于今涿州市蓝家营村东南，观仙营村西，因地处房、涿接壤之处，故房山西南乡村民，每年多赶此庙会）；四月初四为琉璃河庙；四月十五为鞍子口庙；四月十八为天开庙；四月二十为房山药王庙；四月二十八为西营庙；五月初一为长沟药王庙；五月初五为仙坡庙；五月十三为码头庙；五月初一为房山城隍庙；八月初一为长沟峪庙……这种固定的庙会给商贾贸易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物质消费与交流的需求。这真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流而退，各得其所”。鉴于本文旨在民俗，对其源考不作记述。因而仅就房山西南地区较为突出的两处庙会作一概略介绍。

长沟峪庙会

解放以前，龙骨山西北的长沟峪东沟的南坡上有一座娘娘庙。庙的四周筑有高高的院墙。当中有一层建筑宏伟的大殿，殿内供奉着娘娘塑像。塑像身着黄绫袍子，粉装玉带，凤冠霞帔，煞是好看。

每年八月初一这天，附近村庄的人们都要来此赶庙会。其约定俗成的次序是，七月三十日人们就开始准备香烛彩绘之类，同时给“娘娘”穿好行装。然后抬着轿子，将“娘娘”老驾护送到东天宫老爷庙里供奉。家家焚香磕头，户户迎接老驾。礼仪之后，“娘娘”便留宿于老爷庙内。夜里有一群披红挂绿、擦脂抹粉的老妇人打着小黄旗侍候两旁。这一举动亦称为娘娘出巡（所谓“出巡”，又称“参驾”。指的是金刚会抬着娘娘神像驾龕由手花会随同到附近村庄演出。参驾时，用红色拜帖放在红拜匣内，老会二人套持门旗两面在村外迎接，花会香头来后递上拜帖，双方跪拜，并说些客各话。各地“娘娘”出巡也不相同如长沟峪“娘娘”出巡就在本村。而涿州的骡驼轿驮着的“娘娘”于五月三十（有的为五只初一）出巡到百花山。每七十里地为一站。一站住在黄山店；二店住地南窑；三站到达百花山。避暑后到八月初一回銮）。

翌日，即八月初一迎“老驾”又要回銮。于是又有众人焚香跪拜，送迎皆有。临行前给“娘娘”梳妆打扮，穿袍换履。按村里习俗才开始走会。其程序是，长沟峪出会，捐兵湾出人抬轿。轿前摆满鲜花供品，走一段路程便放下轿子。高跷会、大鼓会耍上一通。每到之处，窑主就在窑台上摆出八仙供桌，沏上香茶，放上果品，俗称摆膳桌子。为的是招待走会众人。当时，会里纪律严明，每到一处，只许饮茶解渴，不得随意拿吃果品。

东沟有大鼓会，西沟有高跷会。耍起来翩翩起舞，边说边唱，亦文亦武。有时不慎脑袋撞在一起甚至磕出血来也不退场。长沟峪以高跷会闻名。他们走起高跷翻起斤斗，一蹦能翻过几张八仙桌。有一年，房山城走高跷，县官姨太太等出来观赏，结果长沟峪的高跷会与梨园店的离跷会叫起号儿来。双方僵持不下。后有人提议，比跳供桌，比耍武功，以至后来比跳城墙。由于双方互不相让，房山城墙下面摔伤许多

人。这时，长沟峪会中高手韩林出场应战。他走到城墙上一个翻毛斤斗翻下去，稳稳地站在地上面不改色气不喘。赢了对方，争了荣誉。县官姨太太为此赏了一千现大洋。从此，房山人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舍命韩，而长沟峪的高跷会也名声大作，传遍十里八乡。

那时，走会地点为各个窑台。北沟有东煤坑、西煤坑。大小煤窑一百五十余座。走会队伍能走上十天半个月，（正月走会过了十五才肯停止）。当时赶庙会如同过新年。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节日盛装，逛庙会，做买卖其乐无穷。长沟峪山道弯弯，峰峦耸峙。从捐兵湾往里走，小铺一个挨着一个。不用说吃饭，就是一个小铺里捏上三两颗花生米，走到长沟峪里边就得吃个大饱肚子，胃口小的还真承受不起。可见当年的繁荣程度。

再说庙会以后，人们将“娘娘”的轿子抬回庙里，轿杆卸了，放在娘娘庙外。“娘娘”塑像端放于院中曝晒三天，然后安放在殿中宝座之上。后来，娘娘庙外又建了一座。坐北朝南的三间学堂。学生读书不守纪律，先生就令其在“娘娘”面前罚跪。

因连年窑洞挖煤不止，娘娘庙不断下沉，直至坍塌。娘娘塑像于是便放进学堂。长沟峪庙会延续多年。庙会所有开支，均由窑台供给（自段祺瑞时开窑直至日本进中国“事变”之后）。后来煤窑崩水关紧了，庙会没了开销，也就组织不起来了。再后来，闹土匪，土匪将会里的铜鼓乐器变卖了，剩下的部分大鼓铜锣现在仍然存在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每当谈起当年庙会，滔滔不绝，说得有声有色，颇有情趣。

天开庙会

旧历四月初八这天，上方山下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身着盛装，喜气洋洋地来到天开娘娘庙赶庙会。

天开娘娘庙位于天开村南，东临有名的黑龙潭，北倚壮观的灵修禅院天开寺，旁边环绕着日夜不息的牯牛河水。夏季，绿草如茵，松柏繁茂，再有周围起伏连绵的六聘山的映衬，景致显待格外幽静。

娘娘庙占地八亩。高高的院墙内座落着三座规模较大的殿宇，正面大殿内有娘娘的神像端坐在宝座之上。前面有哼哈二将，两旁是四大天王。甬道两旁的配殿内塑着虫王、药王、吕祖、老爷等神像。如此设置，均为显示平安吉祥，风调雨顺。

金章宗年间，天开村内居住着皇丈伊阁老。阁老府中伊娘娘有姊妹九人。分别嫁于孤山口、甘池、澹河、胡同口、曹章、小邵村、涿州、支楼等村。每逢节日便回阁老府省亲叙旧。当年那气派，真是威风凛凛，前呼后拥，十分显赫。伊娘娘死后，章宗皇帝便钦旨在黑龙潭西岸建造了这座规模壮观的娘娘庙。

之后，各处皇亲国戚便在四月十八这天来娘娘庙进香祈祷（“娘娘”即俗传“王母娘娘”，一般娘娘庙所祀之神应称“碧霞元君”。是人们为崇拜能保佑自己吉祥幸福的女神而塑造的形像），祈求神灵保佑。再之后便成了人们赶庙进香祈祷的香火重地。

赶庙的顺序是：灵官打道，扛旗；炮会飞铜锣会紧随其后；狮子会舞动雄姿驾旁护卫；中间抬着老驾；随后就是幡会、扛箱会，所抬箱子意为老驾衣裳服饰；走在最后的是少林会，人们舞拳弄棒，护驾保镖。进香队伍披红挂绿，刀枪剑戟，金光闪耀。

队伍未曾进村，天开村内的理佛会便早早地等候于村头准备接迎号佛（礼佛会：又称“号佛会”。一般在有老驾附近的村庄。礼佛去为老驾的总管，负责迎接朝顶进香的各道会组织。该会逢庙便烧香、念佛号，根据每尊神像的专号，作有韵的朗颂。当庙会发生纠纷时，礼佛会也作调解）。所谓号佛，即为一种礼仪。理佛会长老，必大德大智者担任。长老能说会唱，根据来者而话条子。其内容如同对诗对歌。那道会先就先给那道号佛。来者是何神仙，就号什分佛，之后田老督管护送老驾，捧着拜匣夕互相换帖，请安之后，号佛、排佛。

这时，长老开始亮开嗓子唱道：“阿魔西牛赫哲，降主国王。前华公主，三五七岁，才知人事，想感体行，不贪皇宫内院，弃舍家园，在此庇性不由行，来上泰山。在此必苦修行三十余载，成正角，正宝山，才得正果园朝。感动朝诸神将。护法诸神，张戈四散，四大真人……”唱过好长好长的词句以后，再行一连串的礼仪，各会方能入内玩耍。

据统计，最盛时期，这样大大小小的香会队队相接，竟达一百四十余道。每逢此日赶庙会的队伍，有出有进能走上四天四夜。

观看庙会内的场景，更加丰富多彩：货摊小贩，排列两旁。

进香的男男女女，摩肩接踵自由地穿行于人流之中。渴了饿了，路旁有各种风味小吃，花消不多使可使人心满意足；累了困了，就躺在山道坡边呼呼地睡上一觉。那境况也叫人坦然自在。走高跷，耍棍棒，有娱乐，有买买。来此逛庙，谁人不乐？悠闲自得，又何乐而不为？

热闹非凡的天开庙会相传了很多年，它成了当地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是到了后来，这里的情形越来越不景气。到了解放前，兵荒马乱，百姓不得安宁。赶庙会的习俗也就渐渐消逝了。到了“文革”时间，破四旧，立四新，娘娘庙残存的断壁残垣也连根“革”掉，拆下的砖石盖了房子，垒了猪圈。从此，娘娘庙与赶庙会便消声匿迹。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作者系区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四届区政协常委，区政协文教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过去的长沟庙会

陈 瀛

过去房山的庙会很多，最早起源于以和尚、道士为会首，联系当地乡绅和商业界人士，约请附近客商临期赶会，经过多年逐渐形成风俗。就房山全境来说，长沟的“五月庙”是最盛的庙会之一，现在提起来房、涿两地的老人无人不知，对当时的胜景还记忆犹新。

解放前，东长沟属涿县，西长沟属房山，当时庙会的重点在西长沟，长沟西头（现在的汽车站东十几米处）有座药王庙，香火极盛。其所供的药王爷是孙思邈，孙思邈为唐朝华原人，钻研诸子百家，兼通佛典，一生致力于医药研究，医术高明，能治百病，给官不做，而善于帮助穷苦的老百姓。传说他的生日是阴历五月初一，所以长沟庙会定五月初一为头一天，直延续到初四，会期四天，初四是长沟大集的日子（长沟十天四集，定于一、四、六、九日，一、六日称小集，四、九日称大集）实际最后初四这一天是庙会加集市了。

当时的庙会，一是烧香许愿，二是走会、唱戏，三是贸易活动。长沟庙会接连五月初五端午节，正当麦秋将临，长沟附近村有个习俗，每到这个时候要接闺女，全家热热闹闹过上几天。

当时人们信神拜佛，求福求寿求子孙，一年四季求平安，这种想法带有普遍性，每当遇有大灾大难，

便乞灵于药王爷，许愿还香，虔诚之极，平时药王殿的香火不断，遇到庙会更是不可错过的机会，会期几天，信男信女络绎不绝，殿中香烟缭绕，击磬声声，一进庙堂就把人引入“神”的世界，整个庙宇笼罩着一片肃穆的气氛。

出了庙门则另是一番景象。大街上，戏台，戏楼(西头是戏台，东头是戏楼)前，甚至几条小巷都挤满了人。两头的戏开台了，十几道会耍起来了，河北梆子人们习惯听，爱好京剧的人也不少；旱船会、小车会、坛子会、高跷会也很招人，“五鬼捉刘氏”人们也是很爱看的。近处北良各庄，甚至远处大石桥、大次洛的挥武胜会俗叫权会也常常赶到；这些会的主角儿都是年轻人，自从正月出会以后，早把劲憋足了，在庙会上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机会，耍起来特别卖劲，整个庙会呈现出一片欢腾的景象。

庙会的贸易活动非常活跃，房涿申庙会的客商居多，连河北省文安、霸州、高阳、蠡县也常常运来一些土特产品。庙会的前一天就进行准备，时间来不及连夜赶到，有的预先钉上橛拉上绳，或者用石灰撒出线记，以便占好地盘，有的搭好布棚，整个东西长街都用布棚遮严了，主要是卖布匹、冷布、袜子、手巾等洋广货，间或有卖木梳篦子的，卖香口袋的，卖绢花的，卖避瘟散和凉油的，到时边卖边唱很能吸引顾客；靠药王庙东边卖杈把扫帚筛筐等农具，还有卖草帽售蒲扇、芭蕉扇的；北后头称杂八地，有点像北京天桥市场的样子，说评书的，拉洋片的，变魔术的，吸引了不少观众；随之卖冰糖水的，卖凉粉的，卖杏儿，樱桃的，还有炸麻花的，老豆腐摊并卖火烧裹焖小鱼儿。庄稼人平时省吃俭用，把攒下的钱都花在庙会上，大人觉得添置些穿的用的，庙会上东西多，得挑选。小孩子喜欢热闹，热闹看着觉得口渴要喝上碗冰糖水，吃上碗凉粉什么的，把大人给的一点零花钱总是要花在几天庙会上。

长沟地处房涿两地的边界，东至琉璃河，西至张坊，交通方便，加上当时封建迷信盛行，多年形成的“五月庙”热闹繁华是很自然的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作者系原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

良乡板栗

杨亦武

中国各地多产板栗，而良乡板栗最负盛名。其实，良乡从未出产板栗，那么，何以有“良乡板栗”之说呢？

原来，良乡的琉璃河镇历史上曾是繁荣的水路码头。收获季节，房山西北山区的板栗源源不断地驼运至此，而后转水路运往天津、保定等地。因琉璃河地属良乡，运货标签便注“良乡”的字样，于是“良乡板栗”也就行销四方了。

良乡古城北有北京、南有涿州，地当陆路交通枢纽，自古商旅云集，为富庶的商业城邑。与之遥临的西面，西南面及北面山地为北方板栗的重要产区。所以板栗很早就走进了良乡市场，成为具有良乡特色的

风味果品。每逢秋后，板栗小贩从四面八方齐集良乡，叫卖声充斥了良乡的街头巷尾。人们每以到良乡没有品尝板栗为憾。良乡有九月庙，届时方圆百里的氓(读 méng 亦作“萌”)众云集小邑，或祭神、或走会、或经商、或闲游。板栗生意于是进入高潮，良乡人搭起炒锅，糖炒栗子便飘香于良乡古城。无老无幼，无贵无贱，都禁不住香甜的诱惑，不由自主地将零钱扔给摊贩，把糖炒栗子装进兜里，填进嘴里。久而久之，良乡糖炒栗子蜚声遐迩。

当年，良乡市场上的板栗有西山货和北山货。西山货产自房山河套沟诸乡。糖炒栗子开锅时，或由山民驮至良乡，或由买主亲至产地采购。北山货产自京北的密云、怀柔、延庆诸县，北京城内有果子行，专营北山货发行。于是北山板栗便进入良乡的炒锅。

良乡城内的板栗生意代代相袭，直至民国年间。良乡二街的何性善、张福恒，三街的贾全忠等便是宋代加工、贩卖糖炒栗子的生意人。而今，何性善尚健在，张、贾二人则先后作古。

“良乡板栗”的历史由来已久。

三国陆玑的《毛诗·草木鱼虫疏》称：“五方皆有栗，惟渔阳、范阳栗甜美、长味”。渔阳治所在今北京密云县境、陆疏中的渔阳栗，亦即后来“良乡板栗”中的北山货。范阳治所在今河北涿州，房山西部、西北部古隶范阳，范阳栗的产地即在房山西北部山地。范阳栗亦即后来“良乡板栗”中的西山货。

陆玑乃吴国吴郡人，吴郡即今江苏省境。远居南国的陆玑对渔阳、范阳栗如此品评，足见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时代，“良乡板栗”中的西山货与北山货便已行销四海，并以“甜美、长味”名冠“五方”了。尽管当时还没有“良乡板栗”之称。

而第一个述及良乡市场上的板栗的则是宋代的范成大。其《石湖集》载道：“良乡，燕山属邑，驿中供金粟梨，天生子，皆珍果，又有易州栗，甚小而甘”。其《良乡》诗云：

“新寒冻指似排签，
村酒虽酸味可嫌。
紫烂山梨红皱枣，
总输易栗十分甜。”

范成大是乾道六年(1170)，以资政大学士的官衔使金时途经良乡的。可见，至少在八百多年前的金代，板栗便已成了良乡市场上的佳品，而易州在历史上曾是“良乡板栗”的产地之一。古易州治所在今河北易县境。

“良乡板栗”出产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燕国。《史记·苏秦列传》载道燕国“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细作而足于枣栗矣。”“良乡板栗”的产地均属古燕国境。《史记》的记载揭示了“良乡板栗”出产的悠久历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良乡本无板栗，“良乡板栗”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是自然与历史为良乡创造了灿烂的板栗文化。

在良乡板栗的诸产地中，唯房山与良乡毗邻。历史上房山县与良乡县分治，1958年两县合二而一，为周口店区后称房山县，今为房山区。房山可谓“良乡板栗”的故乡。作为“良乡板栗”西山货的房山板栗，其品色是板栗中的佼佼者，甘甜适口果实饱满，投之入水，颗颗落底。唐代，房山板栗曾作为范阳土贡，入贡长安，至辽，亦曾入贡禁中。房山本是板栗丰饶之乡，西部，西北部山地都盛产板栗，金元时期，仅天开寺就有栗园若干顷。后来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及人为的原因，栗树大大减少，大防山间的鹿门峪，金代还有大片的栗林园圃，而今已望不到栗树的影子。在河套沟诸乡，板栗却顽强地生存下来，集中产地在班各庄的北窑，南窑乡的中窑、南窑、水峪二花港、花岩等村。另外，霞云岭乡的下石堡、银水，沙湖、贾峪口，坨里乡的北车营，长操乡的长操等村也有板栗出产。

“良乡板栗”出口，大约自十九世纪末，新中国建立后，“良乡板栗”继续销往欧美和日本。在海外，

“良乡板栗”为人们口中宠物。外商来良乡，每每询问起良乡的板栗，殊不知，“良乡板栗”产自他山。

现在国外市场上的“良乡板栗”主要是北山货，产自京北的密云、怀柔、延庆诸县。作为西山货的房山板栗也曾出口，但近年来，由于公私价差，本来产量不多的板栗被私商垄断，出口的“良乡板栗”中再没有西山货了。1980年房山外贸部门计划在坨里乡大面积栽植板栗、建立板栗基地，但终未如愿。随着房山经济的发展，有着悠久历史的房山板栗资源当得以积极开发和利用。但愿“良乡板栗”重归故里。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作者系区文委文物科科长

从“孔水仙舟”到“神龙降雨”

戴家斌

房山西北二十里，有寺名“大历万佛龙泉宝殿”，俗名万佛堂，是房山乡民天旱时祈雨处。万佛堂下，有洞曰孔水洞，深厚不可测，水温冬暖夏凉，时有“桃花、白鱼”涌出，历来有“孔水仙舟”的传说，称为“房山八景”之一。乡民到此求雨，即与此传说有关。而“孔水仙舟”的传说从何而来，万佛堂又因何而成为乡民祈雨的圣地？从史籍中可略知孔水洞神化的经过。

古人曰：幽燕之地，“秀莫秀于上房，奇莫奇于孔水”。孔水洞到底奇在何处？最早记述此洞的魏·酈道元《水经注》中说：“大防岭下有石穴，东北洞开，高广四百丈，入穴，转更崇深。穴中有水。耆旧传言：昔有沙门释惠弥者，好精物隐（《房山县志》为“好窃物隐”），尝篝火寻之。傍水入穴三里有余，穴分为二，一穴殊小，西北出，不知趣诣。一穴西南出，入水迳五六日方还，又不测穷深（《房山县志》作“不测穷远”）。其水夏冷冬温，春秋有白鱼出穴，数日而返。人有采捕食者，美珍常味（《房山县志》作“美逾常味”），盖亦丙穴佳鱼之流类也”。这里记述的孔水洞只不过是“不测穷深，且水中有‘白鱼’的普通天然洞穴而已。在隋·郎蔚之的《隋州郡图经》中，记载说：“在良乡有石穴，东北洞开，春秋有白鱼，珍美非常味”，又说“防山上有仙人玉堂。”于是，孔水洞变成了“仙人玉堂”，带着一种不可捉摸的神仙气氛。唐代，大体还依此说。文字上略有改变，且加上“但见仙鼠昼飞，颓鳞时现”形容。任何人迹少见的山洞都有蝙蝠（仙鼠），有水就有鱼，这都没什么特殊的。到明代刘侗编撰的《帝京景物略》又进一步想象说：“孔水洞时有白龙出，辄化为鱼。开元间旱，每遣使投玉壁。金太和中，忽桃花流出，瓣如当五钱”。于是，“白鱼”化为“白龙”，桃花也越来越大。清代《燕山丛录》又进一步发挥说：“房山东北悬崖间，石窦入门，中有积水，人往往闻丝竹音。有好事者乘绣乘炬而入，惟见石燕飞翔，鳞行五六日无所抵，恐炬尽而出。金太和中，有桃花流出，其瓣径二寸，俗称孔水洞。”在民国十七年版的《房山县志》中，有同治三年的《修孔水洞关帝庙禋记》一文，说：“所谓孔水仙舟也，昔尝有野人于严冬见花瓣流出，大可径寸，因结筏以进，莫测其底。闻人语喧腾而返”。“丝竹之音”也好，“人语喧腾”也好，反正洞中有神龙或神仙，不然，何来

“桃花”，又怎能有娱乐嬉戏的“丝竹之音”？至此，一个极普通的天然洞穴，经过历代文人的生花妙笔，就成了神仙的居所了。有了神仙或神龙，就得食人间香火，要香火，就得有焚香朝拜的处所，于是，孔水洞之上的“大历万佛龙泉宝殿”就成了香火旺盛的“乡民祈雨处”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文人们受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影响而编造的神话罢了。

那时房山地瘠民贫，文化较为落后，一年收成，全靠老天爷赐给。每遇天旱不雨，向神龙祈雨几乎成了各村的乡俗，而且都很虔诚。可以说，没有半点的“强迫命令”。求雨的仪式，往往也因旱情的严重程度而采取不同的方式。若遇天旱不雨，庄户人家都很作急，于是，就由本村保、甲长出面，所请一个人，此人赤膊着上身，用一个大筐箩背在(或捆在)背上，算是“王八盖儿”。出发前，先吃喝一顿，酒是一定要喝足的，不然容易得病。扮作“王八”的人一般是家贫的光棍汉。参加求雨的人，头戴柳条编的园圈帽子，各家拿着自己的供品、香烛，先到村中或附近村的寺庙焚香、祷告。寺庙的规模及供的什么神灵，都无所谓，娘娘庙、关帝庙、三清观甚至土地庙都行，重要的是心要诚，即所谓“心诚自然灵”。焚香祷告之后，由村中的锣鼓引导，后面跟着求雨的“王八”，在村中行走。边走各家都端着水往“王八”身上泼，时间长短因村子大小而定，小村子往往从前街到后街走上好几遭。一次求雨下来，扮作“王八”的人浑身湿透，身体不好的人是顶不下来的。因此，顾请的这人除了吃喝之外，还有一定的报酬。钱是各家自愿摊派的，保、甲长只是起一个组织作用罢了。求雨之后，如果三、五天之内还未下雨，就要开“官会”商量进一步采取措施了。所谓“官会”，就是各保长、地方(帮助保长跑腿的人)、甲长、帐房先生，共同开会，组织几个村子集体到万佛堂孔水洞去求神龙降雨了。参加的人数、祈雨的方式都远远超过一个村子的规模。事先，用木头刻一个“龙王爷”，约一条板凳大小，放置在一块木板之上，由二人(也有用四人的)抬着。“龙王爷”前，人手捧用红布蒙着的小罐，罐里放几十个铜子(一块大洋合3—400个铜子)“龙王”随后跟随敲打锣鼓的和吹鼓手，再后就是二人抬的一个香炉，(往往用大锅带替)，最后是手执香火、供品的自愿参加和瞧热闹的，组成一支庞大的求雨队伍。临行前，先在本村庙里焚香祷告，然后在村中走一遍。出村后，沿途都有自愿参加的。因此，队伍越走越长，人数越来越多。途中的寺庙，都要出来焚香，拜“龙王爷”。各村的村民都端着水往龙王爷身上泼。往往一走就是几十里路，抬龙王爷的人边走边换，这一切都是自愿的。待到孔水洞之后，将龙王和红布蒙着的小罐放进洞中(往往只是洞口)，让洞中的水滴到龙王爷身上，人们陆续地到万佛堂上供、跪拜、祈告。最后，吹吹打打地将“龙王爷”抬出来，将小罐上的红布揭开，用尺子里面的水有多少，意即求了多少雨。因为沿途都有人往“龙王”和小罐上泼水，虽然上面有红布蒙着，但罐的水一定是不会少的。因此，求下的“雨”也就不会少了。罐中的铜钱就由抬龙的人们挣得了。当人介了吹吹打打、兴高采烈地往回走时，深信龙王不日就会普降甘霖的。事实上，当人们感到天旱，再经过了个人求告、本村所求、再到合村祈求，已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了，一般情况下也该下雨了。因此，大凡兴师动众到万佛堂孔水洞求过雨之后，旱情也缓解了。人们往往不注意天旱多少时间，不求也会降雨，而只想到因心诚感动了孔水洞中的神龙而普降甘霖。久而久之，万佛堂孔水洞就更成了祈雨的圣地，“神龙”也就越来越神化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求雨队伍不只是到沿途的佛教寺庙去焚香祈告，而是任何寺庙都去，而且所有的寺庙也都加入这一队伍。人民大众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务实求有的社会性格，对待所有神灵。道教的修仙得道、长生不老，佛教的宿命报应、生死轮回，儒家的忠孝节义、甚至关帝爷(关羽)的忠勇、秦琼的威武、二郎神的勇猛、送子娘娘的慈悲，连基督教义对上帝的无私奉献和民间的跳大神、狐仙附体等等，都被民众毫无顾忌地接受下来。人们深信各方神灵都能“消灾赐福”。这种全神崇拜的多神主义宗教观念，是房山人民的主要宗教取向。因此，往往在同一座神殿中，孔圣人、释迦牟尼、太上老君、送子娘娘等众神并排而坐，同食人间香火。在祈求“神龙”降雨的全过程中，沿途的僧、道、民众都自愿参加、各庙、

观的诸神都可分享一点供品、香烛。在万佛堂求拜“神龙”的同时，万佛堂对面的关帝庙当然亦要接受灾民的祈求、分食祈雨的供品的。

历史一页已经揭过去了。经过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僧、道在房山已经绝迹，庙宇、殿堂除少数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外，绝大部分已经拆毁。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农民祈求神是消灾赐福”的宗教信仰已经从根本上消失了。无疑，这是社会的进步。万佛堂孔水洞作为历史文物和风景名胜，在房山文化史上占存一席之地，而“神龙降雨”的文化现象收留给社会学家们以充分的研究素材。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窑上地区鸟类资源考

王国富

位置和自然条件

（一）位置

窑上乡位于北纬 $39^{\circ} 30' - 39^{\circ} 40'$ ，东经 $115^{\circ} 25' - 115^{\circ} 26'$ 。北京市房山区东南部。南北长约 10 公里，东西宽 4 公里。东部隔永定河与大兴县相望；北部与葫芦垡南端接壤；西部，与交道乡东端、东 南召乡东端接壤；南部与河北省涿州市里渠乡北部接壤。在永定河与小清河之间。

（二）形成原因及地势特点

窑上乡是属永定河与小清河的冲积平原。土层很厚，多数属沙质土。地势东高西低。南部较北部稍高。北半部多洼地、池塘。全乡土地都比较平坦。

（三）河流、沟渠及水文简况

永定河从东侧由北往南流去。从赵营，村东北部入境，由韩营村东南端出境。永定河是地上河，又称悬河，河床高出地面 5 至 7 米。是我国较典型的地上河之一。仅次于黄河的悬空高度。

小清河与永定河平行，在本乡西侧，从西北部入境，流经肖场村、大陶村、小陶村、官庄村四个村的西部，由官庄村西南端出境入河北省涿州市里渠乡、码头乡境内。

沟渠多东西走向。由永定河西堤脚入小清河，多自然形成。近些年来为灌溉旱田，开水浇田，也有南北走向的人工修筑的灌溉大渠。如大宁东于渠就是顺永定河西堤西侧，呈自北向南走向，直至五间房正东。

据有的资料记录：地上池塘多水，地下水位较浅，在地表下一米左右就有水。因永定河河床较高，河水经河底渗向堤外。俗称空堤水。窑上乡是低洼易涝地段。经常出现观涝灾。近三十多年来，因永定河上游修建了多座水库和截流工程，又加上游用水量猛增造成终年河床无水。小清河也是无水时间多于有水时间夕有水时流量也很小。又由于地下水大量被开发，至使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现已降到 8 米以下，甚至更深。造成真空泵抽不出水来，只得换深井泵抽取地下深层水源灌溉。洼地、池塘已干。很多年份永定河、小清河在降雨量集中的七、八、九月份汛期内河中也无水。近年来旱情严重危害着窑上乡。有的村居民吃

水都靠深井泵抽取水供应。

(四) 面积及利用简况

全乡总面积 28.9 平方公里。43350 亩。有耕地 17308 亩, 其中水田 6982 亩, 适宜种水稻; 水流地 7089 亩, 适宜种植冬小麦、玉米等。旱地 2931 亩, 适宜种植玉米、豆类、花生、杂粮等。荒地 306 亩。果园地面积 6420 亩。有果树 56445 棵。林地 1833 亩, 其中用材林 754 亩, 防护林 1079 亩。河滩草荒地 3960 亩, 尚未利用。水面积 9188 亩, 其中河流占地 4446 亩, 排灌渠道 1958 亩, 皆无利用。人工鱼池 120 亩。苇藕占地 2664 亩, 大部分长有芦苇, 小部分是藕塘。居民占地 2482 亩, 由农家住宅、机关、学校等单位使用。工厂占地 33 亩, 交通用地 604 亩, 其中柏油路占地 356 亩, 村间大道占地 248 亩。其他用地 1522 亩, 其中裸土撂荒地 567 亩, 风沙地 955 亩, 没有利用。

全乡有林带 113 条。长 91147 米, 有树 134474 棵, 小四旁植树 125806 棵。全乡合计有用材树 316825 棵。全乡人均占有林木 58.4 棵。果树 56445 棵, 人均占有果树 10.8 棵。森林覆盖率 17.1%。

(五) 气候

本乡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为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 夏季炎热多雨, 秋季晴朗少雨, 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降雨量为 655 毫米。平均气温 11.6℃: $\geq 0^{\circ}\text{C}$ 积温 4600℃; $\geq 10^{\circ}\text{C}$ 积温为 4200℃; 无霜期 200 天左右。7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降水量占总降水量的 84—90%。是汛期。

(六) 主要植被

窑上乡经多年人类生产活动, 原始植被已被破坏。现在主要是人工栽植的落叶阔叶林, 乔木、灌木、草本植物。野生草木植物很多。白茅、蒿类、地黄、藜、狗把、车前、因陈、旱墨莲、曲枝天冬、败酱草、胡枝子等, 栽植的木本植物有加杨、小叶杨、毛白杨, 北京杨、旱树、垂柳、龙爪柳、馒头柳、红柳、榆、刺槐、国槐、臭椿、香椿、桑等, 果树主要有梨树、苹果树、桃树、李树、杏树、山楂树、葡萄和零星枣树无花果等, 灌木有紫穗槐。

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水稻等, 油料作用有花生、大豆、芝麻; 经济作物有棉花、米、瓜类等; 蔬菜有茄子、大白菜、元白菜、菜花、番茄、菜豆、豇豆、辣椒、萝卜、胡萝卜、韭菜、芹菜、葱、蒜、香菜、菠菜等。芦苇藕塘主要分布三片, 赵营村、任营村、万里村村北、村西, 肖场村西部、西北部, 大陶村东北部连成一片为最大; 窑上村正东永定河西堤脚往南, 直至金门闸以北一片面积居第二位; 韩营村北一片居第三位。具有水池植物群落特征。永定河西堤上及堤坡两旁有大量的柳树, 南北成行, 是较古老的护岸林, 尚存清代古柳。堤坡两旁也有加杨、毛白杨、榆树、桑树及多种野生木, 多种杂草。其中也有多种药源植物如狗把、地黄、野菊花、牵牛、葶根、白茅、因陈等。林场在万里村东, 永定河西堤东侧有窑上林场。属国有林场。具温带落叶阔叶林植物群落特征。由乔木层灌木层、草本植物层, 地被植物层组成。果园主要分布在房窑公路窑上村至大陶村段以南。包括窑上村南, 大陶村东南部、小陶村东部及南部, 官庄村东部、北部, 新立庄村、鲍庄村、贾河村、五间房村周围, 韩营村北部连成一片, 有各种梨树、苹果、桃、杏、李等树。是窑上乡的主要果树区。任营村东部也有一小片梨园, 肖场村西南部有梨园和桃园。万里村西有小片桃园。

野鸟的种类

自 1960 年起, 至 1984 年 12 月底止。经过二十五年的业余观察和走访当地有关人士, 我已经认识的野鸟有 14 目, 24 科 51 种。现有标本 28 种 48 件。雀形目燕科有家燕、金腰燕; 鸚科有大嘴乌鸚、小嘴乌鸚、秃鼻乌鸚、白颈乌鸚、寒鸚、灰喜鸚, 喜鸚; 卷尾科有黑卷尾; 黄鹡科有黑枕黄鹡; 山雀科有大山雀; 文

鸟科有麻雀；莺科有黄眉柳莺，苇莺；伯劳科有棕背伯劳，虎纹伯劳，鸫科有兰点颏、红点颏；雀科蜡嘴雀，黄雀。共 21 种。

裂形目啄木鸟科有大斑啄木，绿啄木。2 种。

形目鸱：科有红角、短耳、鸺。共 4 种。

鹑形目杜鹃科有大杜鹃（二声杜鹃）、四声杜鹃，综称布谷鸟。2 种。

佛法僧目戴胜科戴胜，俗名臭姑姑。1 种。

雁形目鸭科有绿翅鸭、豆雁、鸿雁。3 种。

鹤形目秧鸡科有白骨顶鸡，红骨顶鸡（又名黑水鸡）、白胸秧鸡，又名苦恶鸟；鹭科有苍鹭、白鹭、池鹭，黄斑苇鹤又名小水骆驼。7 种。

鹬形目鹬科有扇尾沙锥鹬，大沙锥鹬。2 种。

鸽形目鸠鸽科有棕背斑鸠，珠颈斑鸠。2 种。

鸡形目鹑鸡科有鹌鹑。1 种。

隼形目隼科有红脚隼、燕隼；鹰科有苍鹰，鹞子又名雀鹰。4 种。

鸮形目鸮科有地鸮又名大鸮。1 种。

沙鸡目有毛腿沙鸡。1 种。

还有些野鸡见到过，没有捕到标本，所以无法识别出种名，故没记入。实际窑上现有鸟类多于 51 种。

留鸟、候鸟和旅鸟的种类

留鸟，终年居住在一个地的鸟为留鸟。共 12 种。

雀形目鸦科的灰喜鹊、喜鹊；山雀科大山雀；文鸟科麻雀。4 种。

裂形目有啄木鸟科的大斑啄木，绿啄木。2 种。

鸱形目鸱鸺科有红脚鸺、短耳鸺、鸺鹠、鸺鹠。4 种。

隼形目有燕隼、红脚隼。2 种。

候鸟，随季节变化而变迁的鸟叫候鸟。冬季来定居的鸟叫冬候鸟；夏季来定居的叫夏候鸟。夏候鸟有雀形目燕科的金腰燕又称巧燕、家燕，又称燕，这两种燕统称为小燕。卷尾科的黑卷尾，俗名黎叫，黑黎叫；黄鹡科的黑枕黄鹡，俗称黄鹡；莺科的黄眉柳莺，俗称柳燕，小柳燕；苇莺，俗称苇扎子，雀科的蜡嘴雀、黄雀，又称黄鸟；鸫科的兰点颏、红点颏；伯劳科的伯劳俗名虎伯拉有棕背伯劳，虎纹伯劳；鹑形目杜鹃科的大杜鹃，四声杜鹃统称布谷鸟；佛法僧目戴胜科戴胜俗称噢咕咕、花咕咕；鸽形目鸠鸽科的棕背斑鸠，珠颈斑鸠；鹬形目鹬科的扇尾沙锥鹬，大沙锥鹬；鸡形目鹑鸡科鹌鹑；鹤形目秧鸡科白胸秧鸡又叫苦恶鸟，白骨顶鸡，黑骨顶鸡（又叫黑水鸡）；鹭科的黄斑苇鹤又叫水骆驼。共 24 种。

冬候鸟有隼形目鹰科小苍鹰、雀鹰。2 种。

旅鸟，不在此地久居，只是迁飞过程中从此经过，有时着陆地饮水、捕食、短时间休息，然后继续迁飞的鸟叫旅鸟。旅鸟有雀形目鸦科的大嘴乌鸦，小嘴乌鸦，秃鼻乌鸦，白颈乌鸦、寒鸦；雁形目鸭科的绿翅鸭、豆雁、鸿雁；鹤形目鹭科的苍鹭，白鹭、池鹭、黄斑苇鹤；鸮形目鸮科的大鸮，又叫地鸮；沙鸡目沙鸡科毛腿沙鸡。共计 13 种。

野鸟与窑上地区的关系

野鸟是这个地区的古老成员之一。远在这个地区没有人类之前,野鸟就在这个地区生息着,繁衍种群、顽强地生活着。与自然环境斗争,与种间斗争,与种内斗争。在漫长悠久的历史中,一部分不适应变化者,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就被迫迁走了,有的死亡了,种族减少,直至种族灭绝。只有强者适应了变化了的自然环境,生存下来,繁衍后代,逐渐进化成这个地区的种群,今天的各种野鸟。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优胜劣汰自然形成的。

自从人类在这个地区出现后,对这个地区进行开发、利用、改造。在人类活动范围内,有意、无意地与鸟类争夺生存环境,甚至干涉破坏了鸟类的生活环境,迫使这个地区自然形成的鸟群发生了人为的变化。致使部分鸟类迁移他乡、有的死亡,直至绝种。今天窑上乡野鸟的种群,是历史进程中野鸟种类中的进化者,优胜种类得以留传后世,种族延续。成为窑上乡这个自然环境,成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结果。

(一)野鸟美化环境,野鸟是人类的朋友。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的喜爱。当地的老人经常劝阻小孩不要伤害鸟类,有种种说教。如说:“伤害小燕子,(指金腰燕、家燕)不好,将来会瞎眼睛的。”这句话当然没有科学道理,也没有那种因果报应。但是说出老一代人热爱燕子,把燕子当成有因果报应的特殊鸟种,他们心目中爱燕子、保护燕子。不但他们本人不伤害燕子,而且劝阻后代也要保护燕子,这反应出老一代爱燕子、爱野鸟的心情。正因在窑上地区有这种爱燕子习俗,至今燕子仍与人同居一室。每当盖好了新房,人搬进居住,家燕、金腰燕也随之而来在新房内再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繁衍种群。燕子住在新房内,免除很多种敌害。在繁殖时间,仔代成活率得以保障提高。家燕,金腰燕秀丽的身姿,绚丽多彩的羽饰和婉转动听的歌喉为这个地区自然环境增添了生机和诗情画意,其他的鸟类也都独具特征,美化了环境。野鸟与窑上地区人民友好相处,成为好朋友。

(二)野鸟消灭害虫、害兽,在保护窑上地区生态平衡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窑上地区有野鸟 50 多种。只有棕背斑鸠、珠颈斑鸠、豆雁、鸿雁、蜡嘴雀,黄雀、毛腿沙鸡等纯植食性,这 7 种占窑上乡野鸟种类的 14%,但这些野鸟的种群数量相对很少。如豆雁,鸿雁,只是早春、晚秋迁移时路过此地,偶尔着陆停歇,其他这几种所食之物对农业林业也无足轻重。有 27 种鸟纯以动物为食,尤其是以昆虫、蜘蛛、野鼠、家鼠、野兔等为食,有 21 种是杂食性的。

在繁蕴季节以动物性食物为主,此时正是大量害虫繁殖盛期,这些野鸟吃掉大量害虫、害鼠等有些野鸟吃树木茎内害虫的幼虫、蛹或成虫及卵。有些野鸟吃野兔,为保护农作物果树、林木立下功绩。

例如杜鹃、戴胜、鹞、黑卷尾、黑枕黄鹂、黄眉柳莺、苇莺、伯劳等自初夏来到这里开始觅害、筑巢飞产卵、孵化、育雏,到秋末离去,每日都要吃掉大量的害虫。害虫繁殖盛期,正是多种肉食性野鸟捕食量最大的时期,成鸟育雏,幼鸟快速生长,捕食量最大,对消灭害虫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白骨顶鸡、红骨顶鸡、苦恶鸟,鹌鹑等夏候鸟是杂食性的。窑上地区是它们的繁殖区域。在育雏期间主要以动物性食物为主,每天要捕获大量昆虫、蠕虫等。昆虫中绝大部分是害虫,对消灭苇塘、藕塘、稻田等低洼地区的害虫起很大作用。对控制蝗虫、蟋蟀的过量繁殖起着极大作用。

尤其是留鸟与本地区人类关系更为密切。留鸟与窑上地区人终年共处。

大山雀终年以梨星毛虫、梨星蚬、金龟蚬、青刺蛾、天牛幼虫、松毛虫等为食。寒冬时节吃树皮缝隙中虫卵,春、夏、秋季吃幼虫、成虫、蛹等。对保护果树有重要作用。

啄木鸟终年留居,以鞘翅目,鳞翅目,花蝽象、臭蝽象、蝗虫、螟虫蚂蚁等为食。啄木鸟尤为独特的

是能吃隐藏在树皮深处或茎的木质部深处的害虫。啄木鸟用坚硬、长直尖锐的喙啄取躲藏在树茎内、玉米茎内、高粱茎内的害虫，这是其他种野鸟望尘莫及的。啄木鸟对保护果树、用材林、农作物的功劳实为突出。啄木鸟是植物的义务外科“医生”。啄木鸟也是窑上乡各种植物的外科义务“医生”。消除植物体内寄生虫。

麻雀、喜鹊、灰喜鹊也都是杂食性的野鸟。终年留居在窑上乡。它们在生殖季节都以农林害虫为食。麻雀以每年的五月进入繁殖期，直至九月期间都进行繁殖、生殖期长。在全年生活期间春飞夏、秋三季以动物性食物为主，主食蝗虫、蟋蟀、蝼蛄，棉铃虫、金龟子、菜粉蝶、粘虫等的幼虫、成虫和蛹。动物性食物不，足也吃谷物和杂草种子。窑上乡麻雀的数量超过本区其他野鸟总数之和的4—5倍以上。分布广，数量多，遍布窑上乡所有角落。消灭害虫的种类和数量也是最多的。保护农、林、牧的功绩也是窑上乡野鸟种群之首。强加给麻雀为“四害”（通称蚊子、苍蝇、老鼠、麻雀）之罪名实为不妥。1958年春季曾全民共打麻雀几天，统一行动，实为一过。应大力保护麻雀。喜鹊、灰喜鹊的食性与麻雀相近，春、夏、秋季也吃掉大量害虫。观在有的地区人工驯养灰喜鹊，保护林木、果园取得良好经验，收到较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地的喜鹊、灰喜鹊的种群数量也较多，种群数量仅次于麻雀。为第二大繁盛种群。应加以保护，利用。

家燕，金腰燕，是夏候鸟中种群较大的。居住期间，吃蚊、蝇、蚂蚁、盲蝽象、蝽象，金龟子、蚜虫、蛾类等。据不完全统计，家燕喂雏期，每天往返觅食500多次，一窝家燕在夏季能吃掉50—100万只苍蝇，蚊子、盲蝽象、蝗虫、金龟子、蛾等。以全乡有200对计算，一对每个夏季繁殖一窝计算，就能消灭10000—20000万只害虫，因为每天都在吃，这种消灭办法是经常性的。而且是在昆虫繁殖旺盛季节进行的。所以对防治害虫危害的作用就更为重要。

鸮形目鸮科野鸟中红脚鸮、短耳鸮、鸺鹠、鸱鸮统称猫头鹰。是夜间活动、捕食的鸟类。以昆虫、鼠类为主食。鼠类是人类的大敌。据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在野外调查中得知：一只猫头鹰在五个月时间内能捕捉野鼠315只，占食物总量的90%。若按一只猫头鹰一年内消灭600只野鼠计算，一年之内至少减少两千多斤粮食的损失。窑上全乡按有50只猫头鹰计算，一年之内就可少损失粮食十万多斤。这是多么可观的数字呀！

苍鹰是捕野兔、野鼠等白天活跃在田野里的勇士。能消灭大量的野兔和野鼠类。也捕食昆虫。对保护农田、果树、林木大有益处。

红脚隼、燕隼、雀鹰等嗜食昆虫、鼠类和小鸟。就捕食昆虫、鼠类来说也是对人类有益处很大的野鸟鸮类、野鸭类、豆雁、鸿雁等历来是美味禽类。“飞禽莫如鸮”“岂知野鸭味更美”麻雀、斑鸠、野鸭、骨顶鸡、沙鸡、寒鸦、鹌鹑被列为野味佳肴。很多人为了口福，不惜千辛万苦捕之。捕雁历史久远，今应更改为救雁！雁的数量极少，近几年观察路过的雁极少，每群仅几只。

1950年，窑上乡曾发生过一次蝗灾。但自此以后至今，窑上地区没发生过重大的虫、鸟、兽类等所造成的重大灾害。当然有化学农药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鸟类起着巨大作用。如食虫鸟类吃掉了大量的多种昆虫。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农、林、牧害虫。害虫的卵、蛹、幼虫、成虫被食掉了。害虫的虫口率下降了。害虫虫口降至不能造成灾害程度。鸟类相应得以繁衍种群，有些已进化成为本地区繁盛种群。猛禽吃掉了一些野兔、野鼠、家鼠以及农林害虫等。这样就保护这一地区的植被，特别是保护了农作物、果树、林木等，为窑上乡这些年来农、林、牧业能获得高产、稳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很多野生植物资源也得到保护。野鸟为了生存，为了繁衍种群，顽强地生活着。为窑上地区的生态平衡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那些繁盛种群的不断进化、发展，再繁盛，将会对这个地区生态未来的平衡中起到更大作用。野鸟在窑上乡的生态平衡中立下丰功伟绩。尤其是那些留鸟如麻雀、喜鹊、灰喜鹊啄木鸟猫头鹰应严加保护。

(三)野鸟造福未来。

窑上地区的存在也有野鸟的功劳。直到今天窑上地区仍有这么多种鸟类,这是窑上地区大自然的美景之一。这个地区还要存在,发展前进!我们这一代人能见到50多种野鸟,这是历史赐与我们的宝贵财富。但这些种野鸟的种类和数量是有限的,而且会变化的。保护得好,野鸟的种类和数量会增加。保护得不好,野鸟的种类和数量会减少,直至灭绝。应保护好观有的野鸟,设法促其发展、繁盛,再招引外地的野鸟,造福未来。为子孙万代能见到这些种野鸟,让他们和我们一样大饱眼福和耳福,也能享受野鸟为他们义务奉献的恩惠。野鸟是窑上地区的资源,各种候鸟要飞到祖国的其他地区,野鸟也是祖国的重要财富。有些野鸟是不受国界和洲界限制的,有些野鸟要进行洲际旅行,所以野鸟也是全球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应为人类多做奉献,保护野鸟,就是为人类服务的一种体现。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应,设法促进其生存、繁衍、繁盛,造福未来。

窑上地区野鸟的消长情况

(一)口碑材料

我走访一些八十岁、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说:在我小时候,这个地区村与村之间大树林很多。一眼望去,这村见不到那村。树林中有很多高大粗壮的树。大青杨树几个人都围抱不过来。河边大堤上也有很多大柳树,小叶杨、桑树、榆树等。小清河里有很多水、蒲草、芦苇、水稗子、三棱草及其他野草茂密丛生。永定河的水到了雨季浑水满河槽,水流急、浪很大,响声传出几里远。永定河堤脚下空堤水很多,河堤两旁有很多大柳树、苇塘、藕坑。沟渠中有水多自东往西流入小清河。春、夏、秋、冬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鸟群,大鸟象地鸨有十七、十八斤重。有许多种鸟羽毛花纹好看极了。有些叫起来非常动听。老等(苍鹭)鱼鹰子、水鸭子在小清河、永定河浅水地方到处可见。夏天在草丛中经常能捡到很大的鸟蛋。每年的上冻前后,开河前后,成群的大雁鸿雁可多了。大雁屎多得是。一早晨就能捡到一筐头子。捡回来喂猪吃。夏天黎叫(黑卷尾)、黄鹂(黑枕黄鹂)、光棍好苦(杜鹃)叫声吵人。晌午黄鹂、苇扎子(苇莺)售胡不蜡(伯劳)小燕家燕、金腰燕叫声连续不断。吵得你睡不着觉。老瓜(大嘴乌鸦)麦鸭子(寒鸦)白脖老瓜(白颈乌鸦)一过时遮满天,黑忽忽的一片。冬天常见到鹰抓兔子。也常捡到老鹰吃剩下的野兔子。现在鸟少多了。红点(红点颏)兰点(兰点颏)白帆(白帆鹁)兰帆(兰帆鹁)野地里,树林里多得很。有的野鸟翅膀子就有二尺多长;有的鸟有三尺多高;有的鸟尾巴很长;什么颜色的都有,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有的怕人,有的不怕人。这些年河里没水,很多鸟不见了。有的因没有高大树搭窝,不见了。大雁很少见到,也不在咱们这边着地了。有些大鸟,白身子、红脖子、嘴很长,向下弯着,(这种鸟很可能是珠),在我小时候见过,住在大树上。早已不见了。那时小清河的水是清的,一眼能看到河底,能看到鱼的大小,能看出是什么鱼,很多人在河里用砍罩网网扣鱼,有的几斤重或十几斤重,还有更大的鱼。鱼鹰子在河上飞来飞去,一会冲下来,到水中叼起鱼来就飞远了。有些鸟是成群活动;有些鸟单个活动;有的三、五只一伙飞来飞去。很多鸟过去不象现在这么怕人。有些鸟离人很近也不起飞,只是紧走几步离人稍远些,又停下来找食吃,或喝水、或跑着玩。有的鸟在一棵大树上搭好多个窝,如老鸹窝(乌鸦)。以前老瓜就常年住在咱们这儿,春天搭窝下蛋、孵鸟,冬天也在这里过冬。后来人用火枪在晚上老打,有些被打死了,有些吓飞走了。其他鸟也少多了。打死几只打跑了一部分,吓跑了好多种。野鸟越来越少了。有些鸟几十年都不见了。照这样下去,鸟的种类还会少下去的,你打它就飞,怕打不再归。越飞走的多,剩下的种就越少。这几十年有个特点。很多过去能见到的大鸟,好看的鸟多少见了,或不见了。

(二)窑上地区野鸟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现统计在内的 50 种野鸟中，雀形目种，鸦科 7 种，其中只有两种成为留鸟有灰喜鹊、喜鹊、其中大嘴乌鸦、小嘴乌鸦、秃鼻乌鸦、白颈乌鸦和寒鸦已成旅鸟。早春、冬初偶见成群经过，但群量不大。燕科、莺科、雀科、鹁科、伯劳科各两种，但数量在逐渐减少；卷尾科、黄鹡科、山雀科、文鸟科各一种。裂形目两种、佛法僧目一种、鹁形目两种，鸽形目一种，隼形目隼科、鹰科都可见。

雁形目、鸨形目、鹤形目、鹳形目、鸡形目、鸱形目都呈锐减趋势。鸨有绝种危险。

文鸟科麻雀种群最大多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是繁盛种群，发展最快。鸦科的灰喜鹊、喜鹊也是发展较快的种群。再次是燕科的家燕飞金腰燕呈稳定种群，有所发展。

发展的种群特点，体形小、食性杂、胆大敢向人居住环境中活动，适应多变环境能力强、繁殖快、成活率高。

(三)造成窑上地区野鸟现状原因

造成窑上地区野鸟现状的原因有鸟的内因和环境外因两方面。

1. 造成增长种群的原因

麻雀在中国历史上遭到最大的人为灾难是 1958 年春，由政府统一布署、统一行动、统一时间、发动群众除“四害”。在几天之内从早到晚，使用各种办法，打得着就打，打不着就迫其强行飞行，不让着地、不让喝水、觅食迫使麻雀累饿而死。此次麻雀死亡不计其数。在打麻雀的同时，窑上乡的其他鸟类也遭到威吓、断水、断食等与麻雀遭同命运。近些年来有些人为了金钱又大量捕杀，换取外汇。用网拉或用气枪、火枪打等捕捉法多样。但是麻雀仍然是繁盛。其原因：麻雀内因，食性杂、食量小、食易得，生育能力强，繁殖速度快。麻雀的生活习性胆大，敢于深入到人活动、生产等各领域内，居住、繁殖。麻雀繁殖季节正是昆虫大量繁殖季节，食物营养成分高，又易得到满足，冬季又以谷物为食，禾本科植物种子很多是麻雀的食物。也食其他科植物的根、茎、叶等。敢于在居民点生活与人争粮吃。与家禽、家兽争饲料，农业发展了，粮食丰产了，随地丢弃的粮食就成了麻雀的食物。农林牧副渔业发展了，麻雀的取食地点增多了。麻雀筑巢地点多而且简单，房屋等建筑物的孔洞飞树洞、树枝杈间都可居住产卵、孵化；产卵量大，每巢产卵 4—6 枚每月一巢。每年可繁殖几次，生育，能力强，幼鸟成活力高。麻雀的行为复杂，适应性强，麻雀与人类居住在一起，减少猛禽、猛兽等多种天敌的伤害，身体小，行动灵活、易躲藏、易逃避敌害。灰喜鹊、喜鹊也是杂食性，也喜欢在人类活动的地方生活、居住、捕食，在繁殖季节，昆虫、青蛙、蜥蜴等多种动物性食物充足。过了繁殖季节，其他食物广泛分布，可在村舍中取得粮食、果品、蔬菜等为食，也易得到水。近些年来农、林、牧大丰收，为灰喜鹊、喜鹊度过严冬提供食料。近些年植树造林增多、筑巢的大树相对增加，为繁殖后代提供了条件。这两种鸟敢于在人活动较多的地方活动，人类在无意之中也保护了它们。

2. 造成种群消减原因

有些野鸟的食性单一，繁殖率、成活率都低，适应变化的环境能力差，这是其内因。野鸟减少的外因：(1) 植被改变：高大树木被砍伐，失去筑巢和栖息的场所，影响正常繁殖。有些植被破坏或改变，引起昆虫及其他植物分布的改变，促使有些野鸟的食物来源困难，甚至断绝。使得有些野鸟不能进行正常的生活、繁殖等。有些野鸟被迫迁居，或因食物限制发展直至死亡，断种。(2) 水源、水质的改变引起。近些年来连续干旱，又加上永定河和小清河上游修建多处截流工程，造成河流无水，使野鸟长期无水可喝，长期无水可喝难以生存。又因河中无水，很多水生动植物绝种，多种以水生动植物为食的野鸟，因无食可取，为了生存只得背景离乡迁至有食之地谋生。造成水域生活的多种野鸟大量减少，甚至死亡，绝种。水质问题。水质改变，河流上游工厂、矿山、城镇居民区等把污水大量排入河中。水田及农用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有害物质进入水中。野鸟饮用含毒的水质，致使一些鸟类中毒，影响野鸟的健康，影响繁殖，直至死亡。(3) 人类活动范围扩大。耕作范围及人类的其他活动，使得不少野鸟。没有适宜的活动场所，缺少适宜的捕食地

点,甚至缺乏食物,没有食物来源。没有适宜的筑巢地点,不能筑巢产卵、孵化、繁殖、育雏。(4)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农作物、果树、林场等大量使用化学农药,毒杀害虫,害虫吸害后,被野鸟吃掉,毒物转入鸟体内,轻者毒物不断在鸟体内积累,重者食毒直接死亡,有的因化学鼠药大量使用,有的鼠类服毒后出洞死亡,有的鼠服毒后波猫头鹰等野鸟吃掉,毒物转入猫头鹰体内,轻者中毒后影响健康,影响繁殖后代,重者致死。(5)空气污染。本地区机动车辆猛增,汽车拖拉机等机动车尾气大量排放,污染了空气。近几年熬沥清的增加,向空气中排放大量有毒气体。工厂(炼铁厂、铸造厂)的废气、烟尘排到空中。大量有毒气体,使大气成分改变。毒害了鸟类。另外,野鸟嗅到不适宜的气体,有的迁走,有的中毒影响健康,有的被毒死。(6)噪声污染。机动车的马达声,工厂的机械声,居民点的高音喇叭,收录机收音机等过量播放,破坏了原有的安静环境。野鸟中有些害怕噪声,被迫移居,有些候鸟不敢再回故地安家。也造成鸟类减少。(7)夜间光照影响。多数野鸟有多年形成的在夜间寂静的天然环境中生活的习性。近些年来未被打破。交通大发展多夜间机动车量猛增,灯光强照光线四射,村中、工厂、机关夜间照明使用强光源发出强光照,也影响了野鸟的生活。以上几种原因,是造成野鸟数量减少的外因。

3. 人为的伤害

(1)枪杀野鸟: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发达,制做气枪、火枪、猎枪的人数猛增,枪的数量、质量及准确程度都大大提高,杀伤力大,有的人为了满足口福,捕捉野鸟为食;有的人持枪随意杀鸟寻乐;有的为了消磨时间,练习枪法,以野鸟为活靶子。他们的快乐建筑在野鸟的伤或死亡基础之上;有的人为了发财致富,大量捕捉野鸟换钱换物。以上种种,造成一部分野鸟被吓跑,受伤、死亡。鸟类大量减少。(2)有些小孩为了玩耍,去掏鸟蛋、掏幼鸟,甚至拆野鸟窝,影响了野鸟的正常生活和繁殖。(3)捕鸟换钱、吃肉有所发展。有的单位或个人与外国有关贸易,外商大量收购野鸟。极少数人用网捕捉,也有用毒饵杀害的,造成大量野鸟减少。(4)投毒杀鸟或杀鼠类、杀农业害虫等,造成很多野鸟误食毒饵致死。野鸟资源遭受破坏的现象,应该引起当地政府和区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作者系原窑上中学高级教师

琉璃河旧闻轶事

张克耕

琉璃河

琉璃河又名刘李河,古称圣水(今名大石河),其源出上谷(今河北省易县)东。宋范成大《石湖集》载:此河“水极清泚,茂林环之,尤多鸳鸯,千百成群”。这当然是诗人在春、夏之初或新秋时所见到的景象。

盛夏山洪发作时，则并非如此。解放前，琉璃河上游，每逢夏季霪雨，山洪暴发，致使琉璃河两岸十年九涝。但每次洪水过后，几年种地都不用施肥。所以，这里的人们总觉得琉璃河洪涝，有害也有利。如果三、五年不闹一场，倒还有点想它。

解放初期笔者曾在这里度过几个春秋，虽然鸳鸯“不知何处去”，但河水清澈依旧。河上渔船，昼夜来往，有的船载鱼鹰捕鱼；有的不时撒网；如肯花上一元钱，就可在船上买下活蹦乱跳的三斤大鲤鱼，再买上四分钱一斤的“锦复隆”高醋一焖，就可使“小镇飘香”了。当时，两岸茂林依旧，嘉禾平畴，土地还家，万象更新。青年男女冲破封建束缚，追求婚姻自由，所以曾流传：“琉璃河三道弯，搞对象上河沿”的佳话，在此“桑间濮上不知酿造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对对鸳鸯”！

大石桥

公元前 220 年，即秦始皇二十七年，以秦京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东通燕、齐，南极吴楚”。据称：驰道宽五十步，路面筑土夯实，道旁广植青松。咸阳至蓟（现在的北京广安门一带）道经涿郡、琉璃河。想此时琉璃河上必要修桥或已有桥，不然焉能通蓟？此后，散见于史籍的有关记载有：宋文天祥被元军俘后押解来元大都，于公元 1280 年（元至元十六年）十月，途径琉璃河。曾有《过雪桥琉璃桥诗》：“小桥度雪度琉璃，更有清霜滑马蹄”。又在《明成祖实录》中载：永乐十六年（公元 1418 年）七月，修顺天府琉璃河桥。但古籍所载的琉璃河桥，均未涉及修桥的质料，只有在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九月所修的桥才明确为石桥。据《日下旧闻考》载：明嘉靖二十五年九月，浚良乡琉璃河，置桥其上，而且修筑二堤，专用条石，中添小桥一座（俗称一孔桥），并设水沟八道以杀水势。堤南北东西共长五百余丈。此后，明万历二十年（1602）年曾重修过，光绪庚寅（1890 年）夏连日大雨倾盆，山水暴发，将桥冲断二十余丈，朝廷命直督李鸿章派员监修。大桥北边的那座小石桥，在修柏油路时已被填平，小石桥四角的四大名山（猴山、狮山、象山、虎山）也不知移至何处。

琉璃河大石桥西侧的“镇桥梁”与桥齐名，长约五丈。当地人都认为此物为吉祥物，能镇水怪，起护桥的作用，所以过往行人无不抚之神仰，但世有人认为它是修桥时起吊桥石的支架，因顶端有孔；还有人说它是一把钥匙，但锁在哪里？无人知晓。也有古书记载说它是五代时期的王彦章使用过的船篙置于此处的。此物已于 1958 年大炼钢铁时被用汽焊从地面割断，用吊车运走，化成铁水，充进大炼钢铁的成绩里去了。在桥的南头东侧的河岸上，原有一硕大的乌龟，驮着一通高大的石碑，是明万历三十（1602）年九月立的，主要记载了重修琉璃河大石桥的事情，“文革”期间被砸断了。今尚有一块残碑留在桥头的荒草中，部分碑文仍清晰可读。

琉璃河大石桥已于 1984 年 5 月 24 日列入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大桥的南头西侧立碑以昭示路人。

陈迹

在琉璃河之阳约两公里，于京石公路的东侧，有“琉璃河商周遗址”。1979 年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 年 1 月，国务院公布该遗址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游人来此考察、观光者络绎不绝。

七十年代初，考古队在立教村、董家林一带发掘出古城一座，根据对大量出土文物的考证，认定为西周北燕封地（因始封燕在今河南，故称北燕）。据《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王世家》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之后于北燕”等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上的铭文，都说明这里确曾是过燕国的都城，有过它的辉煌历史。曾几何时，大石河的泥沙不仅淘尽了主宰过该城的

风流人物，而且连这座辉煌一时的都城也淹没于一、二米之下了，沧桑之变，岂人意可左右之耶！据《良乡县志》(民国十三年)载：立教村有金梁斗南墓。梁斗南，登元进士第一，累官至河南都运。立教村南有他的观莲池，今天在琉璃河北岸的大堤上向北望去，遗迹仍依稀可辨。

琉璃河大石桥迤北，约五百米，西侧就是远近闻名的老公庙(现为琉璃河中学)。此庙原为明嘉清年间修建的行宫，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重修，清、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西出北京去保定，路过此地，将行宫抢、烧精光。宣统三年(1911年)，由四品顶戴太监李乐宾(四十八处都总管)，道号李崇祥(按北京白云观法号顺序排“崇”字)筹资重建，工程由修西陵的带工闫子九负责(李乐宾为修西陵都总管)，民国六年竣工，于当年闰二月初八开光，名为岫云观，庙宇规制悉仿白云观，并宗白云观道家礼，因岫云观里住的是太监，所以当地人都称它“老公庙”。他们信奉道教，受的是方便戒，可以吃肉、喝酒、吸烟、甚至结婚。岫云观开光的那天参加典礼的有，白云观的观主陈明宾(法号志宾属龙门派)和檀柘寺、戒台寺的和尚。当时盛况，可见一斑。此后，在此常住的老公有：陈大脚(因其脚特大，真名不详)、李崇祥、赵绪坤、李绪友、赵贵清(为西太后打伞太监)、高文明、小魏等。

岫云观为下院，上院是上方山的宝金山玉虚宫，老当家的常住上院。岫云观内常年施舍吕祖救苦丹，老公们还会给人看病，特别善于看妇女病和按摩。观内设有一所义学(有学生十几人)，不收学费和书费。

岫云观共有香火地二百八十亩，老公私人田产约五百亩，共计七八百亩地。庙内设有：管收租、生活的帐房；有做饭、打杂、看庙、护院、长工等二、三十人；养狗十几条。老公们饱食终日，深居简出。室内陈设都是从皇宫带出的。每年盛夏他们骑驴或坐轿，由一群听差前呼后拥地去宝金山避暑。很有气派。

解放后，庙里的泥塑佛像被拆掉，改建为学校。现在仅存的有一后皋(实为“阁”共两层，上下各七间)，一耳房，一大殿。解放初期尚有五名老公，大都已年迈体弱多病，只有高文明和小魏稍年轻些，也已年近六十。几个年老的因生活无着，相继它走，不知所终。高文明身体较好，每日推一木轮车，车上放两坛高醋，串村叫卖。那时人们手中货币少，大都是用粮食换。早晨出去推着醋，晚上归来推着粮，再把粮推到醋坊，自食其力也颇辛苦。

大约在1954年前后，剩下的两个人(高文明和小魏)由政务院将他们安置在北京的兴隆寺(北长街内)，由国家养起了。

“琉璃河上看鸳鸯”，笔者不幸目睹，但琉璃河上空和岸边的大雁还是亲眼见过的。五十年代初，每到初春和深秋都有成行的大雁从琉璃河的上空飞过，而且非常守信，从不误期。夜晚成群的大雁就栖息在琉璃河岸边的麦田里，因为琉璃河两岸林木茂密，地势平阔、湿润，麦苗葱茏，便于觅食，易于藏身、起落。它们栖息的地点也总是选择在北起小店河，南到码头这一段较开阔的河岸。但它们却常遭到两岸渔民的暗算。每到过雁的季节，借着夜色，常有三、五条渔船潜伏在岸边，架上火枪(每条船上至少架三条火枪，分三次打)。待到午夜时分，劳雁正在酣睡之时，三、五条船上的火枪就一齐开火。这时的大雁虽已起飞，但惊魂未定，慌乱日寻不着头雁，低徊盘旋，嗷嗷哀鸣，最易被杀伤。第二次枪响后，真可谓哀鸿遍野了，其音嗷嗷，极其悲凄；少数腾飞者闻其同类哀鸣，亦有物伤其类之情，回顾低旋，正在这时，第三次枪声又响，可怜一群大雁，能幸免逃逸者极少！这时围猎者弃船上岸，手持竹杆，拣拾大雁，对伤残欲逃者用竹杆奋击之，直至就擒。常满载而归。那时，在琉璃河镇的街头和码头集上，时有卖大雁的。到了六十年代初，虽然麦苗青翠依旧但人们却再也望不到大雁从琉璃河的上空飞过了。

不夜镇

琉璃河镇在琉璃河之阴，因何而得名。据《方輿纪要》载：元延祐四年(1317年)，于琉璃河置巡检司。

《良乡县志》(民国十三年本)载:清设把总,民国时设警察所,以守卫京畿。镇的南北两头设有墩、堡。解放初期,南门圯毁,北门尚完好。门洞长约丈五许,高约丈许,宽不足丈。南北两门相距约一华里,街道两边商店林立。此门洞上有一间庙宇,供奉真武大帝,泥塑像完好,仍有香火;门洞朝南的一面上方有一块长约三尺,宽约二尺许的匾额,上刻“玄天大帝”。南门洞上朝南的一面也有一块匾额,上刻“燕谷里”。南北门洞朝北方向均无匾额。据此,可推知这两个门洞可能始建于辽金以前,因唐、宋以前,历代均定鼎于中原,故匾额朝南,以象征皇权之所在。自宋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崛起,政权逐渐北移,此后,这一带所建城池的北门一般都有匾额,而又多为“北辰”、“拱极”之类的题文,如房山、良乡的北门均有如是匾额。

琉璃河镇的北门距琉璃河大石桥约百米许,民国时期桥头有木栅,朝夕有兵了守卫。日本时期在桥南头的东侧修岗楼,上下两层,顶上插一太阳旗帜。桥头有伪军把守,日夜盘查过往行人。胜利后,原日伪军队摇身一变,打出了“国军”的旗号,从此琉璃河的人们又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琉璃河大石桥和琉璃河镇南头的挟河桥的岗楼里驻守一连“国军”,人称“石头军”。来往行人一旦被弄进岗楼,就甭想活着出来,先是把钱物留下,然后把人吊起,割掉舌头,夜晚在人背上绑上大石头,沉入水底,如此死者甚众。当时人们流传着:“宁挨十天饿,不打琉璃河过;宁吃十天荞麦皮,不赶琉璃河集”。琉璃河镇从此一蹶不振。

由琉璃河大石桥的南头往东,还有一座小石桥,河身几与琉璃河镇平行,南通挟河,为南场杨惠荣知府派人挖通,以济杨家风水。此桥是民国初年曹锟在此驻军时修建的。当地乡贤吕植并为之树“功德碑”一通,高约两米。碑址在小石桥东侧,解放初期尚保存完好,现已无存。琉璃河镇南门外的挟河石桥,亦为民国初年曹锟在此驻军时修建,原于挟河桥南公路的西侧有碑一通,是琉璃河镇南场杨家(杨惠荣,曾任宁夏知府)为曹锟立的,颂之以“爱民不扰民”之类。此碑解放初尚完好,不知毁于何时。

琉璃河镇汉、满、回三个民族杂居,以汉族居多。据年长的人说,琉璃河镇最早只有三户,其余均为外籍,以河北省白洋淀附近的渔民在此落户者居多,解放前,他们大都既无土地又无固定职业,生活朝不虑夕,大都恃勇、好斗、轻生。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传入琉璃河镇,街内设坛,烧纸焚香,人人赤膊练拳耍刀,口中念念有词,高喊扶清灭洋,群情汹汹。他们拆毁铁路,南至高碑店,北至丰台,是年八月十五日,八国联军占据北京城,不久南下,经琉璃河去保定,将琉璃河行宫抢烧一空,琉璃河镇亦遭洗劫。拳民匿迹。

琉璃河镇自古“系四方官员客旅朝会径行驿程正路”。又兼有水运和铁路之便,商业发达,尤以煤、灰、石之业为最。民国十年左右,琉璃河商业,的繁荣达到鼎盛时期。那时,在琉璃河镇的东、南、西三面的河岸上,经营煤、灰的厂商和过货栈就有三十七家,其中最大的一家叫利民煤栈,据说股东为王克敏。该厂将琉璃一周铁路一直修进煤栈,然后直接装船运往保定、天津等地。另外,镇上有粮商十八家,布店八家,油坊、药房、杂货店、麻绳铺、皮店、木厂、染坊等都在五家以上;烧锅(酒厂)、醋、酱坊各一家;镇东边的石头铺更是应有尽有,如盖房用的石板、条石、柱础石、碾盘、碾砣、碌碡、磨盘、喂猪用的石槽、门下的石礅、石狮子等。

小手工业有:烘炉、打车的、钉马掌、张马尾罗、箍桶、编席、编笊篱等等。为办红白喜事服务的有:杠房、轿子房、吹鼓手、轿夫、裱糊匠,糊纸活的等。

琉璃河镇,每年从农历的八月起,到翌年五月,这期间是琉璃河镇最红火的日子。每天昼夜不停地有一千多只骆驼为煤、灰厂(栈)驮脚;人推的独轮木车昼夜往返于周口店与琉璃河之间,每车都推二、三百斤煤、灰,多者四百斤左右,有的一辆小推车要用两个人,一个人在前面拉(大都是孩子或女人),一个人在后面用力推着。那时又是土路,坎坷不平,非常艰苦;更有甚者,则用肩挑。

卸船的,装船的,日夜不停。每到夜幕降临,沿河两岸几十家煤、灰货栈汽灯高挑。照得满镇通明。

劳动号子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等待卸货装船的船只，从琉璃河镇一直排到十里开外的小店河。这些船大都是从天津、保定运来洋广杂货、食盐、布匹、苇席、缸等。当时黄土坡渡有一个较大的过货栈，他们把运来的货物卸下来，再从琉璃河镇运走煤、灰、石料……为了维护水上众多船只的运输秩序，民国六年，在黄土坡渡专门设立了水上警察，并兼收税，每年的税收也是相当可观，除警察所开支外，余款拨给北洛村隆峰寺乙种工业学校作为办学经费。

那时最大的货船有载重十二吨的。为了装完船能顺利驶进正河道，在现在的牡牛河桥的位置设有一水闸，待装煤、灰的船驶进货场后，就把水闸放下，以提高水位，船装满货物，再把水闸提起，货船顺流而下，驶进正河道。如此驶进驶出，日夜不停。

“燕谷里”书香

据民国十三年《良乡县志》载，那时全县商业税收，良乡城和窦店镇两地相加的款数恰与琉璃河镇的相等，可见当时的繁华景象。由于经济上的繁荣，交通的便利，地理位置的重要，所以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表现也很充分、鲜明。就文化教育方面的情况，也就足以说明。在这不足三百户的小镇，竟有四所色彩各异学校。

福音堂学校：据说是美国人开办的，男女生兼收，由牧师曹五、曹七主持堂事，兼传授福音课，傅老师(名不详)讲授千字课，后改讲民国课本。另有外科医生丁敏斋(吉羊人)为人看病不收费(由美国教会开支)。是一所影响较大的学校，日本时期此校解散。

吕氏家塾：起于清举人吕植(民国十三年良乡县志编纂)曾任直隶府保定优级师范提调，后归家设馆教学，尊崇程朱熹理学，弟子颇多，堪称一方名流。民国以后，由清秀才吕联起(字筱亭)主办，只收吕氏家族的男生。除授民国课本外，兼学四书五经。民国二十四年停办。

女子学校：始称琉璃河镇初级女子学校，后改为琉璃河镇高级女子学校。校董有吕筱亭、王华轩、李晓峰，日常校务工作由吕筱亭主持。校规甚严，学生在校内不苟言笑，笑亦不能出声；放学排队出校门，在街上也要鱼贯而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男子学校：琉璃河镇男子小学，校长杜木愚，后易为高环。校址在现在的琉璃河乡造纸厂，讲授民国课本。

解放后，仅存的男女二校始合并为琉璃河镇完全小学，高级部设在老公庙，初级部在琉璃河镇里。校长为解雨亭。

参考书目：

- 1、《史记》
- 2、《日下旧闻考》
- 3、《良乡县志》

中华书局
北京古籍出版社
民国十三年本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作者系原琉璃河中学高级教师

玉塘泉

赵润东

幽燕奥室，山泉众多，唯玉塘琼浆之胜；水田之阔，物产丰腴，独玉塘白米之优。玉塘白米，享有盛名，历来深受世人称道。玉塘米产于玉塘泉，而玉塘泉地处房山城南三十公里的“汉白玉故乡”黄龙山下大石窝附近。《房山县志》记载：“玉塘泉在高家庄村西，即明人所谓大石窝也。”

玉塘泉可谓一方宝地，它北倚白带山麓云居古刹，西临玉皇塔下白玉石塘，周围有高庄，石窝、下营等村环抱，还有起源于玉塘圣水的小溪从东边流过。驻足石窝，举目远眺，峰峦叠起，绵亘迥合，白带山腰青云缭绕，终日不散；登上山路，俯首观望，大石窝一带云蒸霞蔚，炊烟袅袅，薄雾冥冥。农家屋舍，参差错落。钎凿声响，鸡鸣犬吠。树木葱郁之盛，溪水悠潺之清，其外凸而内凹之地势，自然构成一座美丽静谧的小盆地。因大石窝盛产汉白玉之故，有玉塘泉水盛名，又有云居寺古刹之圣地，当年，旧石窝镇工匠云集，商旅迭至，也曾繁华兴盛一时。

大石窝素以产汉白玉石名闻中外，其盛产石料十余种，尤以质地精良的汉白玉和青白石而居京郊之首。自汉代采运汉白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在北京建都的王朝的宫殿、陵寝、寺庙、牌坊、桥梁、雕刻以及各种大型建筑物，所用汉白玉大多采运于大石窝。如“嘉靖三十六年，修复殿工，命侍郎张舜臣、主事李建于大石窝采石”，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竣工于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历时达八十七载而筑成的承德离宫——避暑山庄，东陵和西陵清代两处宏伟的建筑群，慈禧陵著名龙蝠碑，北京故宫保和殿后面的大石雕以及山东曲阜孔庙等古建筑无不采石于此。

大石窝白玉塘，数百年掘凿扩展，日渐深入，“前产青白石，后产汉白玉，小者数丈，大至数十丈”。塘以至深，后有泉突出。泉水渲泄灌注，日久而玉塘淹没。此后，白玉塘方圆里许也没于汪洋之中。玉塘积水，盈池四溢，随之塘东近滨，沙淤之田亦也有泉涌出。于是，村中有人用泉水种植水稻。

起初，玉塘泉水量甚小，所能灌溉稻田不过一亩三分地而已，而所产水稻，“米色如玉，最称嘉美”。《房山县志》记载：“房山县有石窝稻，色白粒，味极香美，以为饭，虽盛暑经数宿不胝。”这里所谓石窝稻就是玉塘泉之水稻，即被人称誉的玉塘米。

玉塘米质量极优，属上乘之物。其他产地最佳品种均不能比。取玉塘米煮饭，味道不仅清香爽口，而且久食而不腻。食后所剩余米饭，或晾干或回锅再煮，其汤清不稠，米粒不碎。如是做法，可反复蒸煮七八次而不失其味。

由于玉塘米风格独特，又成为皇宫御用之物。据史书记载，清康熙年间，圣祖玄烨驾临云居寺，地方官吏为献殷勤，将这一特产奉献康熙帝，帝品尝之后，觉得其味确实非同一般，即封为“御堂米”。此后，冠以“御堂米”之称的石窝稻名声大噪，且定为贡品。“御堂米”何以见奇？主要在于玉塘泉清冽甘甜的水质。

该泉之水自溢于稻田之中，且流经稻田，有灌溉秧稻之利。其水温保持在14℃至16℃之间，致使水稻长期生长在一定的温度下。泉水中含有偏硅酸、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为优质天然矿泉水。所以其米气香而味腴，成为京郊特产之一。然而，玉塘米质地再优，品味再美，历经清朝数十载，百姓终不能自食以血汗换来的果实。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可自种自收，在地方政府的热情关怀下，玉塘泉水不断得到开发利用，“石窝稻”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从原来的一亩三分地扩大到现在的235亩，年产量可达11万斤，

这样，石窝特产玉塘米可以发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玉塘泉水质之优，又引发了人们对玉塘泉水的进一步开发利用。1984年，临近泉边的下营村科学养殖名贵鱼种红鳟鱼得以成功，其鱼塘面积2.2亩，年产量8万余斤，经济收入十分可观。

继此之后，区委、区政府投资9000万元，从捷克斯洛伐克引进全套具有现代化技术水准的啤酒生产设备和素有“欧洲啤酒之王”美誉的比尔森工艺技术，引玉塘泉之水，在长沟镇南郑村建成华尔森啤酒厂，年产量可达30000吨，生产矿泉水10000吨。具有独特风格的华尔森啤酒在1990年10月，荣获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首届中国酒文化博览会最受中外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奖。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玉塘泉水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利用，玉塘白米也会再现其独特风格。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大石窝特产将会更好地发挥经济效益，为房山经济腾飞起到更大作用。

参考书目：

- | | |
|------------|---------|
| 1、《光绪顺天府志》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2、《日下旧闻考》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3、《房山县志》 | 民国十七年本 |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潘庄少林会

史德福

潘庄，原名潘家庄，位于房山区东营乡夹括河南岸，与河北省涿州市西杨户屯村接壤，全村二百六十余户、一千多口人，人均占有耕地一亩多。

民国初期，潘庄少林会在附近村庄中是小有名气的。现在年近古稀的老人谈起当年走会的事，仍是眉飞色舞。有的甚至拉开架势比划几下，表明当年走会耍少林的情景。

潘庄少林会由来已久。早在一百多年前，有位外号叫孔暴腾的人来小村串亲戚。在闲谈中，与同龄人说起他会武术的事。刀、枪、棍、棒、拳脚，都会几套。据说他还能把自己的肩、肘、胯的关节卸掉，蹲到土炕沿下的炉洞里呆一呆。当时潘庄的小伙子们对此人很佩服，就跟孔暴腾学起武来。后来孔暴腾吸了鸦片，生活破落潦倒，在潘庄生活不下去，以后不知去向。

几年后，外地来了一位推着小车卖土布的老客，据说他是河北省饶阳人，姓段，都叫他段老师。此人到潘庄后，见到这村里的小孩、大人舞刀弄枪，就走上前来主动指点，纠正姿势，教给新的拳术。村里人见他在少林拳脚上有功夫，就把他留下，管他吃住，视为上宾。时间长了，还有的认他作干亲。

经过老段的传授，这个村的百姓在少林武术上有了新的起色。从十几岁的小孩到几十岁的大人，不仅能打几下拳脚、拧个旋风脚，在器械上还能拿得起放得下。从此潘庄村的人，刀、枪、剑、戟、斧、钺、

钩、叉、棍、弩、流星、箭、鞭、钯、锤、抓等十八般兵器都有人会耍。他们在头、臂、肩、手、腰、胯、腿、膝、脚等部位也都有了些软硬功夫。据这里的老人回忆，孔老师和段老师所传授的武术有初学式、查拳、少林拳、猴拳、螳螂拳、退步连环拳、大八级、小八级等拳法和三节棍、猴儿棍、单刀、双刀、护手钩、稍子棍、单刀对枪、稍子鞭、空手夺枪、空手夺刀、单刀拐子枪、软鞭、七节鞭、刀里加鞭、八卦九龙刀、五虎断命枪等兵器活儿，大约有五十几个套路。时至今日潘庄村民还能耍十套、二十套的。每逢春节或庆丰收时有些爱好者敲锣打鼓热闹个三天两早晨的。

潘庄少林是花脸少林、钩脸化装，每逢走会都要以杨家将的故事为背景进行装束。有的化装成余太君、杨六郎、杨八郎、八姐、九妹、穆桂英、柴郡主，也有化装成孟良、焦赞、扬排风的。少林会走到村镇繁华街道就要撂膳。撂膳是选一块宽阔场地，所有人排成长队，待到少林会的牵头人一声锣响，由“杨六郎”带头别人随后跑步绕场三周，俗称跑大场，然后通过门旗（一旁一个镶着白色“门”字的小旗），由一个化妆成杨七郎的人站到方桌上，双手把“潘豹”举起，哇呀呀一喊，跑大场结束，号称杨七郎力撵潘豹。之后就要打开场地，开始向观众表演拳脚，随后是器械。按照翻跟斗、单人拳、双人拳、多人拳和单人器械、双人器械、多人器械的顺序表演一番。围观群众不时高声叫好。据村中老人讲，那时他们的功夫可硬了。软功夫能做鸭子卧莲、寒鸭浮水、倒拿朝天镗，硬功夫能刀枪对打，耍八卦九龙刀时往这人身上泼水衣服都不能沾水。

民国初期，潘庄少林会是比较兴旺的。每当走会的前几天就要人加食、马加料。提前加紧练习功夫，熟悉套路，每晚练到小半夜才休息，每逢走会，小伙子们要全部出动，有的一家人只剩一个妇女看家。套上二十几辆马车，载人、拉道具及米面等。走会时人们都排成长队，敲锣打鼓、手持兵器、大旗小旗十几面、门旗在前、红旗第二，红旗上绣有“京西房山潘庄少林小会一道”字样，各色彩旗后面跟随，看上去精神抖擞，好不威风。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作者系原区物价局副局长

沿村山神会

陈 瀛

距长沟镇三里有小村庄叫沿村，它大部为平原，仅村西有一座小土山。但这个村的百姓崇敬山神，组织起的山神会一直流传了许多年。

原来这个村百分之七十的户都会荆编，附近十里八乡提起沿村的筐是很有名的，在当地有“七贤(村)篮子沿村筐”之称。编筐需要大批荆条，而荆条产自什么地方？一部分产自张坊沟，大部分产自西北部的山区。这些荆条，一部分随着长沟镇的集日到本村街头(条子市)去买，大部分要亲自到西北部山上去割。割荆条要走很远的路，不仅受蛇咬蜂螫之苦，而且要冒山高路陡的危险。因此保平安的愿望只好寄托山神了。

住在海边的人敬海神，在山边的人敬山神，沿村以编筐为业，山神在人们的心目中自然成为至高无尚的神了。历来兵荒马乱，附近村庄受害较重，唯这个村地处坑洼受害较轻，这就使人们越发敬重山神。

从老辈子流传下来，为了敬山神组织起山神会。山神会是二十户左右人家组织一道会，村中最先成立的一道会称为老会，之后又相继发展起六、七道会。每道会由一户(香头)在秋天专养一头猪作为祭品，为使其肥壮，会内每户拿出五老升粮食作饲料，到旧历年根儿杀掉，杀猪时掏出五脏六腑，保留整猪，脖梗上留一撮鬃，梳成小辫，准备大年初一起早敬山神。敬山神时每道会还都备有一面铜锣、两桌餐具及香、蜡烛、鞭炮、黄裱等。

农村旧历年本来很热闹，加上山神会的活动就显得更热闹了。正月初一大清早，人们吃完饺子，山神会开始出动，每道会前边都有铜锣开道，后边紧跟二人或四人抬着整猪，齐集村北敬山神。祭拜山神时，一律面向北山。老会、二会、三会……依次排开，点上香和蜡烛，焚黄裱，放鞭炮，同时各户拉着骡马驴牛去迎喜神，说是敬山神，也是企盼来年大丰收。那情景真是人欢马叫，热闹非凡。

散会后，各会分头撤走，然后来到香头家，米饭、馒头、猪肉片饱餐一顿。初二早晨照例会餐，这天主要吃猪排骨、下水，谓之“小炒”。饭后商量下届由谁当香头，轮流往后推，确定后把铜锣和餐具搬走，来年准备更大的肥猪敬山神，这个传统风俗一直延续到解放初。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瓦井高跷会

李国栋

瓦井高跷会由来已久，据当地老人讲起源于清嘉庆元年(1796)，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

据老人讲，当时保定府有一官员，家里总养不活孩子。后来有一位算命先生说，要想让孩子活下来，须到京郊南面六、七十里的村庄找一位妇人，奶子很长，孩子吃奶要背在背上，且家中房上有白公鸡打鸣。这位官员就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天到了瓦井村，在村西头见到门口有一棵大槐树的刘家，果然有一妇奶子搭在背后，正背着孩子吃奶，一只白公鸡站在房顶上打鸣。于是，这位官员就进院说明来意，将刚生下的孩子寄养在刘家，走时千恩万谢，还反复叮嘱千万不能让孩子沾地。两年过去了，孩子长的又白又胖。一天，这位官员又来到瓦井村，重礼谢过之后将孩子接回了家。后来这孩子勤学苦读，十几年寒窗之后，中了举人，以后又当了大官。为感谢哺育之恩，专程拜谢奶娘，问需要什么，奶娘十分高兴说爱看高跷会。于是他就派人四处打听，并从涿州市口请高跷会传于瓦井。

瓦井村高跷会兴起以后，走会的人个个勤学苦练，技艺提高得很快，并多次到附近的吉羊、韩村河、东流水、黄山店、娄子水等村走会、传艺，精彩的表演常常招来众多百姓的跟踪围观。涿水县的东祖村曾专程远道来拜师学艺，赠送彩旗。一时间瓦井高跷会远近闻名，成了年节的主要娱乐活动。每逢天早求雨，大家就穿好行头，化好妆登上高跷腿子，打着锣鼓到村中张家门口的“龙井”旁边求龙王爷开恩降雨，求得了雨，又要到天开龙潭谢雨。按旧俗每年三月初三，涿州北关娘娘庙的娘娘去百花山避暑，途经瓦井村，

老百姓就早早在村外迎接，许愿上香求娘娘送子，保佑平安。当时迎接的花会以抬娘娘的老会为主，炮会开道，吵子会等在村中高台唱戏。但围观人最多的，最热闹的还是高跷会，在大小胡同走个不停，有钱的户还特意请高跷会在门口多耍上一会儿。直到第二天把娘娘送出村才停止。到八月初一娘娘回来时，又少不了一通儿热闹。村东的东庵庙，村南的娘娘庙是高跷会撺场的地点。

民国十至十二年间是瓦井村高跷会的鼎盛时期。当时在会的青壮年达六、七十人，由于群众资助，高跷会的家底也逐渐厚实，其中有绣着房山县瓦井高跷会字样的红底黄边大小旗子，灯笼，高凳等器具。演员的行头、脸谱、化妆等也丰富多彩。尽管当时兵荒马乱村民生活艰苦，但群众走会、看会的积极性仍然不减，人们尽量省吃俭用省出钱物捐给高跷会。因此这种群众性的民间文艺团体便长期的流传下来。

一次，高跷会到上中院进香，从上中院到下中院到孤山口一连走了一天一夜没有卸妆，大家没有叫苦叫累的。在天开村礼佛会请的三十多档花会中独占鳌头。当时瓦井高跷会讲究腿上的功夫，上台三出戏要唱出嗓子来，后来又发展到跑、跳、唱结合。高跷会的唱腔由河北梆子演变成后来的十三套大折高腔，唱词多引自“三打祝家庄”、“打鱼杀家”等。瓦井高跷会的角色有十三个，分别为陀头、渔翁、渔婆、柴夫、逗儿、坐子、公子、丑鼓、俊鼓、丑花、俊花、卖药先生和万年春。瓦井高跷会起场，撺场及走会的过程中都有唱词，每组唱词叫一车，瓦井的高跷会有八车。在表演的过程中角色搭配，文跷的舞说唱逗、动作近似秧歌；舞跷有跳、跑、骗、角色的“打斗”等场面。

瓦井高跷会有严格的会规。入会练功要一丝不苟，不准串会，也不准抢会。据说有一次瓦井高跷会被请到周各庄走会，在众多档花会中，瓦井高跷会走的是头会，走到街心，香头史贵一摆杏黄旗，角色们开始对唱。这时有一档花会从旁边挤过来，香头史贵上前问道：“是走胳膊根还是走礼？”对方反问：“走胳膊根怎讲，走礼又怎讲？”史贵答到：“走胳膊根你们村有大官撑腰，走礼这‘门’关着。”后来对方只得退回，等瓦井高跷会起会以后才过去。如果各不让开，就会发生“武斗”。还有，请会必须下贴子，到外村走会也必须先下拜贴，学会以后要拜师。瓦井高跷会当年去涿州谢师，师傅有意考验他们，进城时路口横上一趟桌子，桌子上放板凳，板凳上摆上玻璃瓶，结果高跷会的硬角儿们漂亮地跃过了关，将谢礼和彩旗送到师傅门上。他们高超的技艺受到师傅的称赞。

解放后，瓦井村农民翻了身，更加扬眉吐气，使高跷会保留下来，在合作社、人民公社成立的庆祝活动以及逢年过节时仍用走高跷会的形式表达他们兴奋的心情。但是“文革”中高跷会曾一度当做“四旧”被批判，直到1987年涑水县东祖村二次来谢师，送来杏黄色大旗，“老高跷”才重整旗鼓。对此，村党支部十分重视，由副书记刘生负责，具体办理重建高跷会的各项工作，采取集资的方式，党员干部带头，村办和个体企业也纷纷捐款达4916元。当年的老腿子崔贺路、付义、范振芳等高兴坏了，他们抖起当年的雄风，带出了一批新秀。近几年瓦井村高跷会多次参加区里的文艺调演，并应邀到房山、燕山、张坊等地巡回演出。现在的高跷会正如他们新编唱词中写的那样：

瓦井高跷有人传，
中途间断三十载，
重整旗鼓凯歌旋，
民间艺术得发展。

……

坐子单曲(一)

花呀天仙是可夸，
苗条嫩柳早生芽，
婆婆和尚观上景，
朴苏墙外审三花。

坐子单曲(二)

八月中秋好时光，
桂花开放喷鼻香，
莺莺小姐花亭坐，
张生跳过粉花墙，
莺莺小姐吓一跳，
红娘一旁话端详，
他本是书生张君瑞，
传书送信会的张郎，
普济寺降香见过面，
你已许配他的身旁。

丑鼓单曲

汉皇豪，张飞逞豪强，
强强强，强见法魁保纣王，
王王王，王畏不贪法果老，
老老者，老天上旁法皇豪。

俊花单曲

拉花的本是一女英，
英英英，莺莺得病去请张生，
生生生，生成天然俊俏貂蝉女，
女女女，女扮男装赵美容，
容容容，荣华富贵柴郡主，
主主主，煮茶做饭杨排风，
风风风，封侯挂印刘金定，
定定定，定下南唐天太平。

打柴单曲

打柴樵夫下山岗，
腰掖板斧走慌忙，
今日不上别处去，
一心要到祝家庄。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作者系区旅游局副局长

顾册杂记

关向东

顾册，房山城南五里的大村，村中有许多景物佚事，今作文以记之。

古建筑群

顾册村曾有过庞大的古建筑群体。村西北部就曾有过几个相对集中的古建筑。最南边的是戏楼，位于后街西口与小街儿北口交汇处。戏楼坐南朝北，前有较大的空场。戏楼是辽代所建。戏楼分前台和后台两部分。前台东西长约两丈五，南北进深约有两丈，高约六至八尺；后台进深约丈余。戏楼墙体和台基为砖石结构，台基四角竖汉白玉条石，前台东西北三面沿部卧汉白玉条石。上部庑殿式瓦顶，正中有一棒槌形主顶。前台北边东西共有四根尺粗丈高木柱，东一东二近，西一西二近，东二西二远。这既是建筑的需要，又是便于观众看戏的需要。后台和前台交界处东西也有四根木柱和台前木柱对应，柱与柱之间有栋梁相连。整个戏楼青砖、灰瓦、白石、红柱、雕梁画栋，雄伟壮丽。

在戏楼东北20米处，有一座大型牌楼。牌楼南面对着小街儿北口，北面与道观主体建筑相对，并处在同一中轴线上。牌楼西侧是村中通向学校的斜土路，牌楼东侧也是路。牌楼有一个长宽各数丈的低矮台基，四周条石，中间铺砖。据老人说台基南部曾有两通石碑。汉白玉大条形石东西横卧台基中部，汉白玉抱柱石板牢立条石之上，四根大柱在抱柱石板中立起，石板用铁箍把牢，四根大柱各有南北两根斜顶戗柱。大柱擎起的是木垛楼顶。牌楼上部南北正中各有四个横书大字，南为“八天之一”，北为“地峨巍焕”。整个牌楼建筑得严谨结实，金碧辉煌，巍峨壮观。据老人讲牌楼1952年曾修葺过一次，换了一根大柱。牌楼建于何代已无

从查考,但有一段传说却广为流传。说是设计建造这个牌楼的人技艺高超顶部木垛不用一个铁钉,全是槽口咬合而成;他年牌楼塌毁若要重建,比他技艺高一筹的会余下一块垛木,比他技艺逊一筹的会缺一块垛木。据说拆除这个牌楼时虽未见铁钉,但有铁铜子,足见传说并不完全真实。牌楼正北是一座北朝南的道观,叫“北极玄应观”。道观从南到北沿中轴线依次有左右两个旗杆、影壁、三座拱状观门、左右鼓楼和钟楼、月台前殿(尚存,殿内曾供四大天王)、四方后院(现存)、院中左右两棵古柏(尚存)、左右两厢配殿(尚存,内中曾有七十二司泥塑)、大殿(尚存),四方院后还有一棵文王果树(尚存)。南北主体建筑的东侧有一个跨院,院内有前后两大殿又各有左右配殿(尚有遗存),跨院自成一体。玄应观西面比邻还有一个道观,据说是娘娘庙,可能就是旧县志上所说的缸窑村“元贞观”了。该观也是坐北朝南,从南到北依次有左右石狮子、观门、影壁、月台前殿,左右配殿、后大殿及左右配殿。两观之后是黄土高台,曾是老道的墓地。

元贞观西150米处还有一座尼庵,俗称西庵,也曾有庵门、前后大殿及配殿,自成一个格局。戏楼、玄应观、元贞观、西庵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体。可惜的是西庵和元贞观的大部分解放前后被辟为学校。玄应观和元贞观的后半部分先后变成房山师范学校、房山二中、军营和县委党校。绝大部分古建筑被拆毁了,如今只能见到的是两棵古柏和残存的殿房。顾册村除上述古建筑群外尚有多处古庙,如小街儿南口的“老母庵”(音)后街西头的五道庙,后街中北边的驾宫,前街东口的五道庙,村东头的一座古庙(不知名)。另村东、村东北还有两处古寺庙遗址,解放初两处遗址还各有一口大铁钟和堆积的瓦砾,大钟在大炼钢铁的年代砸碎炼铁了。

“动静寓焉”

在顾册小学的影壁前槐树上曾有一个中型上水石盆景。盆景底部是一个上大下小的汉白玉石槽,长约1米,宽约0.60米,高约0.40米。石槽内立有一个约1.50米高的上水石。上水石形态峻俏,如峰峦突兀,间有绿苔水草点缀其上,给人一种美的感受。石槽正面镌刻的四个楷书大字“动静寓焉”。四个字含有深刻的哲理。看盆景外观,是静而不动的;考察盆中之水,则又无时不刻地沿着石内的毛细管孔上升、下流或蒸发,动与静共同寄托在一个盆景之内,用“动静寓焉”四个字概括,是再贴切准确不过的了。

遗憾的是这一绝妙的盆景也遭到厄运。石槽被学校用水泥砌成了自来水水池,“动静寓焉”也就不复存在了。

热闹的三月庙

顾册村有三月庙。从三月初一开始,初五结束,共五天。小孩子过完春节、正月十五,便又盼望着三月庙了。二月中旬,后街从西到东的街道两旁便开始有人用木橛儿占地了。二月底各路赶庙会的商贩、民间文艺团体便陆续找民房居住、存货。各家的亲戚也纷至沓来。三月初一庙会就正式开始了。

操场上有跑马戏的搭起大圈的围帐,留入口处卖票。艺人在围帐内表演各式“马上的功夫”引起阵阵喝彩。有拉洋片的,花上几分钱便可以通过小镜孔观看内部的西洋画片。拉洋片的人一手拉动洋片变幻,一手拉响各种连在一起的乐器伴奏,口中唱念洋片的解说词,唱了一片又一片,那声调颇有点鼓词的味道。也有说书的,说书人搭个帐篷,手持折扇,说起古代的传奇故事,每恰到好处,便停下来将扇子平展开向周围的听众敛钱,淳朴的听众也竞相解囊,转一圈之后再继续往下说。还有耍“估丢”(音)的,操场上最庞大的要算是东西搭起的几条百货长棚了。长棚里卖各种布料、鞋帽、玩具和日用百货。游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戏楼西北空地上则有人搭起大棚开临时饭馆,接待外来逛庙客人,跑堂的报菜名和唱算饭帐声时时传出,悦耳动听。再西一点则有卖烧饼油条豆腐脑儿等风味小吃的,附近还有卖柿饼、鸭梨、红肖梨、核桃、黑枣、大柿子等山货的。牌楼东谷家大院里有照像的、还有来展示的各种珍禽异兽。戏楼前的空场

上搭起很大的席棚，留进出口，卖票入场。戏台上用汽灯照明，演员们在锣鼓声中粉墨登场，文戏武戏都有。京剧、河北梆子是主要剧种，剧目有《蝴蝶杯》、《打金枝》、《李三娘打水》、《大登殿》、《寒窑》等。看戏的人很多，戏唱到精采时，常爆出喝采声。从戏楼往东整个后街直到村东南的前头铺儿，两旁摆满各种小摊，主要是各种农具，如犁、耩、盖、耙、锨、镐、锄、镢、钎、杈子、筛子、簸箕、扫帚、车马绳套和场上用具，还有各式炉具和炊具。一条大街车水马龙，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喧嚣鼎沸，热闹非常。

正月十五放盒子

正月十五放盒子，是顾册村名闻遐迩的一项娱乐活动。

顾册村有家姓彭的，有制作花炮的手艺。彭江、彭富要算是彭家的末代技艺传人了。每年到正月十五，村里在晚上举办放盒子晚会，招徕了远近四方的观众。

所谓放盒子指事先用秫秸杆、彩纸做好各式花样，如八卦九莲灯等，然后折叠在一起，内中都有火药捻子和闪光花药串联，共同置放在一个长约2米，宽约1米，高约1米的彩绘盒中。放时搭个高大木架，盒子悬吊架上。放盒子人各持一把搭钩立于架厂。一般下端药捻点燃后，一个个花景便会相继落下，出故障时才用搭钩帮忙。放盒子的前后和间隙，则由许多人同时燃放“二踢脚”和“齐火(音)”。所谓“齐火”，是一个在纸筒内放上竖药，然后捆绑在一棵竹棍上的类似火箭的炮竹，点燃后带着火花尾巴能窜到冒天云高。此外还要燃放各式“花盆”。所谓“花盆”是由盆底和枝状“花卉”组成；枝内花内也装有火药，内中药捻串联。燃放时银白色的火花沿盆景枝叉尖端、花朵中喷出，高约丈余，能将附近照似白昼，甚为好看。如今的顾册礼花厂就是在彭家老艺人技术打底，再引入现代礼花技术和材料形成的。

业余评剧团

顾册、缸窑、西坝都是古老的村庄，都有着古老的民间文化活动。解放前村中曾有“吵子会”、“大鼓会”、“秧歌队”。解放后顾册最出名的文艺团体要算是农民业余评剧团了。

团长姓郑，叫郑茂，当时四、五十岁，是男扮女妆的演员。年轻而又有名气的是任凤桐和肖凤兰了。记得解放初期新婚姻法颁布后，为配合宣传，村业余评剧团排演了《白蛇传》和《刘巧儿》。《白蛇传》中的许仙由任凤桐扮演，白蛇(白素贞)由郑茂扮演，青蛇(小青)由肖凤兰扮演。《刘巧儿》中的赵柱儿由任凤桐扮演，刘巧儿由肖凤兰扮演，郑茂扮演大婶儿。两出戏在戏楼上演都一炮打响，十里八村的男女老少都赶来看戏，这对宣传贯彻《婚姻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任凤桐和肖凤兰这一对当时的青年男女，也因同台唱戏产生爱情，自由恋爱并结成伉俪，一时成为美谈，并引起不少青年冲破封建思想的桎梏，开始了自由恋爱。业余评剧团的确红火了一阵子。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作者系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房山商业习俗

——幌子和唤头

陈 瀛

旧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除了逢年过节，赶集上庙要花费一些外，平时生活用品的供应、农家用具杂什的供应和维修，多靠串乡的行商和手艺人，以及五行八作的各种活动。

为了招徕顾客，座商常挂幌子，行商常用唤头。因地区不同幌子和唤头也有所不同。现将房山地区常见的几种，略述如下：

铺家除注意装璜门脸挂有牌匾外，还挂有各种幌子。酒店要挂酒旗或挂画有葫芦的木牌，下边缀块红布；中药铺挂铜制的膏药牌子，当中一块方形铜牌，中间画有园形满涂黑色，上下两块为一方形对角破成两半的三角形，用铁链串起，下端还有穗子或药葫芦，悬挂起来，非常显眼；成衣铺挂有一块木牌子，上写“成衣”两字，下边缀块红布；绒线铺挂有绑好的一缕丝麻；麻绳铺挂有皮革制成的套缨子，修理自行车的挂有车轮和外胎。串乡劊猪的除大声呼唤外，在自行车把上插一个大红缨子；谁说“卖油的敲木板——好大的牌子”？其实是敲木绑子；修补筐箩簸箕的抖搂哗啦啦的一串铁牌子。修盆子铜碗的小锣匠，担子一头有小铜锣，一迈步就叮叮哨哨地响起来；卖布的手摇一个小鼓，卖金银首饰的则摇大点的鼓，前后二者的响声有区别，人们一听就能辨别出来；卖香胰子、香粉、雪花膏、针头线脑的则摇一个上有小锣、下有小鼓的唤头；俗说“剃头的挑子一头热”，串乡理发的挑子，一头有个脸盆架子，底下里边装个小火炉，一头有个长方形木凳，边走边拨动一个金属音叉；算卦的瞎子用根木棍或竹竿探路，一端拴个绳套，慢慢地走动敲打竹板，耍猴儿的敲锣打场，磨剪刀的吹短号；行商卖丸散膏丹成药的，则摇套在手上的圆筒钢环铃儿。现在高跷会药先生还保留着这个玩艺儿，叫“虎撑”，虎撑来自药王爷一唐朝孙思邈给虎治病的神话传说。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房山节日习俗

陈 瀛

房山地处京郊，俗说：“处于皇上脚底下”。房山过去隶属顺天府、直隶省，风土人情一直受到京城的影响，但由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不同又有其独特之处，仅就节日习俗，略述如下：

龙抬头 二月初二

是紧接“过年”和元宵节的一个节日。把过年的余留食品到这天中午要吃上一顿，传统风俗家家户户

摊煎饼、吃猪头。再配上鸡蛋、豆腐、绿豆芽等菜，一般是很丰盛的。

清明节

扫墓，祭祀祖先。上供多为四碟饺子、水酒，有的供水果和点心。至今民间仍有到祖先坟墓填土挂纸的风俗。逢闰年和新坟不填土挂纸。

浴佛节 四月初八

僧众和佛教徒要举行“浴佛法会”，即在大殿里用一盆盆供奉太子像（即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像）。至今我区云居寺仍定这天为庙会。

端午节 五月初五

五月初五，是我国民族传统端午节。据历史文献记载，我国民间过端午节有挂香袋，门上悬艾蒿、葛蒲的习俗。我们这里门上插艾蒿和桃枝，贴纸剪葫芦。有的剪贴是非常精致的艺术品。同时家家户户要吃粽子。

因为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这天满怀忧愤投泪罗江而死，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

六月初六

据《房山县志》载：晒面作酱、晒书画及皮衣等物。

七月七日

流传有民间妇女乞巧之说。当地流传，一年一度这天牛郎织女相会，夜里三更妇女在黄瓜架下静听，能听到牛郎织女隐隐的哭泣声。

七月十五 鬼节

古称中元节，为地官赦罪之辰。民间上坟如清明仪；僧人办盂兰盆会，焚化纸船，叫做法船，用来渡幽冥之魂。解放初到了这天还有散灯花之举。

八月十五 中秋节

八月十五，时值中秋，故名中秋节，俗称八月节。这个节日以祭月为主，祭月是我国古代祭礼中的重要内容，到了宋代，八月十五定为祭月节日。

祭月的供品主要是月饼，供后全家分食。现在虽不兴祭月，但吃月饼还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除准备一些小的月饼外，还要准备一个大点的月饼（到点心铺买或家里做），按全家人口多少切成多少份，全家分食一个月饼，取团圆之意。

中秋节的月亮最圆、最亮。全家人吃着月饼和瓜果，凭栏赏月，谈着吴刚伐桂、嫦娥奔月、兔儿爷和杪椌树之类的神话故事，颇涉遐思。

九月初九 重阳节

九这个数为阳，所以九九称重阳。是古时一个节日，到这天持酒登高，就食螃蟹，也有在家吃花糕、赏菊的。如今看来也是件乐事。

十月初一 寒衣节

十月一，送寒衣，家家到坟墓祭祖先，用黑兰色纸剪成裤袄，和纸钱一起焚烧，意为天气将冷送寒衣，不忘祖先。

腊月初八 腊八

这个节日来自佛教禅家，煮红糟粥，用来供佛。传到民间也做腊八粥，多用高粱米、大米、小米、玉米渣、杂豆并掺上枣栗之类煮粥，以品多为盛。先敬神，甚至抹喂果树，然后全家就食豆腐、粉条等菜作为早餐。

民间有用醋泡蒜的风俗，称“腊八蒜”，腌泡二十多天，蒜由白变绿，味稍酸，醋有辣味，是正月初一

吃饺子的好作料。

还有长沟一带到大坑凿冰(块越大越好)搬到粪堆上竖起,并插上用秫秸作成的谷穗、高粱穗,企盼来年大丰收。

腊月二十三 过小年

二十三晚上“祭灶”,俗称过小年。传说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监视每一家人行动的神,称“一家之主”。每年腊月二十三返回天宫,向玉皇大帝汇报这家人一年的善恶,由玉帝赏罚。为使灶王爷汇报时隐恶扬善,每家都在这天进行祭灶。

祭灶仪式郑重,人心虔诚,敬神如神在。供品有糖瓜或关东糖、草料和凉水、秫秸作的一匹马(供灶王爷上天时骑坐),点上香和蜡烛,由家长带领全家男子,依次叩头礼拜,礼毕揭下灶王爷灶王奶奶的纸神像和“马”、纸元宝放在一起焚烧。燃烧时将草料、凉水撒在地上。边烧边说:“灶王爷上天,好话多说,赖话少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燃烧完毕,全家分食供品。

过年(春节)腊月三十(除夕)和正月初一(元旦)

除夕、元旦合起来,民间称为“过年”,国家定为春节,按民俗是一年当中最隆重的日子,老骡子老马都要歇三天,各家可都忙活起来。一进腊月就积极准备“年货”,赶集上店,杀猪宰羊,磨豆腐,蒸粘(年糕)。大人小孩都要换上新衣裳,洗澡理发(过年不理发叫钻坛),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门的两侧贴好红对联(不贴红对联人家认为死了老人)门上贴有唐朝武将秦琼、尉迟恭肖像的门神爷。各屋普挂“挂千(钱)”,希望明年“日进斗金”、“四季平安”。屋里掸扫过后贴上内容丰富的年画。除夕还要准备一盆(一般用沙锅)米饭,当中插上柏枝,粘上“黄钱”叫“隔年饭”放在柜橱上,表示富裕之意。屋子中堂供上祖先的神主牌或纸口袋儿,放上两只香作为筷子,一般供上四碗肉片、炸豆腐、炸粉条之类的菜,有菠菜胡萝卜片加以点缀,除夕傍晚都准备齐全,家长带领子孙到坟地或村边接祖宗,放三声小炮,然后念道着:“老祖宗,回家过年了”,进院门还喊:“老祖宗来了!”在家的人便开门作迎接状,然后院内甬路遍撒芝麻秸,这时人们多在屋内活动,包饺子,擦祭器,讲家谱,无论大人和小孩只能说些吉庆话,一定保持肃穆的气氛。有的人家彻夜不眠,俗称“守岁”。

自夜晚始,便燃放鞭炮,通宵响个不停,起五更先到院中天地爷前点燃松柏枝、芝麻秸、谷草之类,俗称“炬岁”。等吃完饺子,晚辈依次给长辈拜年,俗称“辞岁”,长辈要给晚辈“带岁钱”,天蒙蒙亮,各家彼此走动拜年,见面作揖说:“恭喜恭喜,见面发财”。

初一至初三,民间花会普遍活动起来,踩高跷、舞狮子、跑旱船、耍中幡,以庆新年,祈丰收。

正月初二 祭财神

正月初三 送祖宗

扫去院中芝麻秸。

正月十五 元宵节

又称“上元节”和“灯节”,原是“天官赐福”的日子,城镇以及大村各主要街道,都悬灯供人欣赏,入夜后千万盏彩灯竞相放光,不分男女老幼,一起到街头观灯,俗称“逛灯”,北窖村还有“灯城”之举,吸引附近亲朋也来观赏,此时鞭炮齐鸣,烟花放出异彩,把春节活动又一次推向高潮。晚上家家户户都要吃元宵。

黄辛庄龙灯会

李国栋

黄辛庄有四百多户人家，二千多口人，龙灯会历史悠久，至今已有二百余年。清乾隆十三年(1748)于该村修建行宫一座，皇帝出京去易县西陵谒陵，皆驻蹕于此。为了迎接皇帝，有人提议耍龙灯，龙是古代君王的象征，吉祥之物。于是黄辛庄村从涞水县请来了龙灯会的教师，龙灯会从此兴起。

龙灯会分为文、武场。文场的打鼓敲锣，站脚助威，打着门旗和龙、凤、虎等红底黄边、粉底金边的各式彩旗；武场的舞动龙灯，一般是两条龙，每条龙由五个人分持龙头、龙身、龙尾等五节，中间一个舞绣球，(绣球是一个直径约50公分的大红球，是整个龙灯会的“眼”)。共11人。每条龙长约20米，重约200斤，头上有角，身上有鳞，配以各种颜色，龙眼圆睁，狮子鼻，血盆口，青面獠牙，根根龙须随风摆动。现在做一条活灵活现的“龙”要花五、六千块钱，费半个月的功夫。舞龙的人在起会时，每人拿一米长的木棒撑住每节龙身，服装几经演变，现在统一为头系青丝，身着襟衣，腰系丝带，个个显得精神焕发。黄辛庄龙灯会有二十四种套路，分为大翻身、小翻身、大脱皮、小脱皮、四方斗、三环套月、搅海、烧丝、跑八旗、贺龙门、跳龙门、大挂了边、小挂了边、齐门阵、走十座连桥等。

龙灯会出会一般有五、六十人。文场敲锣打鼓，舞场的起场，摆场、舞动两条巨大的彩龙，上下翻腾，观众前呼后拥，热闹非凡，龙灯会有严格的会规，请会、出会都要拜贴，参加庙会由礼佛会接会，香头拜匣，然后才能入会，互相之间绝对不能“踩会”，按次序出场，否则绝不许入会。对于初学者要先跑二个月的竿，在竹杆两端各系一根丝带，手持竹竿绕场地跑圈，两根长约2米的丝带不能搅在一起打结，熟练后才能学舞龙。

龙灯会兴起以后，村里的青年纷纷入会，苦练技艺。在香头的组织下，家家摊粮，拿钱，支持龙灯会。一时间龙灯会成了人们主要的文化活动。除了迎送皇帝以外，每逢年节、喜庆的日子都要出会，正月初一到十五，二月初二、三月初八必出。当时村里从三十晚上到正月十五，整个村子张灯结彩，为龙灯会的表演增添了热闹气氛。龙灯会边走边舞，到了开阔地多是摆场，舞出各种套路。村东的娘娘庙，村西的老爷庙是经常摆场的地方。有钱的户也常请龙灯会在门前耍耍，以示吉利。此外，龙灯会还是村民求雨的一种形式。黑龙关、万佛堂等地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

约在民国二、三十年代，黄辛庄龙灯会达到了鼎盛的时期。三月初八，涿州庙会进香时，在一百多档花会中，为黄辛庄龙灯会围观的、叫好的人最多，还有一次在良乡东关走会，出会的多达200人，附近成千上万的群众，纷纷赶来观看，有关单位还赠送了锦旗。当时的龙灯会无论从规模、演艺，还是从影响上都是空前的。它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又使黄辛庄村因此而名声大振，扩大了和外界的交往。

由于历史的原因，黄辛庄龙灯会中途间断了几十年。1983年又整旗鼓，使这一传统的民间文化再次兴起。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公议庄少林会

李国栋

少林会作为一种民间花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区葫芦垡乡公议庄村少林会成立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历史。

相传清朝道光年间，村里有一位叫赵九洲的汉子，自幼好舞枪弄棒。一天，他进京路过一座寺庙，见寺内有许多练武的平民百姓，就停下来观看。门内的方丈见他很着迷，上前说道：“施主莫非也是练家，是否可以练练？”于是赵九洲就练了一套刀术，方丈满心欢喜，就请赵九洲留下采，共同切磋武功。后来又举荐他到僧王府当了僧格林沁的保镖。赵九洲武功超群，屡立战功，深得亲王的赏识。告老还乡时，亲王赐给他100匹骆驼和100亩地。而最令赵九洲得意的是他带回一把七星宝剑，宝剑把上有七颗星，一侧雕龙，另一侧刻凤，是一件稀世珍品。凭着他的武功和这把七星宝剑，赵九洲在村里组织起一帮人马，习武练功，逐渐组成公议庄少林会。

公议庄少林会的内容引自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柴王、郑子明等三人路过董家桥，因为拒交过桥钱而与董家兄弟五人打斗的故事，所以该村少林会又叫五虎少林会。演出时分文武场。文场的多是镗锣打鼓的、扛旗担扛的、呐喊助威的；武场有十三个正角儿、赵匡胤、柴王、郑子明、董家“五虎”及其五姐妹。角儿们上场时都要钩上脸谱，红脸的赵匡胤、紫脸的柴王、黑脸的郑子明三人是正角，另外有五人扮演“五虎”等。公议庄少林会与邻近少林会的不同之处就是在表演中角儿们都有脸谱，可以和唱戏的一样到台上演出。“五虎”棒打董家桥的情节大致如下：一天，郑子明等三人卖油路过董家桥，董家“五虎”历来在桥头吃过路人的钱粮，郑子明等不给，于是就演出了一起三个人打十个人的一场武剧。表演中开始练的是拳脚，然后耍的是刀、枪、棍棒、镰等兵器，持续半个小时左右，讲求的是真刀、真枪、真功夫。练的套路有岳家枪、杨家刀等。

公议庄少林会属于群众性自发的民间团体，由少林会的香头负责组织，学徒的拿点饭钱，粮食由大家共同担负。每到走会时，由香头指挥，大车小辆，一应俱全，几十口子人一块前往。每年三月十七到涿州走会，四月初十到窦店、良乡、庞各庄等地走会，四月十五到北菜庙走会多少年来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百余年来靠纯朴百姓和武术爱好者共同努力，少林会陆续发展下来。1949年解放后，公议庄少林会到长辛店、良乡等地走会，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厚爱，除了拨发专款之外，当时的良乡县县长还授予少林会一面红底黄边、印有“尚武精神”的锦旗和证书，村里还专门建了“武术场”。

邻村纷纷前来请会，南召、务滋、大陶、葫芦垡等地都留下了公议庄少林会的美名。一时间少林会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主要活动和议论的话题，这时期为该村少林会的鼎盛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间断二十余年的少林会由村委会牵头，在部分在会老人的帮助下，又重新举起了大旗。解决了温饱的人们，要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尽管劳累了一天，仍愿意在业余节假日找点乐子。恢复后的少林会曾代表房山区参加过北京市农民武术表演、首届农民运动会表演，还连续三年参加了“龙潭杯”全国民间花会大赛，获得过优秀奖、二等奖、三等奖。现今的少林会已发展成了近百人的剧团，年龄最大的八十多岁，最小的仅五、六岁，上场表演的多是清一色的棒小伙子。每天晚上都有练武的人们习武强身，丰富业余生活的尚武精神正在逐步发扬光大。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河北村的高跷会

王奎武

高跷会作为一种民间传统艺术形式，一直受到群众的欢迎。房山区河北村的高跷会就曾以其生动活泼的演出影响了周围各村五十多年，直到现在。

河北村的高跷会组织正式成立是在1940年，当时的村长是刘希汉，人称刘九爷。老都官刘元，人称刘二爷。当时河北村的门铺、小店有几十个，资金来源没问题。成立高跷会，老百姓都非常支持，有人出人，有物出物，一呼百应。尤其是老都官刘二爷，本身又是木匠，每年都义务进山，亲自去采购段木，为高跷会做出质量上等的高跷腿子，以及保管服装道具的大戏箱，高跷会很快就成立起来了。

据村中健在的潘旺、刘焕祥、安庆祥等老人回忆说，教授高跷会的是东流水村的师傅。到他们那代就已经是第七辈人了，大约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他们那批学员一共24人：李永明、刘增来、张明、安立书、王连志、刘培来、安立芳、刘永和、安治忠、张忠、吕富、朱乃强、陈泽、安庆祥、刘焕祥、安伯云、刘焕中、刘继武、刘明好、安老四、潘成福、田福荣、于先贵。每年冬三月，全体高跷会员集中在村公所训练，从上午九点一直学到晚上六点，一心扑在高跷会上。由于群众都很喜欢，在他们学的过程中，有不少看热闹的人也学会了打击鼓乐节奏，演员的各种动作和各种小曲，影响很大。

每天练习，师傅要求都非常严格。例如，安伯云在学“豆儿”和“陀头”的过程中，有时词唱不好怕挨说，自尊心强，急得他直哭。由于他随时背唱词，还练出了好嗓子。平时在大墙上总练弓腿，最终出了名，受到观众一致好评。安庆祥老人学“公子”，师傅是于鲜贵和田福荣；刘焕祥的师傅是景希儒，开始学俊鼓，以后又和李水明、刘怀学丑鼓。在学习的过程中，老村长刘希汉在旁从头到尾观看。有时学下坡还要做高难动作，有的人胆子小不敢下，他就用大条子抽打。严师出高徒，终于练出了不少文武双全的优秀人材。

高跷会的发源是由一册《千驴驹》的书上改编而来，唱的都是古代以来的英雄好汉。每个角色都有二、三十首歌，群词还有五、六十首，共计三百多首。（高跷会的全套资料，大约有五、六本，解放后均被军区文工团收走）。

高跷会共十二个角色，都是双角，二十四人，即1陀头、2豆豆、3坐子、4公子、5渔翁、6渔婆、7樵夫、8药先生、9俊花、10俊鼓、11丑花、12丑鼓。

现在据老人们回忆出的主要曲子有三首：

第一首：

红脸大汉属云长，赵太祖千里送金娘。一途拐去赤兔马，杀人放火是孟良；吴害杀妻保刘秀，你看，曹斌在汴梁保过柴王。

第二首：

一支鸟树上鸣，胆大猴捅马蜂，山后跑过梅花鹿，八叉椅角似环龙，单枝下站立一个老者，头戴乌纱狮子披红，眼望太阳点三点。你看，巧路分毫指日高升。

第三首：

难似我公子累如稷，我娶上你老坐坐沈氏婆，你天黑夜晚欺负我，你不嫌我傻，嫌我丑的；你不说我的日子还罢了，我好地种着十顷多，你瞧中谁好跟谁去，我今日不要你骚老婆。

在河北村附近的黑龙关村中有一座祈雨的龙王庙。每当各村祈雨时，高跷会也前去演出。庙前有小台阶二十一层，每层大约有十多公分宽，下边就是几丈深的黑龙潭，稍有失误，就有生命危险。高跷会员们登着五尺高的腿子如履平地，显出高超的水平。上山难，下山更难，在下台阶的过程中，每个演员都能露一手绝活。有的鹞子翻身，有的倒背脸双脚住下坐，有的扛起一条自己的腿往下嗑。刘朋好饰演“药先生”，能够熟练地做出“鲤鱼打挺”、“孙猴背剑”等高难度动作，很出名。

1948年，坨里解放。河北村高跷会有一百人前去参加庆祝。前边有两面红色的二米多长的大“门”字旗，有总指挥“令”字旗，有蓝色大“尾”旗，还有三十多面维持秩序的蓝色三角旗。有抬大橙的，有筛大铜锣的，有帮鼓帮旋子的。走遍了坨里村四条大街，在坨里娘娘庙前打场唱了“大五文”的曲子，当时观众人山人海。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受到人民政府领导的接见和表扬。

随着演艺技艺的不断提高，河北村高跷会名声越来越大。曾先后多次到坨里、南车营、北车营、房山矿西区、东区、磁家务、东庄子、李各庄、河南、辛庄、陈家台、班各庄、佛子庄和英水等村演出，后来还去过北京龙潭庙会和河北省涿州的庙会。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欢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新的娱乐活动逐渐取代了高跷会等传统文艺形式，这是令人遗憾的。这一深受群众喜欢的民间艺术如不及时抢救，将会在农村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消失。借此机会也呼吁各级政府领导给以重视和扶持，使这棵古老的文艺树种能够开出新花。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作者系原河北镇政府干部

娄子水花会

张玉泉

娄子水村历史悠久，民风质朴，做为民间文化活动的花会源远流长。早在清代就有了民间花会活动，至解放前达到兴盛。这个村有六档花会，每年过春节和元宵节时，六档庙会都要走，一走就是半条街。这是一年到头最热闹的日子，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深受百姓的欢迎。

娄子水的六档花会有大旗会、炮会、礼佛会、大鼓会、铜锣会和高跷会，其中大旗会和高跷会在该村兴起最早。

大旗会。所谓大旗会以打大龙旗和若干小旗为主，走街串巷，附带一些锣鼓声响，它是各档花会之首，走在最前边，显示出该会的隆重和庄严。

该会有两面白绢子做的大旗。旗杆高4米，旗长3.2米，宽2.5米，绣着金黄的飞龙，由“香头”（花会组织者）在前面；领着两个壮汉举旗并排走。后边是一对对打小旗者，小旗旗杆高一米左右，为三角形，颜色各异。打小旗者年龄、男女都不限，大旗（也称主旗）和小旗中间，有一对锣鼓和两对钹奏响动。大旗会的人数不限，但并不是哪一个村都可以随便建立的，一般都要经朝廷或官府授权才可建立。

娄子水大旗会，据说是在明清时期建立的。当时有位皇太子生下来没有奶吃，村里有个李姓少妇，生

了孩子夭折，奶水又足又好；不知怎么被皇廷得知，便把她接到宫里当奶妈。皇上派轿夫接她进宫时，她还带个儿子。此小儿喜欢玩小旗和吃、喝、玩、乐。待李氏把皇太子喂壮之后，皇上便赐她儿子一杆黄龙旗，有了这皇上赐的旗，他可以在全国各地吃喝玩乐，分文不拿。李氏和她的儿子便把这杆旗子带回了村，不久就成立了大旗会。此会不但成为各档会之首，而且成了京南各会之首。

炮会。过去逢年过节庄户人家买不起鞭炮放，村内的响动就全靠炮会了。走炮会有18名炮手，排成双行，走到街心，每队脸朝外冲天打炮，放的炮与现在的火枪相似，用一根长1.45米下端有个小眼儿的铸铁管子，放药捻子用，管粗约20公分，下端有木头把儿。每个炮手挎一个小兜子，里边装上火药、沙子和小銃子。把火药装进管里，下好药捻，再用銃子压紧。到人多或有膳桌的地方，18名炮手同时点火冲天放炮。

礼佛会。礼佛会没有任何响动，其主要任务是做说会和调解工作的，如果会与会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负责调解，化解矛盾。各档会都有自己的规矩，不能干扰冲撞别的会，如进膳桌甲会正在献艺或跳扭，或对打，或唱曲，乙会要远离。等甲会演完，乙会才能入席。不管哪道会与别道会有了矛盾，礼佛会都要主动去化解。有的不依不饶时，礼佛会负责人必要时还要跪下求饶。村与村之间两道相同的会相遇，容易发生激烈的较量，关键时谁也不服谁，此时就都换上硬梆的角色，用尽全力以把对方压下去，此时最需要礼佛会人来调解。因此这个会的“香头”一般都是德高望众的，或有钱有势的，或年岁大、辈份高的人担任。解放前的老“香头”姓用，家里开着杠铺，日子过得很殷实，名望较大，就能胜任。

大鼓会。有八面大鼓，由壮汉挂在肩上，鼓面直径都在八十公分，鼓重二十多斤，出会时“香头”前头领着打沉子(小锣一样的)。八个鼓手排成一字竖队，鼓点共有八、九十种，变换打法时，全凭头鼓指挥。鼓队后面是打旗的，人数可多可少。

铜锣会。该会是以大镲、手锣、梆子、小喇叭、笛子飞胡弦等乐器相互配合，由小皮鼓指挥。唱腔不少，主要是移植河北梆子之调，集中到膳桌子处唱曲常常博得掌声。群众爱听，就多唱几曲，唱多少看情况而定。铜锣会人数不限，但真正能上场的不多。

以上两会，主要动用锣鼓等。鼓在我国起源很早，相传神农时期就有“土鼓”，黄帝在征伐蚩尤的涿鹿之战中，元女用鼓声“以象雷廷”，曾造牛皮鼓八十面，以壮军威。锣和钹则是秦汉时期由西域引进的。民间的锣鼓，音色丰富多彩，节奏灵活多变，与我国人民政治文化生活密切联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凡欢庆场合，重大节日，队列集合，甚至祈雨等都用它来伴奏。历来人们把它作为表达感情的一种器具，所谓“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其意变，其声亦变”，喜怒哀乐，尽在其中。

高跷会。娄子水的高跷会，由瓦井村传入，历史比较悠久，会员人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也是最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技艺在这一带也是较高的。

这些花会，统一由当时村公所管理，各道会又有自己的“香头”，各有相对的独立性。花会服装、道具、乐器、大部分由公家出，小部分是入会的会费出。会费的标准不一，有的会费是每年交二斗玉米，有的是“香头”个人全部负担，还有的是会员拿大部分。各会管理得很严格，制度比较健全，又有资金保证，因此能够长期坚持下来。

解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多样，欣赏水平也随着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提高。因此对于那较原始的、情节简单的、格调单一的文化活动形式不再受欢迎，自然就淘汰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东庄子村腰鼓队

王奎武

全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经济、文化、艺术全面复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52年河北镇东庄子村在成立业余剧团的同时，又成立了由26人组成的腰鼓队，为活跃山区农民文化生活和促进即将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东庄子村有丰富的石板资源，解放后石板业畅销不衰。一是老百姓盖房用石板，二是小学生上学要用文化板(加木框的石板，小学生练写字代替白纸用)。石板为老百姓带来财富，人们有饭吃，有钱花。当时在河北地区流传一首歌谣：“东庄子人吃‘八一’，拿‘八一’，脑瓜顶上顶‘八一’。那时，哪家的坑上都有十几袋白面存着。(当时出的面粉叫“八一粉”)。

人们有钱了，一是扩大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加强国防力量；二是尽可能满足本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从陕北解放区老根据地传来的除歌剧、秧歌外，还有雄姿勃勃的安塞腰鼓。打腰鼓使当地百姓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村支书吕德修、王海，村长刘英、吕德树等见一些村纷纷成立小剧团。他们想，东庄子应搞点新鲜的。搞点什么呢？因本村1952年已成立了完全小学，有大一些的学生，就建一支学生腰鼓吧。这个想法得到上级有关领导的支持。各石板塘山主听说本村要建腰鼓队部很高兴，纷纷自愿捐款赞助，很快买来二十四面腰鼓和两副大镲，还有各色彩绸、彩带。当时有从南窖小学调采的王景明和霍淑敏两位老师，另外本校的老师有的刚从房山师范分配来，也有打腰鼓的技术。经过校长、老师的选拔，首先挑选了二十六名个头高、身材好、年龄大一些的高小学生，组建了东庄子腰鼓队。同时委托年纪稍大的有威信的学生于洪明、殷宗荣为腰鼓队长。队员有吕学礼、吕德之、王德禄、王奎武、吕学文、吕书民、吕学元、吕德礼、吕德林、殷顺基、殷培基、贾文书、付介荣、周兰荣、周兰秀、吕德翠、吕金荣、吕淑贤、吕淑青、吕淑敏、贾文敏等。每天晚上放学后比别人晚回家，学习打腰鼓。主教练是从南窖来的霍淑敏老师。由于老师耐心教，学员用心学，仅1952年上半年就学会了二十四套腰鼓。他们鼓点一致，动作活泼，整齐划一，经常走出校门利用工余、饭后时间下街为父老乡亲们表演。鼓声、钗声震得整个山村及东岩轰轰回响。队员们娴熟精巧的表演，给解放不久的小山村增添了无穷的樂趣。

当时的宣传工具除屋顶广播和黑板报外，村干部就利用群众观赏表演的机会，把村里有什么需要对百姓说的话进行宣讲，比如抗美援朝如何捐献飞机大炮、如何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如何大搞环境卫生、建农民夜校，及如何搞选举等。

东庄子腰鼓队在京西矿区，河北小区也出了名。每逢过年、过节，都山村干部带领，到本村及河东村去给烈军属残废军人拜年、送春联、送喜报。有时还去河北欢送新兵入伍等。

记得1953年檀木港村首先建立合作化那阵儿，北京市不断派代表团还有国际友人前来参观访问，每次都由东庄子腰鼓队参加迎送仪式。

1954年春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河北镇两头特意组织了一次民间花会演出的录音报道。除河北高跷会、半壁店高跷会、李各庄村大鼓会、河南大鼓会、辛庄和杏元村的音乐会、班各庄的叉会外，东庄子腰鼓队的音响当然是一支重要的组成部分。

1954年初河北村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村干部带领腰鼓队去祝贺。从河北西头往回返时，当时的河

北区委书记张成基同志特意从区政府给送出泡好的大碗茶来招待。因此腰鼓队又一鼓作气在区政府门前把二十四套鼓艺全部献出来，区干部们大饱眼福。区委书记的鼓励，激发了大家学好腰鼓、打好腰鼓的热情和决心。

以后腰鼓队的学生们逐渐长大了，各自奔赴了工作岗位，学校又往下传教了几届学生，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